

發刊詞

近一年來，國際與中國的局勢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以言國際：蘇聯進行了經濟、政治、教育的改革，並從阿富汗和外蒙撤出部分駐軍，對中共做出和解的姿態，最近更有促進東西德統一之議；美國雷根政府因軍售伊朗以援助尼加拉瓜叛軍的醜聞案而窘態畢露，新右派勢力也大為退潮，經濟方面更因貿易赤字龐大，引發了強烈的貿易保護主義；日本挾著世界屬一、屬二的經濟實力，亟思重整軍備，軍國主義有復活的傾向；南北韓雙方則在中共與美國的支持下，有日趨緩和對立之勢。

以言中國：在大陸，中共推行了數年的經濟改革及對外開放政策後，擬議中的政制改革，未及全面施行，即爆發了學潮，導致胡耀邦下台，掀起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在台灣，勞資糾紛激增，民衆的反公害及自力救濟運動蠢起；去年9月28日，民進黨逕行宣告成立，突破了數十年的黨禁，國民黨也於去年底宣佈即將解除戒嚴，回歸民主憲政；經濟上則為了蛻換經濟體質及因應美國的壓力而力倡自由化、國際化，並使台幣不斷升值。

面對這樣的情勢，我們有如下的觀察與主張：

一、五十年代的東西冷戰形成了共產與反共產的兩極對立體制，但至七十年代後，這一涇渭分明的兩極對立體制開始崩解，國際秩序重新編組。因二極對立而被迫分裂的國家如：東西德、南北韓，也因國際結構的改變而有緩和對立、趨向統一之勢。在這樣的國際政治趨勢下，台灣與大陸要再保持過去數十年的隔絕，其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了。此觀乎美國對台政策的演變即可了然。台灣原是做為美國圍堵中共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而受到美國的援助、保護。美國用以分裂中國的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政策就是為這戰略目的服務的。但自七十年代後，美國已無力獨撐抗蘇大局，汲汲於拉中共共同協力，而為了不觸怒中共，以免中共與蘇聯由和解而聯盟，美國不敢再肆無忌憚、明目張膽的支持分離運動。今年初，中共發動「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大肆抨擊資本主義及美式民主與思想，美國之所以大為恐慌，急派舒茲前往大陸一探究竟，即是害怕中共反美聯蘇。舒茲在上海發表談話表示「我們早就歡迎間接貿易與加強人員交流等這類發展……。孕育一種環境，使這類發展持續進行，一直是我們堅定不移的政策。」這些話很明顯是對中共在台灣問題上施壓後所做的表態。美國國務院、國會與民間的大眾傳播媒體，近來也對台灣分離主義紛紛正式提出警告，正顯示出美國朝野基於國家利益在對華政策上已漸形成共識。美國說：「台灣問題，應由海峽兩岸的中國人以和平方式自行決定。」美國雖然言行不一，但此說大抵不差，我們認為，台灣必須進一步的民主化，讓各階層人民能充分表達他們的意見，使台灣問題在尊重民意的基礎上，用最妥善、最合乎多數人利益的方法解決，而反對任何黨派以一千八百萬人的代言人自居實行包辦壟斷民意。

二、在國共對峙下，台海兩岸隔離了近四十年。國民黨因「恐共」心理作祟，常走火入魔，反共反到不惜反民族、反人倫親情。遠如1983年6月越共侵佔南沙島嶼，中共派船前往嚇阻，台灣的兩大報竟為越共幫腔，譴責中共；唐山大地震時，此地的大眾傳播更是幸災樂

禍，指為「天降災異」、「亂象將生」。近如來台大陸人欲返鄉省親，國民黨卻周顧人倫天理，堅持「三不政策」，不准所請。更嚴重的是：由於這種恐共的僵硬政策，兩岸人民與文化的交流，遭到史無前例的徹底隔絕。國民黨在內政上採取高壓統治，壓制民意；在大陸政策上，禁止探親、禁止旅遊、禁大陸書刊、禁大陸音樂、禁大陸電影……，無所不禁，斷之唯恐不絕，使大陸幾成異國、鬼域，自然為「一島意識」、分離意識培養了肥沃的土壤，從而塑造了一些因對國民黨憤懣、對大陸隔閡而仇視、蔑視中國、「中國人」和一切中國事務的反對份子，推源禍始，國民黨實不能不負最大的責任。這種破壞民族團結，無視倫常親情的隔離政策，再不改弦更張，國民黨當局必然要背上千秋罵名，難逃歷史的譴責。

三、台灣的經濟是藉依附美、日兩國而得以成長的，即所謂附庸的發展（dependent development）。六〇年代，台灣以勤奮而廉價的勞工吸引外資設廠，大量出產勞力密集的加工產品，實行出口導向的經濟政策，帶動了快速的成長。到了七〇年代末葉，因工資日漸上揚，技術卻未升級，遂失去原有的競爭優勢，面臨了產業結構須由勞力密集升級到技術精密、資本密集的產業的問題。但台灣的國營企業績效不彰，沒有堅實的重工業基礎，民營企業長期靠政府扶植，以低廉又不虞罷工的勞工大賺其錢，並不多著力於技術、設備的更新和經營管理的改善，而且一般資本家對台灣的未來沒有信心，抱著撈一票、算一票，再轉移資金至國外的想法，鮮有願在台灣生根，作長期而大規模的投資者。為了想使台灣的產業結構升級，以順利地進一步資本主義化，官方提出了「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的政策。這個「三化」政策一方面想讓民營壟斷資本更為集中、壯大，另一方面想讓國際壟斷資本進來衝擊久受特權保護卻無甚長進的官僚資本，也就是想透過市場機能的充分運作來為台灣的經濟體質脫胎換骨。在這「三化」的過程中，將產生新的壟斷資本的系譜，而相當部分的中小企業會被犧牲，從而造成不小的失業問題。面對這個趨勢，我們將反對壟斷資本的持續擴張，反對特權，而要求設立反托辣斯法並公平、合理的分配經濟資源。

四、過去四十年，在國民黨犧牲勞工以扶植資本家的政策下，法有明文的勞工權利被剝奪殆盡，勞工無法組織自主的工會，無法罷工以與資方爭衡，等於繳了械，任人割宰的俘虜。去年底的立委選舉，國民黨提名的兩個現任總工會理事長皆未當選工人團體的立委，顯示出勞工的憤怨不平。美國亦指控台灣當局壓制勞工以取得低工資的有利條件，與美國產品進行不公平的競爭，並聲言若不改善勞工的境遇將採報復措施。面臨這內外交逼而至的壓力，國民黨不得不調整勞工政策了。但是，以目前台灣的產業結構，以長期以來，國民黨左袒資方，特別是民營壟斷資本的政策來看，勞工境遇的改善恐仍不樂觀。今年四月台大社會系張曉春教授起草了「勞動人權宣言」，提出了十二項主張，要求落實對勞工人權的保障。我們認為，這些主張是勞工應享的基本權利，是最低限度的要求，我們將以此為出發點，為光復勞工人權而努力。

「海峽」出刊了，我們期待朋友們的鞭策、批評，一起為建立一個民主平等的社會作永不懈怠的奮鬥。

海峽

雜誌

The Channel

創刊號

王義雄、郭吉仁：「勞動人權宣言」說明會
張曉春、陶百川、胡佛、黃越欽
任華：儒學大師梁漱溟訪問記

——我對時局的一點分析與理解

王拓：熱烈的期待，深切的憂慮

陳映真：鄉土文學論戰十周年的回顧

陳若曦：蒙古大草原遊記

李榮武：解剖台灣大財閥

本期要目：

專輯：光復勞工人權



茲林教育基金會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發行人 / 盧思岳

社務顧問 / 王津平 王杏慶 王義雄 李榮武
周合源 林孝信 林宗男 洪銘水
許登源 許達然 莫宗堅 陳映真
張曉春 黃溪南 蘇慶黎 寧明杰
楊祖瑞 蔡仁堅 葉芸芸

社長 / 王拓

總編輯 杜崇仁

編輯委員 本刊編委會

執行編輯 余宗理

編輯部 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11號10樓之1

電話 (02)7012930 (02)7052635

發行所：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190巷5弄7號4樓 111

郵撥帳號 / 1134151-2號盧思岳

零售 / 新台幣90元

長期訂閱 / 國內：全年新台幣900元 半年450元

國外：空運全年歐美地區美金55元

亞太地區美金51元

港澳地區美金47元

海外通訊訂閱處：China Tide Association,

P.O.Box 1724, New City,

N.Y 10956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Tide Association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伍捌伍伍號

經銷處 台北 聯宏書報社 (02)5620282
基隆 宏恩書報社 (032)316843
內壢 國華圖書供應局 (03)4553456
中壢 志昇書店 (03)4251897
新竹 文強堂 (035)253101
苗栗 芙華書局 (037)320810
台中 全元書報社 (04)2700617
嘉義 嘉聯圖書供應社 (05)2354993
台南 永茂書報社 (06)2642655
高雄 麗志書報社 (07)3849410
屏東 環球書局 (08)7323071
宜蘭 民生書店 (039)323765
花蓮 花蓮文具店 (038)322941
台東 徐氏圖書文具行 (089)322267

目錄

海峽(76年6月號)

發刊詞

1

Correction
Page 0

專輯 光復勞工人權

4

4月24日，近四十位學者、民意代表
聯合簽署發表了「勞動人權宣言」，
呼籲當局恢復被剝奪了數十年的勞工權益；
5月16日台北市計程車司機組成了第一個自主的工會，
台灣勞工人權的光復，方興未艾。

- 勞動人權宣言 ●張曉春 4
「勞動人權說明會」紀要 ●本刊整理 6
——張曉春、陶百川、
黃越欽、胡佛、
王義雄、郭吉仁
台灣勞工站起來！ ●何賢德 15
組織自主的工會

《海峽論壇》	民進黨與國民黨有何不同？	●王耀南	17
	誰統治著美國？	G. William DomHoff/蜀濤節譯	22
	對1987年三篇宣言的觀察	●柳芳婷	24
《特別報導》	夏潮聯誼會成立宣言		28
	夏潮聯誼會成立大會側記		
	遠方的賀詞	●蘇慶黎	31

《特稿》	熱烈期待，深切憂慮		
	——我對時局的一點理解與分析	●王拓	32
《人物》	風號大樹中天立		
	——梁漱溟先生訪問記	●任華●馳方	40
《世界之窗》	華府4、12示威遊行側記	●邱平妹	48
	——抗議雷根政府中美洲及南非政策		
	退潮中的美國新右派	●長權	52
	為什麼他們無家可歸？	●何珣	54
	「晶片大戰」的六個神話	●汪天莉	57
	智利社區「自力救濟運動」近況	●陳智中	58

《經濟》	剖析台灣的民營壟斷資本●上●	●李榮武	59
《社會檔案》	空望鄉關欲斷腸——老兵的悲願	●外省人返鄉促進會	72
	這是誰的錯？	●石文傑	74
	控訴余光中的腐敗特權行爲	●李勤岸	75
《大陸透視》	對大陸「農村改革」政策的探討	●張愛新	76
	本文剖析鄧小平派推動的農村改革， 是靠「吃老本」、借外債來顯現表面上的繁榮， 實際上破壞了原有的集體勞作的生產關係，忽視了農田基本建設		
《香江話題》	中共英國爲香港明年開選宣判死刑	●韋名	89
《文化批判》	為什麼反好萊塢？	●王墨林	92
《文藝》	台灣人看草原●上●	●陳若曦	96
	鄉土文學論戰十周年的回顧	●本刊整理	102
	——訪陳映真		

朋友！你關心台灣的前途和中國的未來嗎？

請閱讀最具前瞻性、進步性、思想性、批判性的

海峽雜誌

林教育基金會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郵費。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國外訂閱費率·歡迎為親友訂閱

《海峽雜誌訂閱單》

訂閱人： 新訂戶 續訂戶 電報掛號
 從 年 月起訂閱海峽雜誌，至 年 月止。
 訂閱(購)人(請用正楷填寫) 姓名： 先生/小姐 電話：
 地址： 郵區

郵寄方式： 平寄 掛號(每年加120元)

年齡： 25歲以下 25~34歲 35~44歲
 45~54歲 55~64歲 65歲以上

職業： ④公教 ⑤工商 ⑥金融 ⑦服務業 ⑧製造業
 ⑨建築業 ⑩自由業及專業 ⑪學生 ⑫其他

教育程度： 高中 大專 研究所以上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此次劃撥事項為限。否則應換單另寫。

通信欄

讓海峽成爲你和朋友們 共同的精神食糧

透過海峽，你們的友情更踏實翱翔的天地更遼闊

優待本刊長期訂戶：

● 每本訂價90元，全年十二期特價900元

掛號每年另加120元

● 國外一律航空郵寄：

歐美地區 \$U.S. 55元

亞太地區 \$U.S. 51元

港澳地區 \$U.S. 47元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 款 人		帳 號	第 1 1 3 4 1 5 1 - 2 號	
盧 思 岳		戶 名	盧 思 岳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 款 人		姓 名	住 址	電 話
			□ □ □ □	
郵局郵票			郵局郵票	
			郵局郵票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手續費	次	元
-----	---	---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 款 人		帳 號	第 1 1 3 4 1 5 1 - 2 號	
盧 思 岳		戶 名	盧 思 岳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 款 人		姓 名	住 址	電 話
			□ □ □ □	
郵局郵票			郵局郵票	
			郵局郵票	

主管： 經理員：

局號：

收據號碼：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手續費	次	元
-----	---	---

請注意：
一、帳號、戶名及存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繳付交撥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日、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局，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擔。如因寄信故障等原無法及時通知者，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

會金基會 林教育 會金基會 數位化

前方

與您共同進入一個全新的知識領域，與您共同擁有正確的價值觀與圓滿的世界觀。

● 6月號要目 ●

● 「民間哲學」的迷思與欺罔

「民間哲學」駸駸然成為台灣校園的文化主流，成為當前社會運動的指導思想。什麼是「民間哲學」的具體內容呢？官僚主義真的已經逼近黃昏了嗎？「民間社會」真的已經壯大興起了嗎？

本期霍亮先生的文章《從〈官僚主義的黃昏〉談民間哲學的欺罔》，分為：1. 帝國主義，2. 官僚主義，3. 東方專制主義，4. 民間社會，5. 宗教改革等五個部份詳加討論。文長一萬字，立論嚴謹，剖析深刻，茲向讀者諸君鄭重推介。

● 矢內原忠雄重估

一如後藤新平被某些台灣人崇為「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矢內原忠雄也被某些人認為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良心」，是「聖者矢內原」，事實真相如何？戴國輝先生告訴我們，矢內原既不是什麼良心，更不是什麼聖者，只是……

● 台灣農業現況的解析與報告

本刊本期以台灣農業為專輯，重點介紹兩篇文章：

第一篇是方達先生的《概說台灣的農業政策》，歷數四十年來的農業措施及其作用，說明了國民黨如何的犧牲農業扶植工業，到頭來農業不但沒有受到工業的反哺，反而被完全出賣以平衡貿易逆差，其間種種經緯脈絡細說從頭，行文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為不可多得的好文章。

另一篇是林火木先生的《我們就這樣生活著》，以農家收支帳目的形式，顯現農民的經濟生活實況，為「台灣農業破產、農村凋蔽、農民負債」的這樣一個說法，提供了確實的證據。

社址 / 台北市臥龍街195巷38號 5樓

電話 / (02) 7328478

零售80元 全省各大書局有售

全年訂閱800元

郵撥帳號 / 1025072-0林華洲



● 5月1日台大學生日，自由之愛 成員要求代聯會主席開放普選
(攝影 / 蔡明德)



● 5/19反國安法的群眾
(攝影 / 蔡明德)

慈林基金會典藏

● 女孩與嚴陣以待的警察 (反核四廠運動現場)
(攝影 / 侯聰慧)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專 輯◎

勞動人權宣言

■起草人張曉春

勞動者，勞力以及勞心工作者，是台灣經濟奇蹟的創造者。當我國台灣地區即將邁入已開發境界，在這一歷史轉捩點的時刻，我們審視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發現存在著失調現象，而且有嚴重惡化的明顯趨勢，其中焦點，在於勞工是否充足享受應有的人權。因此，根據我國憲法、勞動立法、國際勞工公約、以及世界人權文獻，並考察我國台灣地區，既往三、四十年工業化過程及勞資權利與義務關係實況，我們特提出勞工人權十二項主張如下：

第一、最低薪資要確保能維護人類尊嚴之生活

現行基本工資制度，不僅不符世界潮流，更且違背憲法保障勞工權利立法意旨；保護勞工不足，圖利資方有餘，而又容易滋生勞資糾紛。因此，應即廢止基本工資制度，實施最低薪資制度；以勞動者本人、配偶及二人子女共四人為依據，釐訂足以充分實現人類尊嚴的最低薪資標準。

第二、雇主應該完全承擔勞動者退休生活責任

工業社會，勞動者受僱為雇主工作，獲取有限額薪資以維持生計，絕大多數沒有餘力預為晚年生活籌謀。因此，勞動者退休生活，應由雇主完全承擔責任，但為確保雇主能夠履行這一法定責任，應即建立全面、完整、合理的退休制度，並且要竭盡所能貫徹實施。

第三、維護業餘私生活權利，不得任意濫施加班

徹底實施三八工作制，嚴格限制加班，並且禁止三班或兩班輪流工作制，以維護勞動者能有適當機會，享受業餘私人生活權利，尤其保護女工、童工身心健康；何況因而可以增加工作機會，促進充

份就業。

第四、調職應尊重勞動者意願，解僱要有法律依據

勞動者有其獨立人格，也有其工作技能專長；因此，調職應該尊重勞動者意願，以杜絕雇主肆意藉諸調職，以遂其脅迫勞動者無可奈何而辭職；同時，解僱勞動者要能確實符合法定要件，以消弭瀕臨退休勞動者遭受解僱，而確保勞動者之勞動人權，使勞動者退休生活免於匱乏困境。

第五、實施勞動者全體投保、全額投保、終身保險

勞工保險乃為勞動者本人，以及其應扶養家屬，應享之福利權之一，並為社會安全制度的主要支柱，雇主無一例外，應為勞動者依據實際薪資辦理勞工保險。此外，勞工保險應該一如公教保險，附帶眷屬保險，以及實施退休後續保，並且老人給付採取年金制，以提高勞工應享福利權。

第六、健全職工福利制度，提高勞動者福利權素質

職工福利金制度的功能，在於改善勞動者生活，提高勞動者的生活素質，為勞動者應享的權利；因此，應該依法提撥、保管、運用職工福利金，確保勞動者享受福利權。

第七、在工作場所，勞動者的生命要有保障

生命為人類的基本價值，雇主應為勞動者提供足以確保生命安全的工作場所，勞動者不應因謀生反而犧牲生命。

第八、在工作環境，勞動者要能免於罹患職業病

勞動者是工業污染的最先受害者，因此，雇主應在工作環境，依法徹底改善一切衛生設施，以確保勞動者免於罹患職業病。

第九、工會唯有獨立自主，社會才能健全發展

組織工會乃是勞工應有的基本權利，而工會在本質上是屬於勞工的；其功能在於保障勞工人權，促進社會發展；因此，任何個人、任何團體特別是政黨，不應以任何理由控制工會，干預工會運作，以致損害工會功能。尤其，未來勞動者趨向增加，勞動者權利意識傾向提高，基於這一情勢，工會唯有獨立自主，始能依法有所作為，以安定社會秩序。

第十、恢復罷工權，以發揮交涉權、爭議權功能

罷工權乃為勞工所擁有，藉以自保人權不受侵犯的一項權利，而且，勞工要有而又能實質行使罷工權，才能有效運用集體交涉與集體爭議權，確保十足可享應有人權。

第十一、貫徹實施勞動者參與，以促進勞資合作

勞動者保持其職位而參與經營，諸如企業營運的計劃、組織、決策、管制等事項，既可有於確保可享應有的人權，又能有效增進勞資合作，同心協力提高生產效率，謀求企業發展。同時，勞動者參與，乃為工業民主奠定基礎，除現行工廠（勞雇）會議制度，提供勞動者參與適當途徑，應予以徹底實施外，並應建立分紅入股制度及自我管理制度，以提高參與品質。

第十二、應以法定契約、工作規則規範勞資權義關係

團體協約、勞動契約以及工作（工廠）規則，乃為確立勞資雙方權利與義務關係之依據，因此，應即全面簽訂團體協約、或訂立勞動契約，以及依法公布工作規則，以為勞資雙方履行權利與義務之依據，可以有效積極預防、消極解決勞資糾紛。

我們所主張的這十二項，包含勞動者的生存權、工作權、福利權、環境權、人格權、團結權、交涉權、爭議權以及參與權諸項，在憲法以及勞動立法均有明確規定，不論勞工政策如何，公權機構是否依法運作履行職責，是勞動者能否十足享有這些人權的關鍵所在。如果公權機構未盡全責，無法確保勞動者可充足享有這些人權，則勞動者有權利以自力從事自保人權；即自力救濟亦是勞動者的基本人權之一。

最後，我們要強調指出，我們的宣言，勞動者依法能夠充足享有人權，是低層次的目標，社會因而能夠健全發展才是最高目標，憲法明示的民享境界、民生主義的安和樂利理想才能落實在我們生活的這個土地上。

以下連署簽名人，對勞工權益容或另有主張，但共同認為本宣言有關勞工人權的內容，為當前社會健全發展應該積極爭取實踐迫切解決的項目。

王作榮	王義雄	王聰松	文崇一
李元貞	李友吉	李永熾	李亦園
李鴻禧	林鐘雄	胡台麗	胡佛
徐正光	陶百川	柴松林	韋政通
郭吉仁	黃光國	陳永興	陳映真
陳國鈞	陳雲中	黃越欽	黃榮村
張天開	張忠棟	張茂桂	葉啟政
楊青矗	楊國樞	廖義男	鄭為元
鄭欽仁	蔡墩銘	駱文森	蕭新煌
謝深山	蘇煥洽		

◎專 輯◎

「勞動人權宣言」

說明會記要 ■本刊整理

台灣數十年來，靠犧牲勞工來降低生產成本、吸引外資，使台灣經濟有相當的發展，勞工權益也因而長期受到剝奪，勞工法律形同虛文。「勞動人權宣言」的發表可促使當局落實勞工權益的保障，極有助於光復勞工人權，為勞工爭回公道。





張曉春

台大社會系教授

「三、四十年來，勞工沒有享受到應享的法律權利。我們的十二項主張要求把法律規定的勞工權益確實貫徹，不再是徒具虛文。」

我們發表「勞動人權宣言」是因為感到過去勞動大眾沒有享受到法律規定的權益，沒有受到尊重。去年我在工商時報的勞動節特刊，發表了一篇「還我權利」，今年就想草擬一篇「勞動人權宣言」，聯合社會關心勞動者權利的人士一起簽署。原先擬定的聯署名單以學術界中常撰文關懷社會、勞工的學者為主。後來又想到勞工團體選出的立法委員及全國、台灣省兩個總工會的理事長也應列入。兩個總工會的理事長最早拿到「宣言」，卻遲不回覆，後來全國總工會理事長說他要發表「告台灣勞工同胞書」，為免衝突，不能簽；台灣省總工會理事長也拒簽。立委部分，我們先找國民黨籍的，隔了三天，毫無反應。再找非國民黨籍的，他們立刻就同意簽署。

這篇宣言原訂4月30日才正式公布，但「中國時報」記者拿到影印本後，在4月24日就先報導了。陶百川老先生見報後，透過胡佛教授向我表示支持「宣言」，樂於參與聯署。「中國時報」也專訪了陶老。國民黨的兩位工人團體立委見陶老加入簽署，才改變態度表示也要聯署。陸續又有些人見狀想加入，因與原先構想不合，我們都拒絕了。

聯署「宣言」的人對勞工的權利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大概都同意「宣言」中的十二項主張是亟待解決的要事。全國總工會理事長發表的「告台灣勞工同胞書」說，若干學者發表的「勞動人權宣言

」了無新意、平淡無奇。但我要指出，這十二項主張每項都根據勞工法或憲法而來，然而，三、四十年來，勞工卻沒有享受到這些應享的法律權利。這些主張固然平淡，卻有其現實的需要。我們要質問全國總工會理事長：從總工會到地方工會，這十二條做到幾條？或者每條做到幾分？你沒有做到，就沒有權利講話；你沒有做到，不但對不起勞工，也對不起整個社會與我們的同胞。兩三年前，礦坑因安全措施不良導致災變頻生，死傷兩百多個礦工，我在一些討論會中指責台灣的工會是被關掉的公雞，因此去年12月19日，台灣省總工會說要告我，我靜觀其變，兩個禮拜後，他們說不告了，要我公開道歉，我在「工商時報」上反駁，該公開道歉的是他們各級工會幹部，不是我。

我們這十二項主張誠然平淡，但是要求把法律規定的勞工權益確實貫徹，不再是徒具虛文。「勞動基準法」實行至今將近三年，好不容易才在去年11月11日實行退休準備金提撥制度，全台灣應該提撥退休準備金的有將近十五萬家的廠商，但到4月底只有4千多家提撥，僅占3%。「勞動基準法」原為勞工的權利而制定，實行三年卻績效不彰。我們的十二項主張就是要讓法律真正發揮效果，讓勞工真正得到保障，這是我們的期望。

民以食為天，一個人的生存權受到傷害自然會起而抗爭。真能做到「宣言」中的十二項主張，所

謂「勞資和諧」才不會流於口號。台灣三十多年來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脫節，這十二項主張如能實現，才可縮小兩種發展間的差距，否則經濟指標已到已開發階段而社會發展仍在開發中狀態的話，我

們的社會就得爲此一差距付出無可估計的代價。因此，這十二項主張如受到重視，並逐步實現，不僅我們這一代受益，整個社會也能健全發展起來。



陶百川

國策顧問

「要是漫無限度地限制罷工權，對罷工權加上違反公道的限制，我們應該要奮鬥，力求解除這種限制。」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我在報上見到幾位教授和立法委員共同連署要發表一篇勞動人權宣言。這宣言裡的12項主張就如張教授提到某位先生所說的評語：了無新意，平淡無奇，我有同感。特別我這個年紀的人看來，這些主張的確是了無新意。在我二十幾歲，民國十八、十九年時，已經由國民黨把今天的這些主張訂爲三民主義的勞工政策。比如說工會法，工廠法，勞資爭議處理法，像這幾個勞工基本大法，在60年前就已經訂立下來，現在還是那個規模，那個老面孔，真是所謂了無新意，平淡無奇。可是要把這些了無新意，平淡無奇的東西全面實施、徹底實現，真是不容易的事。因此這十二項主張，我們必須重新努力把它貫徹。我覺得我個人應該提供一些力量，所以當時就打電話給胡教授，想參加這簽名，想知道簽名的人有無限制，我夠不夠資格。我自己毛遂自薦一番。我在大學裏教過一門勞工法，寫過一本「中國勞動法的理論與實務」，這都是50年以上的事了。抗戰之前，我們在上海組織了一個「中國勞動協會」，結合勞工領袖，研究勞動法的專家學者及勞工行政人員。我的構想是把這三種人結合起來，

可以對勞資問題發揮很大的力量。那時我是一個發起人，後來也擔任過他們的常務理事與理事長。我把這個履歷向胡佛先生說了一遍，他就打電話給張教授，張教授也欣然同意。

工人有了罷工權，勞資糾紛不易擴大

這12項主張剛出現時，有些人害怕，有的報紙覺得不大對勁不願意報導。其實這在60年前國民政府已經把它訂爲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勞工政策。50多年前我就覺察到這問題。但直到現在我頭髮這麼白了，這問題還是存在，我真是大失所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張教授發表這個宣言來重新強調，以引起政府的重視，各界的響應，這是非常好的事。我又想到爲什麼有些人會怕這個宣言，有些報紙不太願意去報導呢？可能是因爲這12項主張裏面有一些他們覺得有點刺激性。比方說罷工權。其實這種顧慮畏懼都是多餘的。這罷工權已經爲全世界所公認，就連那麼多的專制的共產黨也不敢否認工人的

罷工權。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裏，我們的政府也沒有否認罷工權，只是加上了許多限制。譬如罷工前要經過協調、仲裁，交通事業、公營事業不得罷工，非常時期不得罷工，然而罷工權的基本權利在我們的法令、政策、政綱裏是加以肯定的，並沒有否定。所以不應該怕主張罷工權。對罷工權的限制也應有個限度，應合乎公道。要是漫無限度地限制罷工權，對罷工權加上違反公道，違反公共利益的限制，我們應該要奮鬥，力求這種限制的解除。例如：非常時期，任何行業都不得罷工。這種漫無限度的不合理限制在戒嚴令解除之後，都應取消以恢復勞工應有的罷工權。現有其他的限制，還須請各位教授專家努力，透過社會公眾的協助，逐步將

其解除。

工人有了罷工權之後，在和資方談判的時候，就等於有了武器，資方或政府負責協調的人見工人有這個武器，會有所顧忌，糾紛就不致擴大，不致造成災害。勞資之間的關係反而可以更和諧。罷工權恢復之後，可以備而不用。因此不必害怕會有什麼威脅。我個人已 85 歲，可謂來日無多，這麼古老的問題，我們那時候不能解決，要待你們年輕的一輩再來呼籲，真是相當失望。希望這次重提這個問題能引起政府、社會的重視，使其一勞永逸，將來可以安心地看到社會和諧及勞資合作。



黃越欽

政大法律系教授

「我們的外銷數額和外匯存底，名列國際前茅，勞工的工資卻遠落在後。我們必須全面調整、檢討這個總體剩餘價值的差距。」

「勞動人權宣言」有喚起注意、調整差距的意義，絕不是用「了無新意」四字可以抹煞的。

第一個意義是：調整時代差距。我們的勞工法令是民國 17 年到 25 年，北伐成功，國民政府成立到抗戰前夕，這所謂國府的黃金十年間制定下來的。當時的法律充滿革命性，把世界上最進步的法律都吸納進去了。可惜，這種精神沒有貫徹。民國 25 年就頒佈了勞動契約法、最低工資法、職業介紹法，卻至今沒有實行。法律的公佈與實行竟差距 50 年以上，這是全世界立法史少有的。我們的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及執政黨都沒有盡責，要負很大的責任。

台灣社會是 「損不足以奉有餘」

民國 38 年到 45 年的法律，憑良心講，還不錯。當時為了一方面對抗中共在大陸的土改，一方面對國際表示我們不是一個官僚資本主義的政府，而是個三民主義的政府，就在台灣實行了土地改革，因此還有點社會主義的色彩，這時候的法律也還頗有點中興氣象。可惜，此後的氣象就愈趨消沈了。近十年來的法律，大致上都是種病理反映，什麼槍炮

彈藥管制、緊急逮捕等等，時代整個錯亂。所幸，即將解嚴。因戒嚴而被限制的權利，在解嚴後都可以充分行使。40年來，壓制工會、限制工人權利的藉口，在解嚴後全會去掉。「勞動人權宣言」在此時發表，正有提醒大家要調整時代差距的功用。

宣言的第二個意義是調整社會發展的差距。過去40年來的社會發展可說有成就，但問題也很大。例如：以農業支持工業、以生產業支持商業、以勞動者來養消費者。老子說：「天之道，損有餘以奉不足」。應當是讓有餘的人去掉一點，不足的人獲得一點。這幾年下來，卻有點「損不足而奉有餘」。這「宣言」也提醒大家：有餘者與不足者之間的差距有愈來愈惡化、加大的傾向，實有調整的必要。

台灣的勞動者，最保守的估計有5百萬，如果把勞心、勞力的受僱者都包括在內，數目就更高，可說是社會的大多數。那麼，勞動者生活品質的好壞，就是大多數國民生活品質的好壞；勞動者的生存有沒有保障，就是大多數國民的生活有沒有保障；勞動者的尊嚴也就是大家的尊嚴。這個「宣言」就在提醒大家應調整這社會發展的差距，不要讓大多數的國民，過沒有尊嚴，沒有保障，不認識自己權益的生活。

「宣言」的第三個意義是：調整認知的差距。國民黨最初的勞工政策在對勞動者生存的保障和工運的扶持上，可說與當時最進步的思想一致。但後來反悔了，給勞工開的支票兌現不了，而且還要改動，這就不像話了。

我指導過十來篇研究勞工法的碩士論文。有位同學寫的就是談勞資雙方要有平等的武器。也就是說，老板若可以開除工人、減薪、閉廠；勞工就要有罷工權，才算平等。結果，這篇論文沒人敢審，這就是認知的差距。

勞工變成老闆生財工具上的一個數字

爲什麼勞資雙方要武器平等？勞資雙方是契約

關係，可是幾十年來的運作和契約完全不一樣。有一方不斷在壯大。勞工一個人，可是對手從個人到合夥，合夥到公司，公司到財團，財團到關係企業，關係企業到跨國公司，到國營企業。個人面對這樣巨無霸的時候，相較之後就變小，到後來就變成一個數字而已，變成老闆生財工具財產上的一個小小數字，這數字可以用橡皮擦擦掉不見。爲了避免這種現象，只有讓勞動者可以集合在一起。所以不要把憲法第15條的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看做並排的權利。生存權最重要，是全國民所共有。財產權比較偏重資方，因爲資方的生存不是靠工作，而是靠財產。勞方是靠勞動爲生，勞方如果有財產，可以不用那麼辛苦。資方的財產權下有兩個權利，一個是所有權，一個是經營權。勞方在工作權底下有三個權利，一是組織工會的結社權，第二是集體交涉權。第三是爭議權。這架構無非是使勞資雙方武裝平等而已。可是今天來看，這套東西像天方夜譚，並沒有實行。勞資雙方認知上的差距非常大，今天不把勞工看作夥計、生財工具上的數字的老闆非常少。我們希望能夠讓勞資雙方處於平等地位，變成一個社會夥伴。所謂的Social Partners。近十年來，歐洲法學界是把勞資雙方看成所謂「社會計劃的共同執行人」，這種認知差距，希望能透過這宣言而有所調整，這一點調整非常重要。

最後，從這個「宣言」公佈後，我們應該使勞動人權的保障邁向國際基準，這個調整非常重要。有一位工會領袖看到「宣言」後說，全國總工會是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的創始會員之一，這個組織每年「五一」勞動節所發表的宣言中其所屬的96國144個勞工組織的8500萬個會員作爲自由勞工運動的指標和工作的指導原則，何需張教授草擬「勞動人權宣言」？我要鄭重地強調，這正是問題的癥結：我們今天必須邁向國際基準。

三年前，公佈了勞動基準法，那時政府也跟公佈國家賠償法時，大吹其牛，什麼美意、善意之類的漂亮詞句都用上了。後來發現，國家賠償法，除

了吹牛，什麼作用都沒有。勞動基準法也一樣，公佈以後，勞工權利受侵害時，連找誰都不知道。別以為勞基法一公佈，工人就鬧翻天了，其實距離國際基準太遠了。我們一提到外銷數額時，就沾沾自喜，為什麼不看看我們的勞工工資排名第幾？我們的外銷數額、國民所得和在外國存款數名列國際前

茅，而勞工的工資卻遠落在後，這差距是誰造成的？這差距該怎麼辦？這差距當然要調整！這個差距不是個老闆與工人間的剩餘價值的小差距，是總體的剩餘價值的差距，這必須要全面來調整，全面來檢討。



胡佛

台大政治系教授

「我們談回歸憲法，不光是政府的結構要回歸憲法，政府的社會主義政策也要回歸憲法。」

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無錢無勢的， 找不到社會的正義

我覺得「勞動人權宣言」的發表關係到台灣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發展，有很嚴肅的意義。今天社會的病態造成社會風氣、道德極為嚴重的敗壞。我們應了解造成犯罪者的社會因素，並不是制裁作奸犯科的少數人，由他們來承擔社會的問題，社會問題就解決了。近年來，一方面是有些人不斷地奢侈、浪費，一方面是低收入者生活愈來愈困難。老實說，今天的社會非常功利，有錢有勢就好辦，無錢無勢的，找不到社會的正義。工人、農人在社會結構中是否能得到合理的分配？是否能維持社會的正義？這個問題再不重視，台灣的基層結構、倫理結構、文化結構都會發生問題。政治、經濟、社會的安定也就不可得了。這類問題，社會連帶的理論早就談到了。這個理論是說，每一行業的利益

都是整體社會的利益，絕不能只讓少數人自由發揮，佔有利益，而另一部分卻永遠處在不利的地位，這一定導致社會的衝突、政治的不安，進而影響整體的安定，也就是說，社會整體的人都要照顧到。

政府不可爲了增產、外銷，置勞工於不顧，我們應讓勞資雙方都可公平地分配到利益，一起得到好處。

政治的基本人權與生存權、工作權等社會人權是近代世界的主流，且有合轍的趨勢。美國在 1930 年代，太重視企業家的特權，導致經濟大恐慌。羅斯福總統的新政（New Deal）就是實行社會福利，把美國社會安定下來，然後才有進一步的工業化及經濟的成長，自此以後，世界各地都對社會人權相當重視。這個主流在民國初年，中山先生已經看得很清楚，一個是要自由權、要民主；另一方面是要社會人權、社會主義、社會福利。中山先生說，三民主義要一起實行，不要像其他國家分段解決。只有一般的政治人權，很可能只有有錢人能享受到，沒錢的低收入者若沒有相當的保障就享受不到

同等的政治自由。中山先生就是要結合民主與社會主義，所以國民黨改組時，他的主要政策就是罷工政策，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特別重視這兩點。我想，這個看法是非常正確、非常高瞻遠矚的。

政府遷台後，在農民政策上有很大的改進，如公地放領、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這些政策在大陸時不容易做到，大陸人口中農民，特別是佃農佔大多數，而政治上有權利的人大多是有錢人、地主，因此反對減租、耕者有其田；就因為從來不照三民主義的國父遺教來解決農村問題，共產黨才能在農村生根。到台灣後，痛定思痛，就實行耕者有其田，但還是有很多人反對，說這樣一搞，整個農村結構都破壞了，生產會有問題，但實行的結果證明對農業生產、對資金的活潑及工業化有幫助。反共最大的武器就是我們解決了以前不敢解決的問題。

改革勞資結構， 改善勞工生活

台灣工業化以後，政府必須高瞻遠矚以解決社會問題，特別是勞工問題。我們的經濟學者、經濟決策者假如再不注重勞工問題，只注重資本家，讓他們不斷取得超額的利潤，甚至讓經濟犯把資金帶到美國，丟下勞工不管，一定會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勞動人權宣言」及時發佈，正好提醒政府要有遠大的眼光，像當年改革台灣土地制度一樣，來改革勞資的結構，讓勞工生活改善，得到正義，不到處欺騙他們、壓迫他們，把所有的生產與外銷都給資本家壟斷了。這個宣言講的，雖然平淡無奇，但有嚴肅的作用，我一再強調，就在於此。這問題解決，再進一步解決社會的問題就比較容易了。假如時時地壓迫它，隱瞞它，我想這樣雖然得到工商人士的支持，但實際上掩蓋了社會的現實，而導向不安定，不健全的方向。如這十二點能一點一點慎重地做，早日解決，我相信對台灣工業化後整體的發展、安定都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台灣工業化到現在，整個的經濟結構、工業結構，要有相當大的改良。政府老想權力無限，什麼都抓在手裏邊，然後用這個權來支持不合理的勞資結構，以為這樣就是安定。事實上，這只能做到表面的安定。假如勞資雙方有合理的待遇，如這宣言裏所談的，勞力有保險，生活有照顧，勞工就更願意在工廠裏共同參加，共同努力。這樣可以使很多投機取巧的，沒有道德的工廠廠主無法生存。要改變結構，讓那些有道德的，有社會責任的廠主跟工人好好合作。不讓那些機會主義者、投機、違法的人，或者跟政治勾結的人有特權，這樣勞資結構就更健全，更能增加生產，品質更好，在世界上更有信用。把暴利的心態拿掉，把責任心拿出來，這是工業化最重要的一環。這與勞工有相當大的關係，為何不能這麼做呢？另外我有個感覺，政府要多鼓勵、推動社會的多元化，讓社會本身來發揮潛力分攤進步的責任。大家如果有很好的待遇與正義感的滿足，社會的潛能就能發揮出來，這絕不是政府的控制所能做到的。社會的多元化能使社會發揮潛能，勞工的組織、資本家的組織、商業的組織等於社會的細胞，每個細胞都健全，都發揮作用，這身體才健康，決不是靠一個政府的頭腦在運作，要整體的好。社會的多元化要輔導勞工的組織，讓它能自治、有權。對其他的團體的組織，我也持同樣的看法；讓他們自治、照顧自己。絕對不能說每一個組織，包括勞工的組織都是執政黨的派設機構，這樣的話，不能發揮它社會的作用，不能變成一個支持的作用。消極的，無法做到對勞工福利的保障；積極的，不能分攤社會發展的責任。怎麼樣從現在開始，讓社會真正地多元化，讓每個社會團體能自治、獨立、自主，分攤社會的責任，這是未來發展的方向。我覺得「勞動人權宣言」應當更進一步規劃整個社會的福利。西方國家行之多年，一般民衆失業有救濟，老年人有老年救濟金，醫療方面有補助費，當然有的北歐國家做的過多，但整個社會安定。我們口口聲聲說我們實行三民主義。但民生主義

我們做的實在不夠，應該進一步對失業、貧窮、生病的人口加以照顧。很多我們罵它資本主義的國家像加拿大、美國，都比台灣做得好得多。我們三民主義的國家該如何努力，政府要好好規劃，絕對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沒有整體的社會政策。憲法裏有基本國策，除了談工作權、生存權以外，基本國策是民生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政策，保障童工、

保障工時，保障婦女工作者，我們談回歸憲法不光是政府的結構要回歸憲法，政府的政策、政府的社會主義的政策都要回歸憲法。能照法律的規定去做，有很多好處；不做，很多的社會問題會越來越惡化。今天勞動宣言把這些提出來，有它嚴肅的一面，可喜的一面。



王義雄

立法委員

「台灣幾十年來，靠犧牲勞工，累積資本。執政黨過去偏袒資本家，現在該回過頭來照顧廣大的社會大眾。」

剛才胡教授一再提到社會安全制度若沒有建立，社會就很難安定，個人深有同感。政府並沒有落實社會安全政策，例如：國家總預算中，社會福利救濟只編了 2 億 8 千多萬，勞工業務則只有 7 千 3 百多萬。台灣現在納入勞保體系的勞工有 5 百多萬，未納入的有 1 百多萬，共約 6 百多萬，如果連這六百多萬勞工所養活的家屬，共佔總人口的半數左右，對這約一半總人口的人，只編了 7 千 3 百多萬元的預算，比中正紀念堂的藝術廳的管理費 1 億多元還來得少。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執政黨對社會安全制度非常不重視。為什麼不重視？第一是政治上的因素：執政黨認為在大陸之所以失敗是因中共鼓動了農民、工人運動。退守到台灣後，為爭取農民的好感而實施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來解除地主加在農民身上的枷鎖。但對勞工則只說些動聽而空洞的言辭，骨子裏卻採取壓制、敵視的政策。我敢說，「勞動人權宣言」若在二十年前發

表，張教授及聯署的人，隔天就看不到了。再就是經濟上的原因：一個國家除非走社會主義路線，若走資本主義路線，在發展的早期就得犧牲勞工來累積資本。回顧十七世紀產業革命時，英國資本家的財富就是靠勞工的血汗累積起來的，早期的勞工可說不見天日，十幾歲的童工在工廠中如陷煉獄。因此，連主張功利主義的邊沁後來也必須修正。社會主義理論、馬克斯的「資本論」都是看到資本家慘無人道地壓制勞工，才應運而生的。執政黨雖標榜三民主義，但走的還是資本主義路線。台灣幾十年來，靠犧牲勞工，累積資本，執政黨偏袒資本家，犧牲勞工，這種政策上的偏頗是否認不了的。四十年來，台灣的資本已累積到相當程度，外匯存底達五百六十多億美元，名列世界前茅。可是，經濟的繁榮卻沒有落實到社會大眾上。於是，就如胡教授所言，社會安定無法確保。假設台灣的貧富差距像菲律賓那麼懸殊，也會發生動亂。

台灣的勞工及賴勞工薪資為生的人約有 9 百萬到 1 千萬，這才是真正的社會大眾。我們經濟的繁榮沒有回饋到社會大眾，社會安全當然就有問題了。勞資糾紛、自力救濟之所以頻繁，就因為人民的生存權受到威脅。執政黨過去四十年照顧資本案，現在應該回過頭來照顧廣大的社會大眾，把工人的地位提升到和資本案平等，這就像人須兩腳都健全才能走、跑，這樣社會才能健全，自力救濟才會消弭。

執政黨常說，老百姓最近一直向公權力挑戰，但如果他的權利受到保護了，何必自力救濟，冒坐牢的危險？我在南部執業律師接過好幾件大案子，像中船、台灣紗紡、大同重工；特別是「和信興」鬧得最厲害。「和信興」老闆過舊曆年時，沒發工資，工人怕老闆晚上偷偷摸摸把豬運出去賣，不願

十二月的寒風，拿草蓆在豬寮邊守夜，露宿終宵，為的就是求生存。政府如果善加保障勞工的權利，我相信，在寒風刺骨的十二月，別人在家酣睡，這些勞工絕不需要在屋外忍受寒風砭骨之苦。再舉個例，有個公家機關的勞工再一、二個月就退休了，因為退休金與遣散費差約十多萬，這家公家機關為了省錢，就借故說要裁減業務把他遣散了。連公家機關都這麼做了，何況私人機構？

執政黨應該要反省，勞工犧牲了四十年，讓資本案累積了許多資本。現在該回頭來多照顧勞工，全國總工會理事長說「宣言」所談的十二項主張「了無新意」，我們不說冠冕堂皇的理論，當然「了無新意」，但我們要求把這十二項平淡的主張實現，從平淡的主張中確保勞工的權益。



郭吉仁

律師

「我簽署了宣言後，一個開工廠的好友，怒氣沖沖地說從此我們是不同國的人！」

三年前我們成立了「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每年大約接 150 件案子。據我們統計，兩年前的那一整年，我們替勞工爭取的金額超過兩百萬元。我們原有 5 位專職人員，今年七月，我也開始專任勞支會的律師，替勞工辦案子。

「勞動人權宣言」的重要意義之一是有 39 位社會菁英公開站在勞工這邊，這樣的集體宣言有可能進一步成為集體的社會運動。我想，當年英國有個「費邊社」促成工黨的成立，當時大約也類似今天這個社會的知識份子公開向社會聲明站在勞工這邊

吧！我簽署了宣言的第二天，有位開工廠的好朋友氣沖沖地打電話來罵我說：「你們這個宣言要把我害死，我以前不知道你的立場，以後你就幫勞工，不幫我了，從此我們是不同國的人！」

我想這個宣言的重大意義就是這很可能會朝向一個知識份子領導工人，以工人為訴求的社會運動。知識份子領導的社會運動應該是溫和、理性、合法的運動，如果還不被允許的話，就只好由勞工自己來發起勞工運動，這恐怕不是條好的路。我覺得由知識份子、社會中堅份子來發起，是比較好的。

◎專 輯◎

台灣勞工站起來！

組織自主的工會

■何賢德

今天台灣社會的每位住民（同胞）已經把自私自利的心態提高到最高峯，造成資方，中產階級，勞動者的斷層，使台灣 500 萬的勞工，也是目前創造經濟奇蹟的耕營者，無法得到應得的權利，這是非常不平衡的。不合乎情理的現象。

欲壓制自私自利的心態，必須堅定咱的信心，因無信心的人，就無力量去影響他人建立信心，容易被外人所分離、分化。造成勾心鬥法，自相殘殺。年久日深形成自我圍成一個勞工監牢，成為 40 年來被資產階級的經濟政策所利用的犧牲者。使台灣的勞工不能與世界同等勞工得到應得的平等待遇與地位。

用群眾的力量 爭取勞工應得的權利。

今天要談保障勞工人權，首先要創造『新環境』，咱不要自暴自棄，被過去的不幸所麻醉，將咱台灣人肯吃苦、肯打拚、肯犧牲的民族精神發揮出來，拋棄舊日的自私自利的觀念，灌輸新精神教育，提醒咱的民族道德與尊嚴，用共同的信念，凝聚成廣

大（超然）的力量，產生共鳴，由各位勞工組成各種團體（就是所謂的勞工自己的工會，不是執政黨及資方所控制的工會）用群眾的力量爭取咱勞工應得的權利。本人奉勸各位勞工朋友，在領導階層，剝削咱四十年後的今天想欲施捨點勞工權利時，大家不去爭取，等政權有變化，軍事統治再產生時，恐為時已晚了。在此我有經驗的告訴大家，我們計程車司機為了 30 年來交通政策的失敗，造成的司機脫行自救運動，成立台北計程車司機聯誼會，九個月來的奮鬥與抗議，在勞工界已經有了迴響，我們用車隊包圍交通部、內政部、立法院、行政院、及台北市政府，在台北市建國橋下休息站，建立司機民主廣場，每天給司機勞工灌輸的民主教育，為司機解決任何困苦的難題，給有關單位非常大的壓力，才有今天的蔣經國總統（元首）的照顧伍佰萬勞工，成立勞工署的政策。同時並感動了一位偉大的社會學者，也是台灣大學社會系的張曉春教授，在本月 30 日發表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勞動人權宣言”，連署人是國策顧問，中國近代包青天陶百川先生等卅多名學者、專家、民意代

●台北計程車司機組織了自主的工會



表。陶百川先生曾在 4 月 25 日中國時報發表他與故立委陸京士在上海就有此動機，終於在 40 年後的今天了却了此番心事。

經我們的顧問，台灣勞工之友張曉春教授的啓發，我們在四月 16 日成立台北市計程車司機工會籌備會，並在近日中正式成立工會。這是 40 年來第一個真正由勞工組織起來的工會，不是國民黨自己製造的工會，其意義非常重大，在此我也呼籲其他職業、產業等各種勞工團體也趕緊成立屬於自己的工會，如此咱們才有希望，才

有真正的群眾力量，最後請各位勞工朋友一定要好好的牢記，新的希望已在眼前，放棄舊的自私自利的觀念，創造新的環境，提高民族道德與尊嚴，用群眾的力量，共同來爭取，如此咱的光明日子就會來臨，勞動者的人權就會永遠得到保障。

台北市計程車司機工會籌備會
執行委員會主任委員
何 賢 德 敬 言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 四 月 廿九 日

慈林教育基金會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六一七」

日本據台國耻紀念會

主持人：王曉波（世新教授）
演講人及講題：
劉明（前台灣重義會副會長）
日據時代的所見與所感
周合源（前台灣文化協會中委）
回憶「始政紀念日」的種種
王紫玉（前台灣工友協助會宣傳部長）
台灣工友協助會的過程
嚴秀峯（前台灣義勇總隊長李友邦將軍夫人）
台灣義勇隊與抗戰

台灣史研究會 啓

時間：六月十七日下午七時
地點：耕莘文學院（台北市辛亥路·羅斯福路三段口）

◎海峽論壇◎

民進黨與

■王耀南

國民黨有何不同？

國民黨籍增額立委「接收」了不少民進黨立委的議題，並在個別的地方性問題打破了政黨的界限，而難分彼此，兩者有日趨同調的走向。

今年二月開議之立法院第一屆第七十九會期隨著去年年底選出之增額立委的加入而熱鬧非凡。一方面，向來單打獨鬥的黨外立委，首次以民進黨立委的身份出現，給立法院帶來新的動力。另一方面，由於終身立委加速老化及凋零，倖存者數量上雖仍佔優勢，他們之佔據立法院領導要津，卻引起增額立委——不論是民進黨籍或國民黨籍——的不滿，新舊之間的意見鴻溝逐漸加深。

但是，七十九會期的立法院呈現了二種特色。一是民進黨與國民黨立委的對抗。另一是不分黨籍的增額立委與終身立委的對抗。由於前者，我們發現在一些攸關體制的根本問題，雙方之差距不因政黨對抗而有所縮短。後者對抗結果導致增額委員之間建立某種共識，因而對國是的想法頗多重疊之處。事實上，國民黨籍增額立委「接收」了一些歷年來只有黨外立委才敢提出的敏感話題。此可從今年四月初告一段落的施政總質詢內容看出端倪。

國民黨籍立委 「接收」黨外的資源

以「二二八事件」為例，先前，國民黨籍增額立委，提都不敢提它，但在這個會期中，吳德美委員就「以前瞻眼光看歷史問題，以歷史眼光看未來發展」為題目，提出二二八事件。她說：

「從本席有記憶開始，這個日子似乎就是個禁忌、一個陰影。老實說，對於這個日子，本席不知道的，要比所知道的多，相信今天，此地大多數人也和本席一樣。」

「今天的政府，既是成功領導台灣創造奇蹟與開放社會的政府，而政府中的領導人，也沒有一個人應為當年的不幸事件負直接當事責任，在這種情況下就應該以平常心來對待這個歷史問題，即使不必鼓勵討論，却也不必心存禁忌。」

林聯輝委員在總質詢中說：

「政府對此一事件因未作明白的澄清，而任由少許人多年以此為題，一再質疑，甚至在國內外召開各種演講及座談會。由於政府鸵鳥心理作祟，有關此一事件真相，也只有人云亦云，道聽塗說，甚至盲目揣測，以訛傳訛。」

這樣的提法雖只點到為止似地要求政府以平常心面對此一事件，但已難能可貴



●吳淑珍：「政府當局沒有走出二二八陰影的誠意。」



●林鈺祥：「大陸代表制問題敏感，要謹慎處理。」

了。比較來說，民進黨立委看法較尖銳。
吳淑珍委員說：

「俞院長剛才在答詢中，一如本席所料，仍然不肯坦承執政當局對待台灣人有歧視待遇存在，…這就是本席所說的始終看不出執政當局有走出二二八陰影的誠意。」

「台灣的民主運動，從二二八為嚆矢，即以台灣人被壓迫為肇端……。」

余政憲委員則說：

「二二八的傷口怎麼可能主動癒合？到了今天，二二八的真相還不能公佈，數萬死難者的家屬還得不到慰藉，歷史的公道還不能還給歷史，國民黨政府還是一樣死不認錯，還是一樣把殺戮台灣人民的殘酷暴行視為理所當然。」

國民黨籍立委提出二二八，不管是基於個人的體會或基於政策考慮以便讓執政當局藉機對此事表態，其說法除了措辭較為婉轉之外，已與民進黨立委的立場相差無幾。

國民黨民進黨立委 出發點不同，結論却一致

巧的是，由於對二二八事件意義的體認相差無幾，由是而延伸為對公共政策的要求也幾乎立場一致。國民黨籍吳德美委員認為二二八事件造成省籍「差異」已逐漸模糊，因此為避免「撕裂已經融合的省籍差異」，她反對為充實中央民意代表而設計的大陸省籍代表制。吳淑珍委員則認為，不但中央民意代表中外省籍佔絕大多數，事實上，黨（國民黨）、政、軍、特等官僚系統中，台灣籍人士均佔微不足道的比例。她說，大陸代表何以需要保障？台灣人四十年行使的都是不完全的「三七

五減租式」的選舉權。

這兩種觀點差異之處在於，前者接受官方所謂「省籍差異」不存在的看法，而後者意見剛好相反，但兩者都歸結到擬議中的大陸代表制將有造成省籍差異的效果。可以說，這兩種意見出發點不同，但結論是相當一致的。

部份國民黨籍立委不僅在二二八及大陸代表制等問題方面看法與民進黨立委相去不遠，對於如何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也有明顯重疊之處。

目前中央民意代表仍停留在「第一屆」，終身代表的老化日益嚴重。國民黨官方亦表示「正在研擬辦法予以充實」，歷年黨外立委及民進黨立委都主張全面改選，部份國民黨籍的增額立委也已開始接受這種看法。

黃主文委員在總質詢中說：

「中央民意代表未能全面改選，也是落實政黨政治的絆腳石。事實上民間的反應或民意調查顯示，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是大家共同的心聲。」

「…大陸淪陷區亦將有代表選出，本席期期以為不可，本席認為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如果設立大陸代表，勢必使我們的憲政體制變成一片混亂。例如不是大陸同胞選出的代表，怎能代表大陸民意？」

林鈺祥委員則說：

「大陸代表制規劃問題最具敏感性，若處理不當，將造成嚴重的危機問題，甚至破壞國內團結，造成不良的國際視聽，引起政治上無休止的紛爭。」

「台灣選出的增額立法委員在目前憲政體制下即有全中國代表性。」

其他國民黨籍增額立委如林源朗、呂

●黃煌雄提出要養存終身民代，遭胡秋原立委抗議。



●洪昭男：「回大陸省親，政府應採彈性作法。」



●朱高正

學儀、林健治、林聯輝、陳適庸等委員也有類似的看法。

這樣的觀點對民進黨立委來說並不算新鮮，早在民國六十七年，黨外就已提出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主張。現在國民黨籍立委「接收」這種主張，一則表示，拖延四十年的終身職民意代表問題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再則表示，他們與民進黨立委一樣來自民間，三年改選一次的壓力，迫使他們必須顧及民意不能完全站在官方的立場講話。三則表示，如果中央民意代表全部改選而又不設大陸省籍代表制，則每三年改選之立委名額必大幅增加，對民進黨立委固然有利，對國民黨籍增額立委又何嘗不是？

黃煌雄提出讓終身民代繼續在台「養存」

民進黨立委對這個問題則有進一步的發揮。黃煌雄委員提出，基於「現實政治的權衡，也不妨考慮讓其（終身職中央民意代表）繼續在台『養存』，以維持全國

形式統一的法統觀念」。

「養存」概念實際上為解決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提供了解決方向。因為所謂民意代表就不能不定期接受選民的考驗，終身職的民意代表已沒有民意基礎，充其量只是法統的象徵，應不得與定期改選之民意代表一起行使統治權。

這項理論事實上在為全體增額立委爭取百分之百的立法權，所以，一經提出，只有一名終身職立委胡秋原提出抗議，未見增額立委有何異議。

增額立委對公共政策看法類似，除了二二八及改選中央民意代表問題之外，在對大陸政策方面看法也有諸多雷同之處。民進黨立委與若干國民黨增額立委都異口同聲對國民黨政府現行大陸政策表示不滿。

政府對中共的態度，實乃天龍八「不」

謝美惠委員說：

「我政府對中共一貫的態度是『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對亞銀的態度是『不接受、不出席、不退出』，在國際間非政府組織中對中共的態度是『不退讓、不迴避』，本席稱此為天龍八『不』」。

「是真天龍則應水擊千里，一飛衝天，左右逢源，運行自如，敢問政府自設八『不』是步步為營或步履維艱呢？」

洪昭男委員則勸告國民黨政府不可因反共而恐共，對於國人與大陸親友探親聯繫應採取彈性作法，他提到轉口貿易問題時說：

「諸如轉口貿易的問題，政府一向採取不聞不問的作法，但若有人檢舉，則又難免牢獄之災，……這種政策與執行的偏



●許國泰



●王義雄：「台灣問題和平解決」

頗，以及因之所產生的自力或準自力救濟，就顯示我國政策評估制度之未能完整建立，以及決策官員怕事的鴛鳥心態。」

李勝峯委員抨擊國民黨政府缺乏明確的大陸政策，因此他主張：

「宣告以長期的對抗，積極的西進政策來促成中國統一。」

「統籌或成立執行大陸政策之工作單位，訂立工作之最高、最低綱領，做為大陸政策明確化的指標。」

趙少康委員認為，

「基於人道以及反共的立場，本席主張，時代的悲劇，不應再由無辜的人民獨自承擔，政府應協助台海兩岸離散家庭團聚，政府應給予兩岸家庭通信的自由，對於因思鄉情切輾轉回大陸探親的國人，不應在其回國後給予不准再出境或停發養老金或其他處罰。」

「新一代的人民充滿信心，我們在國際間的任何場合均未管輸給中共，何以政府還要這麼怕？政府這種做法實在讓人民覺得『窩囊』。」

許國泰指出返鄉有理，省親無罪

這些國民黨籍增額立委主張國民黨政府應建立信心，排除「八不」心理，與中共面對面對抗，同時將海峽兩岸的通信、省親及貿易問題予以制度化，這與民進黨的主張可以說不謀而合。民進黨主委尤清提出民進黨綱說，

「終止台海兩岸的對抗，我們呼籲基於台灣人民的整體利益來謀求合乎人道、平等和平的解決途徑。……台海兩岸的問題應由全體住民透過自由意志自主決定，

反對由國共雙方違背人民自決原則的談判方式解決。」

王義雄委員則認為，

「在此本席基於人道的立場向國民黨與共產黨提出呼籲，如果要保護台海兩岸人民的性命與幸福，應以和平的方式來解決台灣問題及台海兩岸問題。」

許國泰委員指出，

「貴黨（國民黨）政府應秉持人之大倫的慈悲心，認定返鄉有理，省親無罪，並即開放想要回大陸探親者准其回大陸。」

他同時指出，今年三月五日美國國務卿舒茲的一段談話，象徵美國似已改變以前不做海峽兩岸調人的態度，轉而支持中共的三通政策。

針對無關體制的公共政策，雙方歧見更少

從以上增額立委對三項敏感而重大的政治問題的質詢內容看來，這些國民黨籍的增額立委與民進黨籍立委的觀點，差異不大，有些地方甚至完全一致。若是針對無關體制的個別公共政策問題，則雙方歧見更少。

譬如：民進黨康寧祥委員獲得十九票，當選立法院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民進黨委員只有十三人，顯然他有獲得其他非民進黨委員支持。

又如國立中正大學設校地點的選擇問題，增額立委已打破黨際分野的界限，純以其所屬選區區分其立場。因此，出身於嘉義的國民黨籍增額立委林健治主張該校應設於嘉義地區。而民進黨立委固然也有十一名聯署支持中大在嘉義地區設校，但



●余政憲



●王聰松：國民黨
「不會駛船嫌溪彎」

朱高正委員及吳淑珍委員沒有列名其中，因為朱高正委員所屬於的雲林縣也在爭取設校，而吳淑珍委員夫家所屬的台南縣也在爭取設校，所以吳、朱二委員就採取與其他十一名民進黨主委不同的立場。

也因為如此，吳淑珍委員聯署台南縣選出的國民黨籍立委林聯輝所提出之中大在台南縣設校的書面質詢。更妙的是，連署這項書面質詢的，還包括民進黨籍立委費希平、黃煌雄、康寧祥、余政憲等。這除了表明這四位委員對中正大學設在嘉義或台南均無可無不可之外，還說明，關於地區性的問題，增額立委已沒有國民黨或民進黨的分別。

由國民黨籍增額立委張堅華所領銜的一百三十九名立委要求「國立海洋科學博物館」設在北部的書面質詢中，也有民進黨籍的許國泰、康寧祥、朱高正、王聰松、許榮淑及張俊雄等六名委員參與聯署。

可是，民進黨立委許榮淑、余政憲、朱高正、張俊雄、邱連輝、王義雄、許國泰及王聰松另外又自行聯署，要求該博物館設在墾丁公園的入口龜山後彎地區。

再如勞工的罷工權問題，民進黨籍立委王聰松固然主張勞工的結社權、集體爭議權、罷工權等均應確實保障，而國民黨籍的立委李友吉亦作如是呼籲。

其他如中油公司超額盈餘、外匯存底、省縣自治通則的制定，環境污染等問題，我們簡直不能從他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分辨出誰是民進黨籍誰是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

孫勝治比喻 現行政治為「梧鼠政治」

更有進者，國民黨籍增額立委對行政院長俞國華內閣的抨擊，可說極盡尖酸刻薄。孫勝治委員說，我國目前的政治情況，可以「梧鼠政治」稱之，意即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穴而不能掩身。趙少康委員說，為政者長期以來可用「養母心態，晚娘面孔」來形容。

劉興善委員則諷刺說，「本院同仁所提的若干質詢，俞院長或有關部會首長的答覆，卻是答非所問，避重就輕，甚至不知所云」。洪文棟委員則感嘆立法院的地位已淪為行政院的「立法局」。

凡此種種評語，雖不及朱高正委員的「幹語」來得簡潔，也不及王聰松委員的那句「不會駛船嫌溪彎」來得通俗，但也道盡了國民黨籍立委對於由同黨執政的行政院諸多不滿之處。

綜合以上的分析，由於形推勢移，國民黨籍增額立委「接收」了不少原先專屬於黨外或民進黨立委的話題，並在個別地方性的問題打破了政黨界限。在這次會期的施政總質詢中，唯有民進黨的「自決論」、「廢止戡亂體制」及「制定新憲法」未為國民黨增額立委所認同。但假以時日，台灣內外情勢再有變化，難說這些話題不會進一步被國民黨立委所「接收」？

無疑的，國民黨立委每接收一項民進黨立委的話題，即表示這道題目即將到了解決的時刻，擺在民進黨立委眼前的課題是，如何保持黨外的傳統，提出具有前瞻性的問題，為台灣的社會政治發展指出前進的方向。

附註：

本文所引之立法委員質詢均來自立法院秘書處所刊行之「立法院公報」，第七十六卷第十八期至卅六期。

◎海峽論壇◎

是誰在統治美國？

■G. William Domhoff 著

■蜀濤節譯

本文節譯自“現在誰統治美國？”（“Who rules American, Now？”）一書的第一章。作者為美國加州大學社會學和心理學教授。此書旨在揭露美國雖有選舉、意見表達等形式上的自由，但實質上是由一批主宰美國經濟和政治的上層階級實行階級統治。該書近日將出版中譯本，今特選刊一節。

——編按

“階級”和“權力”是會讓美國人略感不安的名詞，而“統治階級”與“掌權人才”這類概念，馬上會使他們起戒心。固定的特權份子團體可能主宰美國經濟和政府的說法，不合美國人一貫的想法和美國建國大綱，人的社會階層可能不同，有的人或比別人多點影響力，但當權力是依憲法分配給所有人，有選舉和遊說的民主參政方式，向上社會流動的證據又俯拾可得時，美國還不致有統治階級或掌權人才罷。提起“誰統治美國？”的問題，照利益團體的說法，該是選出來的官吏和一般老百姓。

本書與大多數人的看法相反，旨在提出一系列證據，證明美國存在上層階級，以他們在美國經濟和政府當中扮演的主宰角色而言，是個不折不扣的統治階級，這個統治階級在社會上連絡有親，大公司和銀行中有他們的基地，在醞釀社會和政治風氣上扮演頭角，並運用各種機械和方法操縱聯邦政府。

整個上層階級不搞這套統治，階級統治倒是通過種種組織和機構的活動彰顯，這些組織和機構由上層階級中有能力也有心維護並鞏固其特殊社會地位的成員出資

，指揮，上層階級領袖和其控制之組織裡高級僱員，組成我們所謂的掌權人才，這掌權人才是全體上層階級裡的一個領導團體，但不等於上層階級，因為不是所有上層階級成員均為掌權人才，也並非掌權人才都屬上層階級，是掌權人才的成員在從事維繫階級架構的工作。

美國階級體系雖然開放 統治階級却一直存在

本書論點雖與美國社會學中流行的多數決權力說相反，卻不否認法律之前的人人平等，不否認有變更身份的機會，它也不否認美國有表達意見的自由，可以自由參政，對重大事件有公開的意見衝突，我的論點也未抹煞美國幾世紀來的根本變化，它不否認私有財產的基本形態已從獨資和合夥演變到公司股票的持有，不否認社會向心的場所已從家庭和教堂轉到學校和俱樂部，醞釀政策的責任則由業餘的政權預備會和政黨移到基金會，專業的企畫團體和智囊團。事實上，視美國的階級體系為一開放而不斷在變化著的體系，視美國的政治體系為民主體系，不過在更明白陳

述本書的宗旨，是在揭露一個統治階級，能夠在到處是衝突和變化的美國社會中繼續存在。

此外，說一個上層階級因為擁有相當的權力而被視為統治階級，並不意味其他社會階層就完全沒有權力。主宰不是完全控制的意思，而是指設定條件的能力，其他團體和階級必須在這些設定的條件下活動，受過相當訓練的專業人才，關切環境和消費的問題，配上他們的科技情報和他們對立法程序的瞭解，能夠趕在鋒頭上，逼政府限制若干公司的活動，工資和薪資工人一旦組成工會，就有辦法在工資、工

時，和工作條件上逼資方讓步，甚至最沒勢力的、赤貧的，和受人歧視的人，有時也能透過罷工、暴動，和其他強制手段破壞體制，證據顯示，這類活動至少在短期內使他們得到一定的安撫。

最重要的還有人民可以投票的事實，雖然本書的根本論點在批評流行的，認定政府為了選票非依從多數人意志不可的看法，卻不否認在一定情況下，選民有辦法限制整個掌權人才的活動，或決定掌權人才中哪位領袖該有最大的決策影響力，正如過去幾位政治理論家所說，統治階級內部有歧見時，尤其如此。



◎海峽論壇◎

對1987年

■ 柳芳婷

三篇宣言的觀察

有人曾戲稱1987年是台灣的「宣言年」，從年初以來已有多篇宣言問世，顯示出久受禁錮的社會力，即將解放而出的胎動。這種現象是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以來所未曾有。本文對今年最有代表性的三篇宣言做了簡要的分析。

宣言，它不是人類唯心的產物，它反映了一社會內部生產結構——即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相編成總關係的一定時間內的矛盾。它是社會的、歷史的、邏輯的人的產物。

從今年年初以來，我們在台灣看到了三篇頗有社會指標作用的宣言發表，它們分別是：

1. 1987年電影宣言（由五十位文化界人士共同發表）
2. 新社會宣言（由台大學生發表）
3. 勞工人權宣言（由三十九位學者、民意代表、意見領袖共簽）

改良主義的宣言

這三篇宣言雖然在命題的對象和層次上不同，但是除去這些對象和層次的部份，仍然可以在它們的本質上找到公分母之處：

1. 是淑世改良主義的產物。像新社會宣言標示的是「反體制改良主義，作為一種個人實踐哲學，必然會成為有效動員資源的民間哲學。」勞工人權宣言承認了資方的優越地位的合法性。電影宣言則更溫和，像是一篇呈遞給文化宰制機器的萬言

書。這三篇宣言態度上的緩和與激烈間或有別，然而大抵不脫淑世改良的基本範圍。公開面市之後，雖然引起保守力量中的部份力量的抗拒，但是，整體的保守力量的統治本能均將在短時間內理解到這些宣言的淑世性質，延攬、收編等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化合與重整，就會在未來的一、二年中實現了。

統治機器的外延物

2. 是外統治機器（off-dominated machine）的產物。這三篇宣言——做為一種聲音所表達出來的價值觀念，並不是反統治機器的對立物，而是統治機器的外延物。因為它們不是做為統治機器的對立物而存在，所以它們沒有創造出任何一種對立的哲學。又由於它們是外延物，它們反應的祇是統治機器的不積極性，即反應統治機器因龐大而造成運作上的遲鈍和慢性循環。然而，統治機器的有機本能並不在於創造或解決它的遲鈍和慢性循環，統治機器的有機本能在於維持它自身的再生產，所以它的一切活動都包括了創造下一次再生產前所需要的「再生產條件」（the conditions of reproduction）。那



• 「勞動人權宣言」說明會會場

麼，像三篇宣言之類社外延物，它們的結論即在於它們是否構成了當前統治機器的一個「再生產條件」而已。如果，因為歷史和社會的條件尚不成熟，那麼外延物依然是外延物，它既不必成為統治機器所欲追緝與粉碎的對象，也不會成為統治機器「再生產」的任一條件與阻礙物。在另一種情況下，亦即在歷史和社會的許可時，統治機器為了「擴大再生產」的需要，它將吸納它外圍的種種力量，以做為其再生產條件時，那麼外延物就必然部份或全部被納入統治機器。從統治機器看，統治結構的設備更新或擴大。從外延物看，它某種程度地改造了統治機器。

3. 是透過智識份子為仲介的產物。理由無它，簽字者或寫稿者均為學者、文化人、學生、民意代表、意見領袖。

以社會生產力增大為基礎

近三十年來，台灣的統治層級一直處於一種矛盾狀態，此即：封建式的集權統治和資本主義式的以制度為主體的開放統治兩者的矛盾。這兩種矛盾的取決，需以客觀世界的發展為度。而過去的三十年，資本主義在台灣的發展顯然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而這種勝利自然造成了封建式的集權統治的必然鬆動和蛻變（請不要把鬆動和蛻變理解成瓦解），所以在台灣的三十年來歷史中，我們不斷地看到一代又一代的革新派在從事革新事業，這些一連串的革新事業，歸根究底地說，都是在一條由台灣社會日益增大的社會生產力基礎上進行的。所謂「革新」，基本上都指出了



• 台大先進學生積極爭取校園民主，於校園「漫步」。

• 「民間哲學」一辭背後，
有相當大的唯心主義成分

一個新的效率的需求，以及一個新的管理方式和權力分配的需求，亦即統治（或言「治理」）的形式求變。至於統治的本質，則未嘗出現過強有力，並且有效的質問。

如果，上述的分析可以成立。那麼這種分析亦適用在今年的三篇宣言上。是以，宣言雖然出現了，但是它並沒有可能成為重要的歷史文件。然而，不做烈士，不做不可能的事，乃是這三篇宣言的本質，所以，用一個理想的絕對標準來看這些宣言，進而論斷這些宣言的理想不高，亦非智者所為。

慈林教育基

統治聯合體時代的來到

然而，這三篇宣言的存在和它們受到傳播媒體的青睞（晚間電視新聞在勞工節當天，播出了勞工人權宣言草擬者張曉春的訪問），指出了開明革新的主張受到了今天統治機器的重視則為事實。與此相適應的事實則是：台灣今後將加速的走在資本主義道路上，而統治機器的形成將由黨、政、軍為內質的階段，轉進入統治聯合體以統治本身為內質的階段。在資本主義的道路上，一般化（generalization）和集中化（centralization）的時代將取代了過去的積累與積聚的時代。與資本一般化和集中化同時而併生的現象則為空頭資本輸入、輸出（俗話為「用空錢賺空錢」），台灣進入國際金融的行列，台幣在國際貨幣市場上取得與第一、二世界貨幣的直接交換資格等等。



有「一定」的進步性

由於這三篇宣言是目前統治機器不主動為或不願為的產物。所以，均在客觀上反應了一定的進步性。不過，這些進步性並沒有達到突破歷史舊局的地步。主要原因在於它們的內容沒有主動的提出一種「歷史的新見解」（historical new version）。電影宣言的主張如果比起五四時代的一些文藝主張，在見識和前瞻上，確實今不如古。勞工人權宣言的十二點主張和1924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提出的工農政策相比，亦遠遠不如。與電影、勞工兩宣言相較，新社會宣言較有新義，寫稿人提出「反體制改良主義」與「民間哲學」，且認為因此而摸索到了

一條新的戰線，筆者基本上支持該宣言的精神，然而，亦十分驚訝該宣言的誕生的之前曾長期摸索於一個唯心的統／獨、左／右爭論環境，以至於該宣言所標示的「民間哲學」一辭的背後，有相當大的唯心主義成分（唯心主義的產物也是唯心主義的，差別祇是這一種唯心與那一種唯心）。筆者強烈希望看到現在的大學生中的前衛青年「對世界有一種大認識」的欲望。很可惜，沒有在新社會宣言中得到滿足。「民間哲學」的追求如果是正確的，那麼追求本身就是全體社會的發展的一部份，知識份子先鋒隊的做法固然浪漫，但是重大的責任包袱，常使得青年人未老先衰，或者是成爲一個在知識上孤獨的人。相反的，「民間哲學」的實現，定然是始於不抽象的現實掙扎，不抽象的現實生活，不抽象的現實成長，不抽象的現實思考、戰鬥。我們還沒有所謂的「民間哲學」，我們也不能空中樓閣一指地說「民間哲學已經確立」。真實的我／台灣／世界是什麼？真實的我／台灣／世界應該是什麼？如果，對這兩個問題沒有提出實際的看法／說服人的看法之前，新社會宣言應該是一篇「未完成定稿」的宣言。

對宣言的兩個理解

最後，我們的問題是：要如何把這三篇宣言做爲一個整體來理解呢？對於這個問題，本文的看法如下：

第一：從這三篇宣言所指涉的對象 A 文化人、B 學生、C 勞工來看，它正整體的暗示出今天台灣社會內的民力主要所在

。相對於過去，這三股民力的「自我中心意識」已經各別的提升，進而要求更大的經濟主權、知識主權、文化主權。這不是一個主權要重新分配那麼單純的一件事，也不是台灣社會「已然的統治關係」需要變成一個「應然的統治關係」那麼單純的一件事，也不是梯隊接力、老中青層層交棒那麼一回事。質言之，是今天的台灣已經和過去的台灣不一樣了，極龐大的社會生產力做基礎之上需要一個相應的人文架構的事實已經來臨了。相反的，舊式的社會機器（包括行政機器、教育機器、立法機器、執法機器、傳播機器、軍警機器……）都已經呈現「負荷不足」或「功能的意義不在」。例如勞工主管機構不能面對快速增加爲五百萬的勞工人口，等於成爲一個本來是維持社會秩序的機構變成了瓦解社會秩序的機構。面對今天台灣的新空間，三篇宣言除了包括向舊的社會機器要求正當的權利的意義外，還包括了以自主的力量在新的空間創造新的權利的意義。

第二：在台灣倡議改良主義的人，應理解其主義爲一極昂貴的力量。此力量的基礎不是由統治機器所贈予的，而是台灣數百萬勤勞人民用數十年的努力工作締造出來的。是以，此一權柄的運用，理應以回饋社會大眾身上爲最終極的目標。支持或反對宣言的兩造而言，應以宣言的發展是否包含了此一主要目標，做爲評論這些宣言的最主要標準。

對於宣言的簽字者而言，宣言的出現，除了反應社會內部的矛盾之外，它不能等於此一矛盾的解決，也不能等於此一矛盾解決的方法的總呈現。適切的說，宣言是社會矛盾總解決過程的一個條件——是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

◎特別報導◎

夏潮聯誼會成立宣言

歷史進入了七十年代之後，東西冷戰下，世界二體制對立的國際秩序開始瓦解和重編。越戰引起的全球性學潮，又揭破了戰後美國所建立的世界資本主義體制的道德形象。島內外的台灣知識份子也在「保衛釣魚台運動」中，受到了一定的思想衝擊。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台灣現代史上「二二八事件」的第二十九週年的日子，『夏潮雜誌』誕生了，很快的集中了當時的進步青年，成為戰後冷戰體制下成長的台灣知識份子重新思考和反省的起點。並且，由『夏潮雜誌』首先揭櫫了「社會的、鄉土的、文藝的」三大目標。

然而，由於台灣的高壓統治和查禁政策，『夏潮雜誌』一直在慘澹經營中奮鬥，斷斷續續，屢什屢起。以『夏潮雜誌』為中心的同仁們，還創辦了『鼓聲』、『春風』、『生活與環境』、『大地生活』、『夏潮論壇』、『前方』、『春風詩刊』，以及即將出刊的『海峽』等雜誌。

從不斷的探索和思考中，同仁們重新建立了自己的信念：我們反對任何形式的國際強權；反對專

制統治；反對社會壓迫；主張以台灣鄉土為基礎，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平等社會；進而我們關懷整個中國民族和世界人類的前途。

八十年代中葉以後，島內外的形勢，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在國際上，美、蘇全球權力的消長；中（共）美關係發展的深刻化；日本經濟急速擴張所引起的軍國主義復活傾向；港、澳門問題的初步解決，使國際間解決「台灣問題」的呼聲，甚囂塵上。在大陸方面，中共的經濟政策和開放政策，引起了政治、社會各方面複雜的變化。在台灣方面，已經初步突破了長期的黨禁；國民黨也宣佈即將解除戒嚴。對美、日深刻依賴的台灣經濟，在「自由化」、「國際化」中，新的政治經濟的獨佔形勢正迅速的形。

面對這新的形勢和歷史階段，同仁們認為有必要促進更廣泛、密切的交誼，共同思考新的課題，和促進對鄉土、社會、文化、國家的關懷與進步，而成立本會。

秉持以往的信念，我們的信條是：

- (1)反對任何國際強權之干涉，主張「台灣問題

●夏潮聯誼會成立了，首任會長王拓發言。





- 評議員楊祖珺代表全體會員宣讀「夏潮聯誼會成立宣言」。

」必須以台灣人民為對象，用和平民主的方式解決。

(2)反對任何黨派之專制，台灣地區必須依據憲法盡速實現充分的民主憲政，任何政黨必須退出軍隊、司法、學校，並釋放一切政治犯。

(3)反對任何形式之社會、經濟與人權的壓迫和剝削，經濟發展必須特別以保障工、農及勞動大眾的權益為前提。

(4)反對任何省籍、種族、階級、性別的特權與歧視政策，以促進島內各省籍、各種族、各階級人

民之間的平等和睦，並特別支持島內原住民的自主、自救運動。

(5)反對任何外國文化之壟斷及對本土文化主體性之破壞，以促進我國學術文化的自主、發展與進步。

(6)反對任何破壞民族團結和親情倫理的隔離政策，島內外人民及海峽兩岸人民，有自由旅行、探親、交易之權利。

(7)反對一切對生態環境及國民健康破壞之政策與措施，並積極支持一切抵抗上述政策與措施之自力救濟運動。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七日於台北

夏潮聯誼會 本刊 成立大會側記

以夏潮系列雜誌之工作同位、贊助者及作者為主體所組成的「夏潮聯誼會」，於五月十七日在台大校友會館正式成立。

成立大會由美麗島案政治犯，前「春風雜誌」社長，名作家王拓擔任主席，世界新專教授、台灣史研究會理事長王曉波擔任司儀，在全體會員為國家民族死難的所有前輩們默哀一分鐘後，於下午二點半正式揭開序幕。

陳映真：夏潮精神是繼承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民主、民族傳統而來

首先由人間雜誌發行人、名作家陳映

真先生報告「夏聯會」發起及籌備經過。陳映真表示，一九五〇年以後，由於東西冷戰結構的形成，台灣被編入所謂「自由世界」的體系當中，成爲一個「反共」、「防共」的堡壘，而和整個民族的傳統產生了嚴重的隔離與斷絕。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便依附在以美國爲首的資本主義體系下，被支配將近四十年之久。這種情況，在一九七六年由於夏潮雜誌的創刊，結合、影響了當時一批進步的知識份子，而有了一個新的、全面的反省。因此十一年來，夏潮系列雜誌的這種精神傳統，在冷戰體制下的台灣，便成爲一種特殊卻又具體的存在。可是，陳映真認爲，這種「夏潮精神」，實際上是繼



承一九四九年以前，甚至整個日據時代民族、民主的傳統而來，而不是一種新奇的開創。爲了讓這種「夏潮精神」獲得進一步的實踐，以落實、深入到台灣的社會、民間，便由前「夏潮論壇」的社務委員會發起、籌備夏潮聯誼會，以便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工作能獲得一個統籌的推動。因此，「夏聯會」在十一年後的今天成立，實具有極深刻、前瞻的意義。

王拓具有踏實的政治運作經驗、高票當選會長

陳映真報告完畢，由「生活與環境」的發行人黃溪南先生主持修訂章程草案的議程。於徵得會員同意之後，大家一次表決，通過章程草案；若會員有修改章程的寶貴意見，則交由成立後之評議會討論、修改，於下次會員大會提出。

會長、副會長及評議員的選舉由「遠望」雜誌總編輯王津平先生主持。選舉會長之前，陳映真先生舉手發言，推荐王拓擔任會長，理由如下：①王拓自一九七六年夏潮創刊以來，即成爲夏潮最積極的工作者之一。②王拓正值壯年，且對於經營

、管理等實務工作具有極強之能力。③王拓除了在文學創作、文化工作方面有很高的成就之外，也是夏潮的朋友裡面少有的、實際參與過政治改革運動的人，具有相當踏實的政治運作的經驗，這對夏聯會理想的推展將發揮很大的作用。

會長選舉結果，由王拓以四十七票最

遠方的賀詞

親愛的朋友們：

經過三個月的籌備，我們終於能克服各種主觀、客觀的困難，而聚集在這裏，首先我要向三個月來爲夏聯會的成立而辛苦奔走的朋友們致以最大的謝意和敬意。

我希望夏聯會的成立不只是將我們一群老朋友更加緊密的團結在一起，也是我們和所有進步力量團結的開始。自從一九七六年我們開始出版夏潮雜誌以來，這十年之間，台灣社會已有了巨大的轉變，在這期間，對於進步思想和力量的形成，我們朋友們已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這個社會更深刻的矛盾正激化中，歷史正要求我們這一群進步的朋友以更集中的意志，更整齊的步伐來投入。我們仍然應

情形



●山地青年莫那能
高歌一曲「我們
都是一家人」，
全場唱和，氣氛
融洽。

高票當選。隨後進行副會長選舉。有會員提出由會長當選人王拓推薦副會長人選，以便爾後能密切合作，一起推動會務，大家一致鼓掌接受。王拓遂推薦黃溪南先生擔任副會長，理由如下：①他和黃溪南從大學時代就認識，對他的理想、人格、工作能力有很深刻的了解與信任。②黃溪南是夏潮系列雜誌長期的工作者、贊助者，出錢出力，貢獻良多。③黃溪南具有極強的實務工作能力，足以襄助會長推動會務。

蘇慶黎遠從美國電傳過來 最真誠的致詞

副會長選舉結果，黃溪南以四十二票

■ 蘇慶黎

該尊重少數優越份子、清流、賢達對這個社會所起的作用，但這個社會更需要一個集體的進步力量來促進被壓迫人民集體力量的成長，這才是一個進步社會的最大保證。苦難的時代必然造就英雄，但諸位優越的朋友們，在此我要向你們呼籲，苦難的人民要求的是超脫他們自身的苦難和困境，而這只有集體的力量才可能達成；因此在你們發揮個人對社會的影響力的同時，也請你們關注並參與一個進步團體的成長。最後，請原諒我暫時的缺席，不管身處何地，我將和大家一起為共同的目標而奮鬥，我希望盡快能再回到這個進步大家庭來！祝大會成功，謝謝各位！

最高票當選。隨即進行評議員的選舉。由於評議員選舉採用連記法，每人最多可以圈選九人，故計票頗費時。經過約一小時，評議員順利產生，當選人依得票數如下：

評議員九人——楊祖珺、王津平、王義雄、林華洲、王曉波、陳映真、王杏慶、張敏生、林宗男。

候補評議員三人——林書揚、宋東文、吳俊宏。（姚國建與吳俊宏同票數，抽籤結果由吳俊宏當選。）

選舉結束之後，由王津平朗誦刻正遠在美國進修的前夏潮雜誌總編輯蘇慶黎的致詞。在熱烈的掌聲中，結束這一篇夏潮的老朋友遠自異鄉電傳過來的最真誠的致詞。接著，由楊祖珺朗誦籌備會擬就的「夏潮聯誼會成立宣言」。

最後，由第一任會長王拓致詞。他表示，在這種風雨交加的天氣下，夏潮的朋友們有的遠從台東、高雄、台中、彰化各地趕來，八十七個會員，竟有將近七十名與會，這種百分之八十的高出席率委實難得。風雨，阻止不了夏潮朋友們的團結，因為他們心中有共同的信念與理想。

王拓並介紹幾個具有特別意義的會員上台致詞。周合源、林書揚兩位前輩作了簡短的談話，博得與會者的熱烈掌聲。

蘭嶼雅美族青年施努來和屏東排灣族盲眼詩人莫那能的致詞，則代表了最底層的受壓迫原住民的心聲，在飽受平地社會的壓制、歧視下，他們的加入夏聯會具有極深刻的意義。

最後，莫那能唱了一首由原住民歌曲改編而成的「我們都是一家人」。嘹亮的獨唱逐漸地變成雄壯的大合唱，成立大會就在這和諧、歡愉的氣氛中圓滿閉幕。

◎特 稿◎

熱烈期待，深切憂慮

——我對時局的一點理解與分析

■王 拓

一、我們處在變局的關鍵時刻

去年八月間，我應美國艾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之邀請，在美國前後停留了大約五個月。這段時間，剛好是國民黨當局改變其過去動輒以叛亂罪嫌用軍事審判對付政治異己，而改採所謂的「司法」手段不斷在起訴、判決黨外政治運動者，以企圖掩飾其迫害政治異己的惡名的時候；同時也正是黨外人士長期醞釀組黨而始終未能實際跨出行動，卻在許信良等搶先於美國宣佈籌組「台灣民主黨」之後，在民衆的期望與注目的壓力下不得不更積極地進行其組黨工作，以便一方面舒解來自島內外所加予的有形或無形的壓力，一方面企望以組織化的力量更有效地對抗國民黨的壓迫的緊張時刻。該年的九月上旬，由於台北市議員林正杰在議會質詢時指責另一國民黨籍市議員候選人的公開賄選，在鐵證如山的情況下，賄選者竟安全無事，而發出正義之聲的林正杰反遭判刑，終於激起黨外人士與廣大民衆的憤怒與敵愾同仇之心，而不得不走上街頭進行大規模的和平示威。並且極富戲劇性地，由林正杰懷抱了一座繫了黑帶的鐘，在大量軍警與便衣情治人員的層層包圍下，衝破圍堵，勇猛地跑到總統府前去為台灣的司法送「鐘」，而展開了去年年底選舉運動的序幕，也為黨外人士的組黨工作帶來了催化與激化的作用，終於使黨外人士在選舉之前正式組成

● 台灣勞工飽受欺壓，國營企業率先違法





●王拓



了在國民黨統治下第一個在台灣創立的政黨——民主進步黨，而打破了國民黨治台四十年來嚴格的黨禁，並使民進黨在去年年底的選舉中獲得前所未有的勝利，而有十三位民進黨員進入立法院，十二位進入國民大會，使台灣在政治上開始有了一個略微與前不同的局面。與此同時，國民黨在國際輿論的批評與島內民衆求新求變的壓力下，也終於正式宣佈即將解除在人類近代歷史上最為長久的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統治，而使原已難以壓抑的蠢蠢欲動的各種民間勢力紛紛趁時而起，使得長期在國民黨一元化勢力統治下的台灣，似乎已進入多元化的社會。再加上長久以來一向與統治勢力密切合作無間的大小企業，也在此時紛紛公開提出國際化、自由化與制度化的主張，意圖打破腐敗的國民黨官僚企業的長期獨佔與壟斷，而學界的自由派人士與國民黨內少數的開明要員也公開對企業界所提出的國際化、自由化與制度化表示贊成與呼應。凡此種種，都引起島內外關心台灣前途的人士密切的注目與關切，並普遍認為這是台灣即將邁入一個新時代與新局面的關鍵時刻。

在我訪美期間，雖然只是選擇性地做過幾次公開演講，所講的題目雖然也都僅限於文學或與個人過去所從事的政治與社會運動有關，但是聽衆所提出的最關心的問題，卻都圍繞在島內當時正在激烈演化開展的政治與社會運動上。那也是我生平首次遠離台灣的土地，有幸接觸到許多平時在台灣無緣接觸的資料，也認識了一些在知識上、思想上對我個人頗具啓發與指導作用的朋友，使我有機會能夠比較深刻地反省、檢討自己過去的所學所為，也有機會以較前更為寬廣的視野來觀察思考台灣的問題與未來。現在從新回顧幾個月前自己在國外公開發表的那些關於台灣在政治、經濟與社會方面的一些看法，以及私底下與朋友共同討論切磋所得的意見，有些都已與目前的發展相去不遠，有些問題則還在繼續發展演化中。做一位時時關心台灣未來的發展，並長期參與民主運動的一員，對於台灣當前的

局勢與未來的發展，我有樂觀的期待，也有深刻的憂慮。

二、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 能獨立自主嗎？

對台灣在戰後經濟發展的成就讚揚的文獻有如雨後春筍，近兩年來更由於不斷的出超，外匯儲蓄已達五百六十億元，這固然是有其歷史的、地理的、政治的與社會的種種複雜因素交相作用的結果，而使得台灣人民在某種程度上得以豐衣足食，並普遍均有足夠的營養，許多家庭且擁有奢侈的消費品，這些事實均證明台灣繁榮的程度確已在國際上達到中上的水準。但是這種繁榮得來的代價卻是非常非常的高昂。可能需要連累我們後代的子子孫孫來償付。例如環境的污染，已使台灣幾乎沒有一條乾淨的河流，沒有一片乾淨的海洋；不論城市或鄉下，污濁的空氣比比皆是；垃圾的處理一直是地方政府頭痛棘手的問題；廣大的勞工與農民，在經濟發展中的所得未能得到公平的分配，生活沒有得到充份的照顧，許多家庭雖然終日勞苦，卻無能擁有自有的住宅；未經規劃的建設使人民普遍欠缺適當舒暢的活動空間；因為各種不衛生所引起的疾病，如肝病與呼吸器官的毛病到處皆是等等，以及由於與這些問題有關所引起的社會衝突，更往往演變成爲政治問題。而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政府雖然擁有高達五百六十億美元的外匯儲蓄，卻由於缺乏妥善的政策，反而造成經濟發展的包袱，對內飽受物價上漲的威脅，在外飽受美國強迫台幣升值的壓力，而嚴重傷害了一般民衆的利益，也嚴重傷害了台灣經濟的活動力。

台灣的經濟結構， 長期來存在著 各種內在與外在的危機

如果再略微加以分析，便發現台灣今天所擁有的經濟繁榮其實是十分脆弱的，因為台灣的經濟結構長期以來都存在著各種內在與外在的危機。就外在的來說，台灣是一個海島，對外貿易是其經濟命脈所在，當然不可忽視。但是，台灣對外貿易總額在整個國民生產毛額中所佔的比例卻太高，其依存度已達百分之百，而且又集中於美日兩國，以一九八四年爲例，在進口總額中，自日本進口就佔了29.9%，自美國進口佔23%；出口總額則集中於美國，高達49%，日本則佔10%。貿易收支基本上是以對美貿易的順差來彌補對日貿易的逆差，而形成台美日之間的三角貿易。至於進口的項目，農工原料佔69%，生產資料佔24%；出口則93%是工業製成品，其中紡織成衣佔21%，電子機電佔19%，大部份仍屬於勞力密集，附加價值較低的東西，可見所謂出口貿易的旺暢，其實不過是美日經濟大國外國加工的附庸而已。這種長期的難於擺脫的對外經濟依賴的結果，自然就導致政治上也處處受制於人，幾乎也要淪爲政治附庸的地步。一旦美日兩國發生不可預料的政治經濟變動時，台灣的政治與經濟立刻就要遭到重大的難於挽救的危機。

就內在的因素來說，台灣的經濟從其產業結構來看，基本上是採取公營與民營分工的方式，幾乎所有的基本工業或產業上游部門，例如電力、石油、化學、鋼鐵、造船、肥料、機械、製糖、金屬等等，以及交通、電信、運輸、金融等部門的主要機構也統歸公營，至於民營企業則只扮演衛星產業的角色，例如紡織業、電子業、塑膠業、食品業、水泥業、汽車組件、建築業等等。可見公營與民營企業之間的關係，就像美日經濟與台灣經濟的關係一樣，基本上就有主從之分，上下游之別，以及骨幹與衛星的差異。就規模來說，若以一九八三年爲例，公營企業約近三十家，民營企業大大小小總共有十幾萬家，但近三十家公營企業的資產總值卻與十幾萬家私人企業的總資產相當，可見公營企業規模之大，均具有獨家壟斷的能力與性格。但是就台灣

● 民進黨的成立，打破了國民黨四十年來的黨禁



經濟發展的作用來看，民營卻質優於公營。在非農業產業部門的總產值中，公營只佔19%，而民營則佔81%；另從市場結構來看，內銷市場公營佔39%，民營佔61%；外銷市場公營只佔3%，而民營企業則高達97%，民營外銷中，大企業佔36%，中小企業佔61%，中小企業外銷約兩倍於大型企業的規模。由以上資料可明顯看出，公營企業完全是依靠政治勢力壟斷內銷市場才得以生存。長期以來，公營企業之經營不善及其獨家壟斷的特性，已使私營企業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加重了生產成本，如今面臨國際市場競爭更加白熱化，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紛紛以其更廉價的勞力密集嚴重威脅台灣對外貿易競爭力時，大大小小的企業主紛紛喊出國際化、自由化與制度化的要求，是有其內外長期的積因存在。

**自由化的主張，
其實只不過是把現有資源
重新分配與組合而已**

國際化應是島國經濟全力以赴所要達到的目標，也是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尤其是保護主義普遍抬頭的現在，跨國企業應是台灣大企業家夢寐以求的，也是台灣經濟維持活動力向外擴張必走的道路，但企業要國際化必須依靠資金與技術，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則必需做到「物美價廉」。但是，由於台灣的基本工業均屬公營企業，其經營不善而加重所有私營企業的成本負擔已如前述，因此，台灣的大企業主在喊出國際化的同時，也提出自由化的要求——尊重市場供需原理，不要用政治力量維護公營企業的壟斷，而令其自由競爭，或主張把公營企業開放民營，其最根本的原因在此。但是，這樣的自由化的主張，不論是公營企業開放民營，或是容許私人企業投資於原屬公營企業壟斷的產業與之競爭，其實都不過是把現有資源重新分配與組合而已，也就是說把原來官僚企業的壟斷打破，再由一批資本家組成財團，建立另一新的壟斷。但是這種自由化的主張卻為保守的官僚集團所抗拒，因為公營企業是國民黨統治官僚集團最重要的物質基礎，如果失去這些物質基礎，對他們而言，後果是不堪設想的。至於所謂的「制度化」，除了根據常識的說法，可以望文生義外，若根據上面的分析，還可稱之

為「現有資源重新分配的合法化」。國際化是自由化的目的，自由化則是國際化的條件，而制度化則是自由化的保障。台灣的經濟必需向外發展才有生路，因此這是一條不能避免的道路，但是國際化與自由化之後，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將會越來越小，台幣目前在美國政治勢力壓迫下不斷升值，已使這種趨勢加速惡化。台灣的社會在這種趨勢下可能會越來越朝向兩極化發展，原來的中小企業主大部份將淪為領薪階級。而原在中小企業工作的幾百萬被僱傭者到底有多少人能被大企業所吸納，將會成為影響未來台灣社會內部變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又既使完成了所謂的「三化」，台灣的經濟是否能真正突破百年來對外經濟的依賴性而獨立自主呢？台灣在目前的經濟發展中所發生的弊害和代價是否能得到改善和維持呢？這些問題都是我們所深切憂慮的。

三、台灣政治的變與不變

近半年多來，台灣現實政治的變化在島內外所引起的關注遠比任何問題都來得廣泛深遠，尤其是民進黨以實際行動突破長期黨禁，以及國民黨的宣佈即將解嚴，都是我們長期以來一直盼望和追求的，因此一般心理都預期著這些政治上的變化將為長久不變的台灣政局帶出一個新的局面。然而，如果稍加分析，這些政治上的所謂重大突破對於台灣未來前途的影響，依我們的瞭解恐怕不會像社會上某些人所預期和盼望的那麼具有重大的決定性，它對台灣的現在與未來的意義，可能還不及目前正在演化中的經濟情勢的影響。這可以從幾方面來說明。

首先，我們不妨先檢討一下，未來可能影響台灣前途的幾股政治力量，依照我個人的看法，大概不外是美國、中共、國民黨與台灣人民，依照理論來說，最具關鍵性的應該是台灣人民的意願與力量，所以不僅在台灣執政的國民黨與剛成立的民進黨都在努力爭取台灣人民的支持，甚至連中共也在努力對台統戰，以爭取台灣人民的好感。但是，在現實上，除非是面臨外來的重大打擊足以使人民感到

有立即失去現有的利益並導致其毀滅的威脅，否則，所謂人民的力量與意願常常並不能發揮它在理論上應該具有的影響力，以今天的情況來說，如果中共不出兵攻打台灣，不使台灣人民感到有立即失去目前所持有的一切的威脅的話，那麼，最能影響台灣前途的政治力量，我認為依其次序，應是美國與中共對台政策、國民黨未來的治台政策，以及民進黨或其他勢力可能對台灣人民所造成的影響。而以美國的國家利益來看，能夠維持台灣現狀對她最為有利，因為在美蘇對抗的形勢下，她必須聯合中共來對抗蘇聯，維持台灣現狀使她能同時與北京和台北維持友好關係，等於擁有兩道抗蘇的防線；且萬一中共與蘇聯修好時，還可以保有台灣海峽的防線，這個戰略利益對美國而言明顯易見，不用贅述。如果台灣宣佈獨立，美國為了不願觸怒中共，以免破壞聯合抗蘇的戰略，必不敢表不贊成，這點美國官方人物已公開有所表示；如果台灣現在就與中國統一，美國也擔心萬一中蘇修好時將會失去台灣這道防線。所以目前國民黨政府的既不統又不獨，既反共又反獨最能投美國所好。至於中共，到目前為止雖然還未完全停止其武力解放台灣的說法，但是，由於中國內部的種種問題已使中共政權應接不暇，對於所謂的「統一大業」實在只能擺在次要的地位，只要台灣不宣佈獨立、不與蘇聯勾結、不發生動亂，基本上她也不得不任台灣維持現狀。至於在台執政的國民黨，雖經四十年的準備，早已明白反攻無望，只要能在台灣繼續統治下去，於願足矣，當然也希望只要能維持現狀就好，所以，在未來的幾年內，台灣基本上還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美國基於自己國家利益， 希望維持台灣的現狀和安定

但是，小幅度的變化卻無法避免。首先是台灣在國民黨統治下四十多年，內部已長期醞釀了不得不變的條件，例如經濟成長與教育普及後對民主政



- 面對美國日益高漲的保護主義，台灣出口貿易面臨威脅

，手段之靈活與高明了，而中共這個一向自許為舉世統戰高手的政權，對這個問題的處理反而落入國民黨所精密設計的圈套中而不自知，難怪其對台統戰要處處落於下風了。

蔣經國之後 國民黨避免不了內鬥

由於蔣經國總統的健康與年齡，誰會成為他真正的接班人？也一直成為大家所關心與注目的問題。前些時期社會上的種種猜測都已被事實所粉碎，目前各方面已漸漸形成比較共同的想法，認為集體領導是比較最可行也是最可能的方式。在集體領導下的國民黨可能很難避免內部派系鬥爭的激化，因此對社會的控制力將較過去個人式的權威領導鬆弛，因此反對勢力將有更大的活動空間，但是軍特的力量也可能會在這種情況下抬頭，而形成比現在更緊張的對立情勢。但是由於美國在幕後的影響力，除非台灣內部發生大暴亂或反美的大勢力，否則美國大概不會容許台灣出現軍事統治的局面，以免再措負支持軍事獨裁的惡名，而且這一定會帶來台灣民眾強大廣泛的反美情緒。

民進黨應該 更積極參與台灣的社會運動

由於前述的各種條件的變化與配合，使民進黨目前在台灣儼然已成為國民黨以外的第二大政治勢力，與國民黨長期培養的力量相較，雖然還相去甚遠，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就往後台灣社會可能的變化來看，她必然會產生相當的影響，至於是否能如某些熱烈支持民進黨的人士所預期的那樣，對台灣前途發揮決定性的作用？這需要看未來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配合。依目前所能見到的現象來看，除非中美之間發生重大衝突，或台灣經濟突然崩潰，否則台灣在未來數年內，即使民進黨能發揮最大的影響力，基本上仍會如上文所分析的，台灣在大的

治的普遍渴望、萬年國會即將凋零殆盡的法統問題、中共和平統戰的壓力與越來越孤立的外交處境、經濟升級的壓力與各種環境公害的問題、民進黨問政的挑戰以及民間普遍覺醒的各種權利意識等等，在在都逼使久已習慣於獨佔壟斷似統治的國民黨政府不得不略做改變。再加上美國基於過去一再支持的反共獨裁政權後來都抵擋不了人民要求當家作主的要求，而紛紛被推翻的教訓，也希望國民黨採取比較民主開放的政策，以免重蹈覆轍。這次民進黨得以順利組成而沒有像過去所發生的類似事件一樣遭到國民黨的鎮壓，不能不承認美國在幕後所發揮的影響力。美國是基於自己的國家利益，為維持台灣的現狀與安定，希望把戒嚴法下非法的反對運動納入法律的軌道，以免發生重大的衝突，菲律賓馬可仕政權倒台的殷鑑不遠，她之不願看到國民黨治下的台灣發生重大不安是可以理解的。

國民黨在上述內外壓力交侵下，雖然以即將解除戒嚴法與容許組黨來換取美國的繼續支持，並以此安撫反對人士，以免反對勢力走入更激進的方向，同時可以預見的是，在無法以人力改變的客觀環境下，她亦將不得不加速其政權與黨的「本土化」。這一點，將使台灣做為一個獨立於中國大陸之外的政治實體的事實更加具體和明確，但是，在表面的宣傳上，她必然還要繼續喊統一而反台獨，其實這是喊給中共聽的；就其實際的作為來看，她應該歡迎台灣獨立的主張，因為這也替在她統治下的台灣之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在國際輿論上製造了她所希望的必要的「民意基礎」。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國民黨在處理這件與她生死攸關的問題上

● 社會運動，才是台灣社會的真正動力。
圖為反核四廠警民追逐。

現狀上將不會改變。因為民進黨對美國依賴的程度，就目前所能見到的，甚至比國民黨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既然如此，美國之欲維持現狀，民進黨又怎麼可能改變它？再就其目前的組成來看，總其量只是部份在政治上反國民黨勢力暫時的聯合而已，由於先天上客觀條件之不足，已使其體質脆弱，再加上成立以後的派系傾軋，更削弱了她的力量，這是很可痛惜的。因此民進黨在未來所能發揮的最大作用，也是最正面的作用應該是促進台灣政治與社會的民主化，並且要盡力為基層民衆爭取更大的利益，才有可能擴大基礎，增加力量。但是就其成立以來的表現來看，它除了在要求政治民主方面有相當不錯的表現外，至於如何為社會上廣大基層民衆爭取更大的利益還甚少表現，對於目前不斷在發生的各種社會運動甚至連參與都沒有，更不用說領導了。這一點民進黨已經有所警覺而迅速成立了社會運動部，我們希望這點覺醒能使民進黨更快更好地成爲一個有力的政黨。然而，以目前民進黨的組成性質來看，她是否能如我們所熱烈期待的那樣，爲台灣廣大的基層民衆的幸福發揮更大的作用呢？這又是我所深切憂慮的。

四、悲觀中的樂觀—— 只要與基層民衆的利益結合， 台灣就有前途

如我們所分析的，既然台灣在經濟發展上似乎很難擺脫對美日經濟大國的依賴而獨立自主，在政治上暫時也難有重大的改變，那麼，我們目前所做的努力有什麼意義呢？這正是我個人在失望悲觀之餘，經過再三思考與自我勉勵後希望找到的答案。不錯，就整個大的形勢來看，台灣不論在政治或經濟上都還難有重大的突破，但是，也正如本文上面所敘述和分析的，各種比較局部的、細節的變化卻在暫難突破的大環境下不斷發生與演化，這些局部的、細節的變化，每一項都明顯地朝廣大基層民衆



的利益在發展，這正是我們在失望悲觀中仍然不失樂觀奮進的理由，我們的前途——也是廣大基層民衆的前途，實在還大有可爲。

台灣的人口組成如果以就業人口別來分析，資本家階層的企業主約佔 4.5%，個體經營的小商人約佔 13%，中上階級的薪水階層約佔 12%，非體力勞動的被僱傭者約佔 20%，勞工階級約佔 32%，自耕農約佔 18%，剩下的 0.5% 則屬於統治官僚階級。過去，統治官僚階級與資本家階層的企業主之間，因爲彼此利害相連而緊密地團結在一起，高高地站在其餘百分之九十五的廣大民衆頭上壟斷其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但是，由於經濟日漸發展與教育普及的結果，老舊腐敗的行政部門已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於是個體經營的小商人與中上階級的薪水階層也爲了他們以外銷爲基礎的經濟利益，而起來要求政治改革與分享政治權力，因此而有七〇年代的民主改革運動。現在進入八〇年代，由於民間企業的繼續擴張，原來由官僚與民營互相分工的方式又已不能滿足新的需要，民營企業由王永慶似的大資本家帶頭，已喊出自由化的要求，企圖向國民黨的官僚資本主義進行滲透與搶奪。同時，一批在經濟發展中上升起來的中小企業主也

企圖擴大其政治影響力，以便在未來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獲取更大的利益。加上政治上長期一元化的統治在教育、學術與文化界所造成的長期壓抑苦悶，以及升遷管道的僵化與堵塞，已使知識分子與青年學生急欲尋找其思想的與社會的出路，於是這幾種力量遂在民主、自由的口號下有意無意地匯集成一股強大的沖擊力量，逼使國民黨不得不採取比較開放的民主的政策，而這股力量也同時帶動了基層民衆權利意識的覺醒，而蔚成現在各種民間勢力的崛起，以及各式各樣的街頭示威的自救活動的產生。

民衆權利意識覺醒， 才是台灣前途希望所繫

從以上簡要的敘述，不難發現國民黨統治下已達四十年之久的台灣的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的分配，由六〇年代、七〇年代與八〇年代幾個不同階段的演化，已由原來極少數特權階級所壟斷與獨佔的局面，漸漸轉向由越來越多人共同分享的局面。雖然目前經濟自由化的結果，可能會造成新的壟斷局面，但是，國民黨的被逼開放黨禁與宣佈即將解嚴，均將更有利於基層民衆站起來爭取他們應有的政治權利與經濟利益，因此可以預見的是，社區民衆權利意識的覺醒，將使民衆的生活品質得到更多的重視與保障，青年學生爭取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運動，與知識分子所領導的反公害、反核能、維護消費者利益及爭取基本人權保障的各種努力，都會使暫時無法產生大量質變的大環境下的基層民衆爭取到更多的利益與生活保障。至於為數高達五百萬以上的龐大勞工弟兄，現在已成為各種政治勢力互相討好與爭奪的對象，國民黨在勞工團體立委選舉中意外地慘遭失敗，已逼使他們不得不重視勞工同胞的意願，不但要在行政院成立勞工委員會，國民黨社工會更已決定在各地設立勞工服務處。而民進黨立委也組成了勞工服務協會，還有勞工法律援助會等等，因為勞工同胞的支持與反對，將成為各種

政治勢力消長的主要變數，也是台灣社會未來發展中最具關鍵性的主要力量。誰獲得廣大勞工同胞的支持，誰就能在未來的政治與社會變局中掌握有力的主導力量。可惜的是，到目前為止，大多的勞工同胞對於自己的重要性與權利的要求還缺乏普遍的自覺，許許多多的勞工同胞與絕大多數被僱傭的非體力勞動的薪水階級，在統治階級與其所御用的學者專家與大眾傳播的錯誤教育下，已自以為擠進了社會中產階級的行列，或即將進入所謂中產階級行列而沾沾自喜。其實凡是未握有生產工具所有權或控制權的被僱傭者，不論其為勞心或勞力者，都還沒有資格被稱為中產階級。這種普遍的自以為是中產階級的幻想，毫無疑問的，將使真正的勞工運動與社會運動遲滯，而阻礙了政治與社會更快更好的改革，這又是我們所深切憂慮的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有待更多真正屬於勞工自己的領袖與代表來組織並領導工會，這樣，真正的社會改革運動才能更好更快地展開，而台灣的前途也才能真正屬於廣大的基層群衆。當台灣未來的前途與廣大基層群衆結合在一起時，這樣的未來的台灣才是我們所追求和期待的。

五、最後的告白

即使以最寬容的標準來衡量，這篇文章絕無資格被稱為一篇嚴謹的評論，充其量也只能說是一個長久關心台灣前途，且一直參與台灣民主運動與社會運動的人，根據日常觀察與閱讀所得，寫下的一篇雜感而已。我不曾受過任何嚴格的社會學與政治經濟學的訓練，出獄至今已兩年半，逼於現實生活的壓力，終日在商場忙碌，雖然走過了中南部的許多鄉下，卻難有完整的時間讀書，遑論靜下心來寫作。因此，文章中思考欠週與引述失誤的地方一定難於避免，懇望讀者先進提出批評指教。如果能因為我的這篇文章而引起更多人來共同討論台灣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問題與未來可能的發展，那將是我們所期盼的。

◎特 稿◎

熱烈期待，深切憂慮

——我對時局的一點理解與分析

■王 拓

一、我們處在變局的關鍵時刻

去年八月間，我應美國艾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之邀請，在美國前後停留了大約五個月。這段時間，剛好是國民黨當局改變其過去動輒以叛亂罪嫌用軍事審判對付政治異己，而改採所謂的「司法」手段不斷在起訴、判決黨外政治運動者，以企圖掩飾其迫害政治異己的惡名的時候；同時也正是黨外人士長期醞釀組黨而始終未能實際跨出行動，卻在許信良等搶先於美國宣佈籌組「台灣民主黨」之後，在民衆的期望與注目的壓力下不得不更積極地進行其組黨工作，以便一方面舒解來自島內外所加予的有形或無形的壓力，一方面企望以組織化的力量更有效地對抗國民黨的壓迫的緊張時刻。該年的九月上旬，由於台北市議員林正杰在議會質詢時指責另一國民黨籍市議員候選人的公開賄選，在鐵證如山的情況下，賄選者竟安全無事，而發出正義之聲的林正杰反遭判刑，終於激起黨外人士與廣大民衆的憤怒與敵愾同仇之心，而不得不走上街頭進行大規模的和平示威。並且極富戲劇性地，由林正杰懷抱了一座繫了黑帶的鐘，在大量軍警與便衣情治人員的層層包圍下，衝破圍堵，勇猛地跑到總統府前去為台灣的司法送「鐘」，而展開了去年年底選舉運動的序幕，也為黨外人士的組黨工作帶來了催化與激化的作用，終於使黨外人士在選舉之前正式組成

● 台灣勞工飽受欺壓，國營企業率先違法





• 王拓



了在國民黨統治下第一個在台灣創立的政黨——民主進步黨，而打破了國民黨治台四十年來嚴格的黨禁，並使民進黨在去年年底的選舉中獲得前所未有的勝利，而有十三位民進黨員進入立法院，十二位進入國民大會，使台灣在政治上開始有了一個略微與前不同的局面。與此同時，國民黨在國際輿論的批評與島內民衆求新求變的壓力下，也終於正式宣佈即將解除在人類近代歷史上最為長久的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統治，而使原已難以壓抑的蠢蠢欲動的各種民間勢力紛紛趁時而起，使得長期在國民黨一元化勢力統治下的台灣，似乎已進入多元化的社會。再加上長久以來一向與統治勢力密切合作無間的大小企業，也在此時紛紛公開提出國際化、自由化與制度化的主張，意圖打破腐敗的國民黨官僚企業的長期獨佔與壟斷，而學界的自由派人士與國民黨內少數的開明要員也公開對企業界所提出的國際化、自由化與制度化表示贊成與呼應。凡此種種，都引起島內外關心台灣前途的人士密切的注目與關切，並普遍認為這是台灣即將邁入一個新時代與新局面的關鍵時刻。

在我訪美期間，雖然只是選擇性地做過幾次公開演講，所講的題目雖然也都僅限於文學或與個人過去所從事的政治與社會運動有關，但是聽衆所提出的最關心的問題，卻都圍繞在島內當時正在激烈演化開展的政治與社會運動上。那也是我生平首次遠離台灣的土地，有幸接觸到許多平時在台灣無緣接觸的資料，也認識了一些在知識上、思想上對我個人頗具啓發與指導作用的朋友，使我有機會能夠比較深刻地反省、檢討自己過去的所學所為，也有機會以較前更為寬廣的視野來觀察思考台灣的問題與未來。現在從新回顧幾個月前自己在國外公開發表的那些關於台灣在政治、經濟與社會方面的一些看法，以及私底下與朋友共同討論切磋所得的意見，有些都已與目前的發展相去不遠，有些問題則還在繼續發展演化中。做一位時時關心台灣未來的發展，並長期參與民主運動的一員，對於台灣當前的

局勢與未來的發展，我有樂觀的期待，也有深刻的憂慮。

二、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 能獨立自主嗎？

對台灣在戰後經濟發展的成就讚揚的文獻有如雨後春筍，近兩年來更由於不斷的出超，外匯儲蓄已達五百六十億元，這固然是有其歷史的、地理的、政治的與社會的種種複雜因素交相作用的結果，而使得台灣人民在某種程度上得以豐衣足食，並普遍均有足夠的營養，許多家庭且擁有奢侈的消費品，這些事實均證明台灣繁榮的程度確已在國際上達到中上的水準。但是這種繁榮得來的代價卻是非常非常的高昂。可能需要連累我們後代的子子孫孫來償付。例如環境的污染，已使台灣幾乎沒有一條乾淨的河流，沒有一片乾淨的海洋；不論城市或鄉下，污濁的空氣比比皆是；垃圾的處理一直是地方政府頭痛棘手的問題；廣大的勞工與農民，在經濟發展中的所得未能得到公平的分配，生活沒有得到充份的照顧，許多家庭雖然終日勞苦，卻無能擁有自有的住宅；未經規劃的建設使人民普遍欠缺適當舒暢的活動空間；因為各種不衛生所引起的疾病，如肝病與呼吸器官的毛病到處皆是等等，以及由於與這些問題有關所引起的社會衝突，更往往演變成爲政治問題。而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政府雖然擁有高達五百六十億美元的外匯儲蓄，卻由於缺乏妥善的政策，反而造成經濟發展的包袱，對內飽受物價上漲的威脅，在外飽受美國強迫台幣升值的壓力，而嚴重傷害了一般民衆的利益，也嚴重傷害了台灣經濟的活動力。

台灣的經濟結構， 長期來存在著 各種內在與外在的危機

如果再略微加以分析，便發現台灣今天所擁有的經濟繁榮其實是十分脆弱的，因為台灣的經濟結構長期以來都存在著各種內在與外在的危機。就外在的來說，台灣是一個海島，對外貿易是其經濟命脈所在，當然不可忽視。但是，台灣對外貿易總額在整個國民生產毛額中所佔的比例卻太高，其依存度已達百分之百，而且又集中於美日兩國，以一九八四年爲例，在進口總額中，自日本進口就佔了29.9%，自美國進口佔23%；出口總額則集中於美國，高達49%，日本則佔10%。貿易收支基本上是以對美貿易的順差來彌補對日貿易的逆差，而形成台美日之間的三角貿易。至於進口的項目，農工原料佔69%，生產資料佔24%；出口則93%是工業製成品，其中紡織成衣佔21%，電子機電佔19%，大部份仍屬於勞力密集，附加價值較低的東西，可見所謂出口貿易的旺暢，其實不過是美日經濟大國外國加工的附庸而已。這種長期的難於擺脫的對外經濟依賴的結果，自然就導致政治上也處處受制於人，幾乎也要淪爲政治附庸的地步。一旦美日兩國發生不可預料的政治經濟變動時，台灣的政治與經濟立刻就要遭到重大的難於挽救的危機。

就內在的因素來說，台灣的經濟從其產業結構來看，基本上是採取公營與民營分工的方式，幾乎所有的基本工業或產業上游部門，例如電力、石油、化學、鋼鐵、造船、肥料、機械、製糖、金屬等等，以及交通、電信、運輸、金融等部門的主要機構也統歸公營，至於民營企業則只扮演衛星產業的角色，例如紡織業、電子業、塑膠業、食品業、水泥業、汽車組件、建築業等等。可見公營與民營企業之間的關係，就像美日經濟與台灣經濟的關係一樣，基本上就有主從之分，上下游之別，以及骨幹與衛星的差異。就規模來說，若以一九八三年爲例，公營企業約近三十家，民營企業大大小小總共有十幾萬家，但近三十家公營企業的資產總值卻與十幾萬家私人企業的總資產相當，可見公營企業規模之大，均具有獨家壟斷的能力與性格。但是就台灣

● 民進黨的成立，打破了國民黨四十年來的黨禁



經濟發展的作用來看，民營卻質優於公營。在非農業產業部門的總產值中，公營只佔19%，而民營則佔81%；另從市場結構來看，內銷市場公營佔39%，民營佔61%；外銷市場公營只佔3%，而民營企業則高達97%，民營外銷中，大企業佔36%，中小企業佔61%，中小企業外銷約兩倍於大型企業的規模。由以上資料可明顯看出，公營企業完全是依靠政治勢力壟斷內銷市場才得以生存。長期以來，公營企業之經營不善及其獨家壟斷的特性，已使私營企業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加重了生產成本，如今面臨國際市場競爭更加白熱化，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紛紛以其更廉價的勞力密集嚴重威脅台灣對外貿易競爭力時，大大小小的企業主紛紛喊出國際化、自由化與制度化的要求，是有其內外長期的積因存在。

**自由化的主張，
其實只不過是把現有資源
重新分配與組合而已**

國際化應是島國經濟全力以赴所要達到的目標，也是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尤其是保護主義普遍抬頭的現在，跨國企業應是台灣大企業家夢寐以求的，也是台灣經濟維持活動力向外擴張必走的道路，但企業要國際化必須依靠資金與技術，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則必需做到「物美價廉」。但是，由於台灣的基本工業均屬公營企業，其經營不善而加重所有私營企業的成本負擔已如前述，因此，台灣的大企業主在喊出國際化的同時，也提出自由化的要求——尊重市場供需原理，不要用政治力量維護公營企業的壟斷，而令其自由競爭，或主張把公營企業開放民營，其最根本的原因在此。但是，這樣的自由化的主張，不論是公營企業開放民營，或是容許私人企業投資於原屬公營企業壟斷的產業與之競爭，其實都不過是把現有資源重新分配與組合而已，也就是說把原來官僚企業的壟斷打破，再由一批資本家組成財團，建立另一新的壟斷。但是這種自由化的主張卻為保守的官僚集團所抗拒，因為公營企業是國民黨統治官僚集團最重要的物質基礎，如果失去這些物質基礎，對他們而言，後果是不堪設想的。至於所謂的「制度化」，除了根據常識的說法，可以望文生義外，若根據上面的分析，還可稱之

為「現有資源重新分配的合法化」。國際化是自由化的目的，自由化則是國際化的條件，而制度化則是自由化的保障。台灣的經濟必需向外發展才有生路，因此這是一條不能避免的道路，但是國際化與自由化之後，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將會越來越小，台幣目前在美國政治勢力壓迫下不斷升值，已使這種趨勢加速惡化。台灣的社會在這種趨勢下可能會越來越朝向兩極化發展，原來的中小企業主大部份將淪為領薪階級。而原在中小企業工作的幾百萬被僱傭者到底有多少人能被大企業所吸納，將會成為影響未來台灣社會內部變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又既使完成了所謂的「三化」，台灣的經濟是否能真正突破百年來對外經濟的依賴性而獨立自主呢？台灣在目前的經濟發展中所發生的弊害和代價是否能得到改善和維持呢？這些問題都是我們所深切憂慮的。

三、台灣政治的變與不變

近半年多來，台灣現實政治的變化在島內外所引起的關注遠比任何問題都來得廣泛深遠，尤其是民進黨以實際行動突破長期黨禁，以及國民黨的宣佈即將解嚴，都是我們長期以來一直盼望和追求的，因此一般心理都預期著這些政治上的變化將為長久不變的台灣政局帶出一個新的局面。然而，如果稍加分析，這些政治上的所謂重大突破對於台灣未來前途的影響，依我們的瞭解恐怕不會像社會上某些人所預期和盼望的那麼具有重大的決定性，它對台灣的現在與未來的意義，可能還不及目前正在演化中的經濟情勢的影響。這可以從幾方面來說明。

首先，我們不妨先檢討一下，未來可能影響台灣前途的幾股政治力量，依照我個人的看法，大概不外是美國、中共、國民黨與台灣人民，依照理論來說，最具關鍵性的應該是台灣人民的意願與力量，所以不僅在台灣執政的國民黨與剛成立的民進黨都在努力爭取台灣人民的支持，甚至連中共也在努力對台統戰，以爭取台灣人民的好感。但是，在現實上，除非是面臨外來的重大打擊足以使人民感到

有立即失去現有的利益並導致其毀滅的威脅，否則，所謂人民的力量與意願常常並不能發揮它在理論上應該具有的影響力，以今天的情況來說，如果中共不出兵攻打台灣，不使台灣人民感到有立即失去目前所持有的一切的威脅的話，那麼，最能影響台灣前途的政治力量，我認為依其次序，應是美國與中共對台政策、國民黨未來的治台政策，以及民進黨或其他勢力可能對台灣人民所造成的影響。而以美國的國家利益來看，能夠維持台灣現狀對她最為有利，因為在美蘇對抗的形勢下，她必須聯合中共來對抗蘇聯，維持台灣現狀使她能同時與北京和台北維持友好關係，等於擁有兩道抗蘇的防線；且萬一中共與蘇聯修好時，還可以保有台灣海峽的防線，這個戰略利益對美國而言明顯易見，不用贅述。如果台灣宣佈獨立，美國為了不願觸怒中共，以免破壞聯合抗蘇的戰略，必不敢表不贊成，這點美國官方人物已公開有所表示；如果台灣現在就與中國統一，美國也擔心萬一中蘇修好時將會失去台灣這道防線。所以目前國民黨政府的既不統又不獨，既反共又反獨最能投美國所好。至於中共，到目前為止雖然還未完全停止其武力解放台灣的說法，但是，由於中國內部的種種問題已使中共政權應接不暇，對於所謂的「統一大業」實在只能擺在次要的地位，只要台灣不宣佈獨立、不與蘇聯勾結、不發生動亂，基本上她也不得不任台灣維持現狀。至於在台執政的國民黨，雖經四十年的準備，早已明白反攻無望，只要能在台灣繼續統治下去，於願足矣，當然也希望只要能維持現狀就好，所以，在未來的幾年內，台灣基本上還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美國基於自己國家利益， 希望維持台灣的現狀和安定

但是，小幅度的變化卻無法避免。首先是台灣在國民黨統治下四十多年，內部已長期醞釀了不得不變的條件，例如經濟成長與教育普及後對民主政



- 面對美國日益高漲的保護主義，台灣出口貿易面臨威脅

，手段之靈活與高明了，而中共這個一向自許為舉世統戰高手的政權，對這個問題的處理反而落入國民黨所精密設計的圈套中而不自知，難怪其對台統戰要處處落於下風了。

蔣經國之後 國民黨避免不了內鬥

由於蔣經國總統的健康與年齡，誰會成為他真正的接班人？也一直成為大家所關心與注目的問題。前些時期社會上的種種猜測都已被事實所粉碎，目前各方面已漸漸形成比較共同的想法，認為集體領導是比較最可行也是最可能的方式。在集體領導下的國民黨可能很難避免內部派系鬥爭的激化，因此對社會的控制力將較過去個人式的權威領導鬆弛，因此反對勢力將有更大的活動空間，但是軍特的力量也可能會在這種情況下抬頭，而形成比現在更緊張的對立情勢。但是由於美國在幕後的影響力，除非台灣內部發生大暴亂或反美的大勢力，否則美國大概不會容許台灣出現軍事統治的局面，以免再措負支持軍事獨裁的惡名，而且這一定會帶來台灣民眾強大廣泛的反美情緒。

民進黨應該 更積極參與台灣的社會運動

由於前述的各種條件的變化與配合，使民進黨目前在台灣儼然已成為國民黨以外的第二大政治勢力，與國民黨長期培養的力量相較，雖然還相去甚遠，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就往後台灣社會可能的變化來看，她必然會產生相當的影響，至於是否能如某些熱烈支持民進黨的人士所預期的那樣，對台灣前途發揮決定性的作用？這需要看未來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配合。依目前所能見到的現象來看，除非中美之間發生重大衝突，或台灣經濟突然崩潰，否則台灣在未來數年內，即使民進黨能發揮最大的影響力，基本上仍會如上文所分析的，台灣在大的

治的普遍渴望、萬年國會即將凋零殆盡的法統問題、中共和平統戰的壓力與越來越孤立的外交處境、經濟升級的壓力與各種環境公害的問題、民進黨問政的挑戰以及民間普遍覺醒的各種權利意識等等，在在都逼使久已習慣於獨佔壟斷似統治的國民黨政府不得不略做改變。再加上美國基於過去一再支持的反共獨裁政權後來都抵擋不了人民要求當家作主的要求，而紛紛被推翻的教訓，也希望國民黨採取比較民主開放的政策，以免重蹈覆轍。這次民進黨得以順利組成而沒有像過去所發生的類似事件一樣遭到國民黨的鎮壓，不能不承認美國在幕後所發揮的影響力。美國是基於自己的國家利益，為維持台灣的現狀與安定，希望把戒嚴法下非法的反對運動納入法律的軌道，以免發生重大的衝突，菲律賓馬可仕政權倒台的殷鑑不遠，她之不願看到國民黨治下的台灣發生重大不安是可以理解的。

國民黨在上述內外壓力交侵下，雖然以即將解除戒嚴法與容許組黨來換取美國的繼續支持，並以此安撫反對人士，以免反對勢力走入更激進的方向，同時可以預見的是，在無法以人力改變的客觀環境下，她亦將不得不加速其政權與黨的「本土化」。這一點，將使台灣做為一個獨立於中國大陸之外的政治實體的事實更加具體和明確，但是，在表面的宣傳上，她必然還要繼續喊統一而反台獨，其實這是喊給中共聽的；就其實際的作為來看，她應該歡迎台灣獨立的主張，因為這也替在她統治下的台灣之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在國際輿論上製造了她所希望的必要的「民意基礎」。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國民黨在處理這件與她生死攸關的問題上

● 社會運動，才是台灣社會的真正動力。
圖為反核四廠警民追逐。

現狀上將不會改變。因為民進黨對美國依賴的程度，就目前所能見到的，甚至比國民黨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既然如此，美國之欲維持現狀，民進黨又怎麼可能改變它？再就其目前的組成來看，總其量只是部份在政治上反國民黨勢力暫時的聯合而已，由於先天上客觀條件之不足，已使其體質脆弱，再加上成立以後的派系傾軋，更削弱了她的力量，這是很可痛惜的。因此民進黨在未來所能發揮的最大作用，也是最正面的作用應該是促進台灣政治與社會的民主化，並且要盡力為基層民衆爭取更大的利益，才有可能擴大基礎，增加力量。但是就其成立以來的表現來看，它除了在要求政治民主方面有相當不錯的表現外，至於如何為社會上廣大基層民衆爭取更大的利益還甚少表現，對於目前不斷在發生的各種社會運動甚至連參與都沒有，更不用說領導了。這一點民進黨已經有所警覺而迅速成立了社會運動部，我們希望這點覺醒能使民進黨更快更好地成爲一個有力的政黨。然而，以目前民進黨的組成性質來看，她是否能如我們所熱烈期待的那樣，爲台灣廣大的基層民衆的幸福發揮更大的作用呢？這又是我所深切憂慮的。

四、悲觀中的樂觀—— 只要與基層民衆的利益結合， 台灣就有前途

如我們所分析的，既然台灣在經濟發展上似乎很難擺脫對美日經濟大國的依賴而獨立自主，在政治上暫時也難有重大的改變，那麼，我們目前所做的努力有什麼意義呢？這正是我個人在失望悲觀之餘，經過再三思考與自我勉勵後希望找到的答案。不錯，就整個大的形勢來看，台灣不論在政治或經濟上都還難有重大的突破，但是，也正如本文上面所敘述和分析的，各種比較局部的、細節的變化卻在暫難突破的大環境下不斷發生與演化，這些局部的、細節的變化，每一項都明顯地朝廣大基層民衆



的利益在發展，這正是我們在失望悲觀中仍然不失樂觀奮進的理由，我們的前途——也是廣大基層民衆的前途，實在還大有可爲。

台灣的人口組成如果以就業人口別來分析，資本家階層的企業主約佔 4.5%，個體經營的小商人約佔 13%，中上階級的薪水階層約佔 12%，非體力勞動的被僱傭者約佔 20%，勞工階級約佔 32%，自耕農約佔 18%，剩下的 0.5% 則屬於統治官僚階級。過去，統治官僚階級與資本家階層的企業主之間，因爲彼此利害相連而緊密地團結在一起，高高地站在其餘百分之九十五的廣大民衆頭上壟斷其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但是，由於經濟日漸發展與教育普及的結果，老舊腐敗的行政部門已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於是個體經營的小商人與中上階級的薪水階層也爲了他們以外銷爲基礎的經濟利益，而起來要求政治改革與分享政治權力，因此而有七〇年代的民主改革運動。現在進入八〇年代，由於民間企業的繼續擴張，原來由官僚與民營互相分工的方式又已不能滿足新的需要，民營企業由王永慶似的大資本家帶頭，已喊出自由化的要求，企圖向國民黨的官僚資本主義進行滲透與搶奪。同時，一批在經濟發展中上升起來的中小企業主也

企圖擴大其政治影響力，以便在未來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獲取更大的利益。加上政治上長期一元化的統治在教育、學術與文化界所造成的長期壓抑苦悶，以及升遷管道的僵化與堵塞，已使知識分子與青年學生急欲尋找其思想的與社會的出路，於是這幾種力量遂在民主、自由的口號下有意無意地匯集成一股強大的沖擊力量，逼使國民黨不得不採取比較開放的民主的政策，而這股力量也同時帶動了基層民衆權利意識的覺醒，而蔚成現在各種民間勢力的崛起，以及各式各樣的街頭示威的自救活動的產生。

民衆權利意識覺醒， 才是台灣前途希望所繫

從以上簡要的敘述，不難發現國民黨統治下已達四十年之久的台灣的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的分配，由六〇年代、七〇年代與八〇年代幾個不同階段的演化，已由原來極少數特權階級所壟斷與獨佔的局面，漸漸轉向由越來越多人共同分享的局面。雖然目前經濟自由化的結果，可能會造成新的壟斷局面，但是，國民黨的被逼開放黨禁與宣佈即將解嚴，均將更有利於基層民衆站起來爭取他們應有的政治權利與經濟利益，因此可以預見的是，社區民衆權利意識的覺醒，將使民衆的生活品質得到更多的重視與保障，青年學生爭取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運動，與知識分子所領導的反公害、反核能、維護消費者利益及爭取基本人權保障的各種努力，都會使暫時無法產生大量質變的大環境下的基層民衆爭取到更多的利益與生活保障。至於為數高達五百萬以上的龐大勞工弟兄，現在已成為各種政治勢力互相討好與爭奪的對象，國民黨在勞工團體立委選舉中意外地慘遭失敗，已逼使他們不得不重視勞工同胞的意願，不但要在行政院成立勞工委員會，國民黨社工會更已決定在各地設立勞工服務處。而民進黨立委也組成了勞工服務協會，還有勞工法律援助會等等，因為勞工同胞的支持與反對，將成為各種

政治勢力消長的主要變數，也是台灣社會未來發展中最具關鍵性的主要力量。誰獲得廣大勞工同胞的支持，誰就能在未來的政治與社會變局中掌握有力的主導力量。可惜的是，到目前為止，大多的勞工同胞對於自己的重要性與權利的要求還缺乏普遍的自覺，許許多多的勞工同胞與絕大多數被僱傭的非體力勞動的薪水階級，在統治階級與其所御用的學者專家與大眾傳播的錯誤教育下，已自以為擠進了社會中產階級的行列，或即將進入所謂中產階級行列而沾沾自喜。其實凡是未握有生產工具所有權或控制權的被僱傭者，不論其為勞心或勞力者，都還沒有資格被稱為中產階級。這種普遍的自以為是中產階級的幻想，毫無疑問的，將使真正的勞工運動與社會運動遲滯，而阻礙了政治與社會更快更好的改革，這又是我們所深切憂慮的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有待更多真正屬於勞工自己的領袖與代表來組織並領導工會，這樣，真正的社會改革運動才能更好更快地展開，而台灣的前途也才能真正屬於廣大的基層群衆。當台灣未來的前途與廣大基層群衆結合在一起時，這樣的未來的台灣才是我們所追求和期待的。

五、最後的告白

即使以最寬容的標準來衡量，這篇文章絕無資格被稱為一篇嚴謹的評論，充其量也只能說是一個長久關心台灣前途，且一直參與台灣民主運動與社會運動的人，根據日常觀察與閱讀所得，寫下的一篇雜感而已。我不曾受過任何嚴格的社會學與政治經濟學的訓練，出獄至今已兩年半，逼於現實生活的壓力，終日在商場忙碌，雖然走過了中南部的許多鄉下，卻難有完整的時間讀書，遑論靜下心來寫作。因此，文章中思考欠週與引述失誤的地方一定難於避免，懇望讀者先進提出批評指教。如果能因為我的這篇文章而引起更多人來共同討論台灣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問題與未來可能的發展，那將是我們所期盼的。

◎世界之窗◎

華府四、廿五示威遊行

十萬名美國人齊集華盛頓抗議美國援助尼加拉瓜叛軍並反對政府與財團支持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中華民國的政府與商人也聽命於美國而支持尼加拉瓜叛軍，台灣的資本家更在南非大肆壓榨、凌虐南非的黑人，因而遭到「台灣人比白人還壞！」的惡評。美國人民的抗議行動可為台灣人民的借鏡。

■邱平妹

四月廿五日，華府早晨的天空凝重如鉛，擾人的細雨漫天撒落，氣溫攝氏八度。

一千多部巴士滿載全國各地男女老少，浩浩蕩蕩地駛進華府，紐約一區出動四百多輛巴士，遠至洛杉磯也有四十多部巴士長驅趕來，波士頓地區的街頭流浪者一千三百人，乘坐「和平列車」南下助陣，參加「全國動員為中美洲及南非的正義與和平」示威遊行活動。

美國各層人民大聯合

這次示威的焦點集中在雷根政府，遊行的目的在於支持中美洲和南非的和平與自由，停止美國援助尼加拉瓜叛軍，制止美國政府及財團企業支持南非種族隔離政策。

十萬名示威群眾中，有長髮及肩的嬉皮、衣冠楚楚的優皮、穿戴整齊的職業婦女、派發傳單的女活動家、掛工會徽章的工人、黑衣白巾的修女、大學教授和學生……，有滿頭銀髮的祖父母。有的五十年前曾遠赴西班牙英勇地打過反法西斯之戰、有的是

我們第一！



我們美國全球：

- 軍費支出第一
- 軍事科技第一
- 軍事基地以及海軍艦隊數目第一
- 核子彈及彈頭數第一
- 但我們在全世界排名：
- 個人壽命期望第七
- 每位學生的公立教育費用支出第十
- 獲得完全乾淨飲水的入口比例第十四
- 嬰兒死亡率第十七
- 醫生人數和全國人口比例第二十二

每一支造好的槍，
的火箭追根究底都是
盜竊來的。

創記

——抗議雷根政府中美洲及南非政策



，飛艦和每一顆發射
都是寒而無衣者那兒

— Eisenhower

參加美國民權運動的終生老兵、有花髮的中年人，不少人是六〇年代叱咤風雲的反越戰健將，有稚氣難隱的年輕人，他們許多人的父母是爭民權和反越戰的鬥士；此外有各色人種參加，其中菲律賓和南韓各有自己的遊行隊伍和標語，南韓隊著一身白服，頭綁白巾，擊鼓吹奏，當街而舞，十分搶眼；一團白人連續表演街頭政治劇，為遊行添色不少。這次遊行稱得上是名符其實的彩虹聯盟。

示威群眾先在白宮前聚集，聆聽演講、歌唱、誦詩，然後在旗海標語中，步行經過泥濘的草地，朝國會推進，在國會大廈前再繼續演講活動。從演講人名單中，也可以發現這次遊行的確是各層人民大聯合，演講者有工會主席、教會主教牧師、彩虹聯盟主席、全國婦女組織主席、銀幕演員協會前任會長、越戰退伍軍人、農民代表、無住屋者代表，此外還有來自 Africa National Congress、薩爾瓦多、菲律賓和中東等代表。

工人抨擊雷根政府 受財團支配、犧牲勞動者

這次遊行最特殊的，恐怕是工會的參與。三十五年來，對於這類抗議美國外交政策活動，不少工會持觀望態度。根據全國政府雇員聯盟主席 K.

T. Blaylock 估計，這次與會工會人士達四萬五千人，佔示威人群半數；遊行的指導委員會三十五位委員中，廿四位是工會領袖，其中五位工會主席來自全國最大的六個工會。

工人的積極介入是有其原因的，在一張紐約的工會的傳單中可以讀到「為什麼我們遊行」的表白，「雷根政府以民主之名來推行中美洲及南非政策，事實上，雷根政策受美國財團支配，這個政策不但蹂躪了中美洲及南非，而且還威脅到我們國家成千上萬的工人。……雷根政府花費億萬公款支持獨裁者，鎮壓其勞動人民，同時眼看美國大公司棄置國內工會工人，遠赴國外投資，造成國內百萬工人失業，却無動于衷，為了讓我們更清楚它的訊息，雷根政府幾乎刪裁每一項有意義的、針對貧窮與勞動者的社會計畫。」

美國勞動者對雷根政府犧牲人民生活水平，大肆擴張軍備的政策，已到忍無可忍的地步，一份「我們第一！」的傳單列舉美國在軍費、軍事科技、全球軍事基地和戰艦以及核彈總數上，高居世界第一；然而國民壽命世界第七名，平均學生公共教育費用第十名，缺乏安全飲水的人口比率第十四名，嬰兒死亡率第十七名，人口與醫生比率第廿二名。



●示威後，群眾齊集華盛頓西邊的空地上。

右翼工會為虎作倀

諷刺的是，美國全國總工會主席 L. Kirkland 及其他右翼工會領袖却對此次動員採取杯葛行動，散發類似麥卡錫時代的「白皮書」，指控此次聯盟遊行係由共產黨操縱，譴責它公開支持薩爾瓦多的馬列遊擊隊及尼加拉瓜的桑定政權，它說：「如同過去一樣，今天極端左翼團體復活，它們竭力促使工會及宗教團體，為它們的目標而服務。任何人只要記得三〇年代由共產黨組成的大眾戰線，就會明白這次四月的動員會怎麼運作，是怎麼一回事。五十年前議題是西班牙內戰，當時的敵人是法西斯及種族歧視，那時共產黨是組織的力量，推行蘇聯的議程；現在議題是中美洲，敵人是雷根政府和中美洲的寡頭政治，組織幹部來自「團結薩爾瓦多人民委員會」及其同盟，議程則一如桑定政權以及中美洲的馬列政團。」

事實上，這次示威遊行工會人數高達一半，即是對總工會右翼勢力一個有力的反擊。隨著雷根政府軍售醜聞的白熱化、軍費預算的激增以及國內社會經濟問題的嚴重，人民會繼續被迫走上街頭，來展示大眾的意願，掀起人民自力救濟的高潮，正如同廿年前，當五角大廈再也不能隱瞞其無法主宰越南人民的事實後，反越戰情緒達到最高峯。

這個草根運動會繼續壯大下去，但是同時美國人民必須面對一些惱人但嚴肅的挑戰：

1. 解開反共情結。
2. 打破「第三世界一旦擺脫美國支配，即會落入蘇聯擴張的陷阱」神話。
3. 尊重每一個國家有選擇其社會制度的自由。
4. 反對美國支持以色列，以色列不但長期侵略黎巴嫩，而且是美國軍售醜聞的中介者，且軍售南非以及中美洲獨裁政權。

台灣資本家在南非苛虐黑人

最後，做為一個台灣人參與這場示威遊行，頗有感觸。很遺憾，遊行中沒有自己同胞的隊伍，只能混雜在美國人的隊伍中；當美國人民抗議迫使其政府從南非撤除投資時，當經濟制裁南非種族隔離政策已成為世界潮流時，台灣的資本家却乘虛而入，設立工廠，享受南非政府的巨額津貼，榨取南非種族隔離政策下所造成的廉價黑人勞力。

根據華盛頓郵報四月十日消息，在南非一處最大的黑人徙置營到夏貝洛，四十三家工廠中，十七家屬於台灣公司所有，四家是以色列公司，兩家是香港人開的，西方大公司一家也沒有。在其他四十八個徙置營中，台灣和以色列也是主要雇主，全南非台灣工廠總共七十五家。在所有外國工廠中，台灣工廠工資最低、工作環境也最惡劣。據一項對外國投資者的調查研究，台灣工廠經理歧視黑人，認為他們缺乏技術、生產力太低，台灣「新點時裝公司」成衣廠老板娘彭邦



● 旗幟上寫著：「停止干涉菲律賓！」

芳說：「他們不像中國人那樣努力工作，如果他們偷懶工作不努力，你怎麼能多付工資？」當地許多黑人抱怨台灣雇主對黑人過度蠻橫，有兩位受訪者還說他們被台灣老闆毆打，一位在台灣寶石工廠作工的工人說：「台灣人比波爾人還壞」，「波爾人」是黑人對白人統治者的稱呼。

台灣人真的比波爾人還壞嗎？當然不是，壞的是前去投資壓榨的台灣資本家，然而做為整體的台灣人却要集體背負這個惡名。正如美國政府掀起越戰，落得「醜陋的美國人」封號，它有賴美國人民以集體抗議行動監



督政府及財團政策，來洗刷這個殘留在異國受害人心中的污點；同樣地，「台灣人比波爾人還壞」的惡名得靠台灣的人民以實際集體行動來洗滌。

● 男女老少共同聲討美國帝國主義的干涉政策。



退潮中的 美國新右派

■長權

美國新右派力量的興起大約在10年前，滋生於全美各地的新右派小團體在1978年的參議員選舉中成功的支持保守右派議員擊敗自由派，接著又在1980年總統選舉中，將雷根選進白宮。新右派中品類繁多的聯盟是造成新右派勢力興盛的主因，這個聯盟的兩股重要勢力是美國聖經帶各州（Bible Belt）的原教旨主義者（Fundamentalist）以及被通貨膨脹、墮胎及自由戀愛與社會、經濟現象所迷惑的都市藍領階級。促成這種結合宗教慰藉與泛階級性聯盟產生的一大原因是美國在越南戰場的挫敗。

今天，面臨角色認同危機的新右派，在雷根未盡成功的「右派革命」的挫折之下，正在做困獸之鬥，以避免從美國主流政潮中消失。從1986年秋天的眾議員、州長改選起，新右派為其代言人籌募政治資金已顯得力不從心，而各種民意測驗也顯示一般選民支持增加美國政府對環境及教育的支出，這些現象顯示，新右派正在喪失它的動力。對新右派最致命的一擊莫過於雷根政府的「伊朗—尼加拉反抗軍醜聞」（Irangate），許多新右派的領導者及募款者的牽涉此案—像Pat Buchanan、辛格勞布等，使得新右派的政治信用徹底瓦解。而戈巴契夫接二連三的限制武提議使得新右派藉著最近一部以醜化蘇聯為主調的電視影集—阿美利卡（Amerika）所做的極右意識型態的絕地大反擊，失去了這種型態宣傳在過去十年來對美國及其第三世界「自由

附庸國」的有力影響。

沒有主義，沒有領導， 沒有敵人，沒有錢的運動

多年來一直是新右派思想庫的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以乎已用盡了所有保守思想的包裝紙，所有可資宣傳的話題也都被雷根用盡—像武力解決共產主義的藍波主義（Ramboism）劫貧濟富的稅法改革、違憲的學校傳教以及造成農業破產的「無為而治」（hands off）的行政措施。這些一度是美國強大、美國人自主的「新希望」，隨著伊朗醜聞、佈道者詐財醜聞而幻滅。想想看，當以捍衛自由民主自居的「反共愛國者」與宣揚博愛、重拾美國人道德、良心的宗教宣傳家，到頭來也不過是借著這些謊言飽私囊、營私利的一丘之貉時，傳統基金會還有什麼新把戲可以欺騙美國人？傳統基金會在第三世界的代言人—一文人政府中留美的「新生代開明派」及軍隊中新興的、受美國國防部訓練的「職業軍人」，在骯髒的後台被揭穿之後，還能繼續使用「自由的鬥士」、「反共的堡壘」、「理性的改革」這些爛掉牙的辭彙暢行無阻嗎？

新右派的脆弱性表現得最清楚的地方，就在1988年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迄今為止沒有一個共和黨候選人—康普（Komp）、布希（Bush）、杜爾（Dole）、拉克斯特（Laxalt）、杜邦（Dupont）或是羅勃生（Robertson）可以整合



- 美國的國家主義
- 自越戰挫敗後
- 日益高漲



這個瓦解中的保守陣營。前國務卿海格 (Haig) 因為曾經跟吉辛吉 (Kissinger) 共同解東西的冷戰低盪 (detent) 自然不會被新右派所喜歡，而部份新右派屬意的專欄作家布洽楠 (Pat Buchanan) 跟現任教育部長、哈佛法學院畢業生班那特 (William Bennett) 却被新右派領導者之一，北卡州的參議員、中華民國之友赫姆斯 (Jesse Helms) 所否決。

除了缺乏主義、缺乏領導者之外，沒有明顯的敵對目標跟日漸萎縮的籌錢能力，是新右派運動的兩個限制。原來有可能競選的參議員甘迺迪 (Edward M. Kennedy) 及紐約州長郭謨 (Mario Cuomo)，是最能激起新右派戰鬥意志的民主黨自由派人士，但是由於他們雙雙宣布不參選，使得新右派喪失了借打擊政敵、危機意識而整合的機會平白喪失。現有的民主黨候選人當中，除了麻州州長杜卡吉士 (Dukakis) 還值得一提之外，似乎沒有一個是意識上跟新右派絕對不容的。財力問題是最後一項阻滯新右派發展的因素。衆多的醜聞使原來的支持者不再盲目地將錢丟進新右派漂亮的宣傳詞句中，人們已開始問這些偉大的美國救贖者們，爲誰？爲何而捐錢？

新右派與雷根

恰恰好跟自由派對雷根的觀點相左的是，自由派人士不斷地宣稱雷根帶給了美國自由派空前的壓制與打擊，而新右派却認爲雷根正像尼克森一

樣，借著保守派取得總統席位却採取「溫和」的幕僚及政策。他們甚至抱怨雷根藉著個人聲望吸引掉大衆對極端保守原則之熱心，他們甚且指控這情形跟中共以前搞「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情形沒有兩樣。令新右派難以忍受的是，從雷根的第二任任期後的許多內政及外交政策，像雷根開始跟曾經被他稱爲「邪惡的帝國」蘇聯接觸、談判，在一些行政部門中任命了「思想不純正」的主管，像環境保護署署長 (EPA) 及勞工安全衛生署署長 (OSHA)。其實這些單位早已被雷根的預算減縮得動彈不得，新右派們的想法是 EPA 及 OSHA 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更加令新右派感到挫折的是被他們認爲「同志」的新任大法官之一 Manion 最近支持婦女權的保障，以及美國醫師會會長庫普 (C. Everett Koop) (一個反對墮胎者) 的支持學校性教育及使用保險套預防愛滋病。而雷根跟伊朗柯梅尼 (Khomeini) 政權的接觸以及在這一事件中未能盡全力保護新右派的「美國的英雄」——諾斯上校 (Oliver North) 已遠遠超過他們所能忍受的範圍。

然而就像一對老夫婦一樣，新右派跟雷根雖然爭吵不斷，却不會公然分離。白宮新的幕僚長貝克 (Howard Baker) 這位曾經支持歸還巴拿馬運河給巴拿馬的前參議員，毫無疑問的，這樣有削弱美國國力記錄的人選進白宮，當然不爲新右派所接受。雷根當然知道箇中道理，爲求拉攏新右派的勢力，貝克在雷根的指示下

- 「人人都有在天橋下睡覺自由」，但只有窮人流浪漢不得不睡在橋下。

聘任傳統基金會主席 Edwin J. Feulner 為幕僚顧問，算是一種安撫。

面對美國政治潮流正由極右擺回中間，新右派深知下一任美國總統非民主黨莫屬，新右派的謀略家，特別是傳統基金會中的政治顧問，正採取另一套策略——以退為進。正當一大批中層行政幕僚離開這個跛腳鴨的政府之際，傳統基金會從各州及各大學校園吸收新的保守青年，安排他們進入聯邦政府工作，目的在於佔據位子，取得資歷。因為新右派深深地從雷根的第一任期中學得教訓，當時他們沒有足夠資格的保守份子進去填補許多政府機構的高級職位，延誤了雷根革命的時間。今天，他們已很自豪的

宣稱，不論那一個層級的官僚都有他們的人，而且人數不斷的擴充中。這一批新儲備的生力軍，只等待下一任共和黨當政的來臨，一舉完成他們未竟的志業。最值得吾人關注的是這一套「資歷、經驗」的用人原則，深深地符合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僵硬、死板的官僚取用制度。而龐大的、濫權的第三世界行政官僚，在沒有政權更換的威脅下，傳統基金會這種人海戰術——訓練一批批保守思想的、佔著茅坑的技術官僚、職業軍官，雖然會因雷根的下台暫時中斷他們對美國政治的影響，但在第三世界的作用，顯然只會持續擴大，成為美國保守派遙控世界的不二法寶。



為什麼 他們無家可歸？

■何洵

近年來美國社會兩極化的現象更趨明顯，一方面中上層階級，為了保持苗條健美的身段，不惜擲千金於各種減肥及健身活動；另一方面下層階級大批流落街頭，成為都市的遊民。

根據全美無住屋者聯盟估計，無住屋者在各大城的分佈情形是：紐約市六萬、洛杉磯五萬、芝加哥二萬五千、休士頓二萬五千、巴提摩二萬、費城一萬五千、達拉斯一萬四千、三

藩市一萬、波士頓九千……，總共全美無住屋者三百萬。

美於無住屋者這個社會危機，有三個特徵值得注意：

(1)人數增長率：據紐約市去年十二月的調查，住過紐約市救急棲息所的個人有一百名，家庭有四千五百家，這個數目是四年前的三倍。

(2)兒童的比率：在無住屋者的家庭中，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兒童，這些

●在美國德州的一家教會收容所的附近



兒童成人後，對社會將有如何的衝擊？

(3)貧窮婦女化：在波士頓曾做過調查，一千兩百個無住屋家庭，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女性單親的家庭。

無住屋者問題是一個政治經濟問題

如何解釋這個日益激化的都市問題？答案見仁見智。美國總統雷根的解釋是：「你可以說，無住屋者之所以成為無住屋者，是出於個人選擇。」也有人認為是精神病院的鬆弛政策，導致大批精神病患者流落街頭。然而根據紐約州精神研究所對紐約市救急棲息所的調查，只有百分之十四的人曾為精神病患、百分之十四酗酒、百分之十四吸毒，因此絕大部份的無住屋者並非精神病患。

無住屋者問題，既不是出於當事人自願，也不是醫學問題，而是一個社會經濟問題，可從失業率及政府住屋政策兩方面來看：

失業率從一九七〇年的5%，升至一九八二年的10%，目前是7%。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七七至一九八四年之間所造就的就業機會，其中百分之四十四給付低於貧窮線下的工資。不幸的是長期失業或半就業似乎已成爲

美國經濟的一個可被接受的現象。

失業者或半就業者，在缺乏親戚的援助下，被迫流落街頭。荒謬的是這個社會不能讓三百萬人民有最起碼的棲息住所，却願花上億的經費來從事存疑的星球大戰計畫。

除了失業的因素外，雷根政府的住屋政策也是一項重要因素。都市重建計畫，從舊金山市的南市場，經芝加哥的總統大樓，到紐約市的42街，將過去窮人住的低租公寓改建爲富人住的高級公寓。固然重建帶來都市繁榮，却使窮人付出流離失所的代價，自一九七一年以來，紐約市失去了十萬五千間低租單房公寓。

郊區窮人也不能倖免，例如新罕布州Portsmouth，爲了使該鎮經濟起死回生，發展觀光事業，房地產商、建築商將舊村落改建成豪華公寓，自一九八四年以來，讓地產價上漲一倍，房租上漲二至三倍，使當地窮人嚐到住屋的危機。

長久以來，社會普遍認爲自由市場是提供房屋的最佳方式，然而也正是自由市場炒熱房地產、吹漲房租、迫遷窮人以期翻新公寓，導致大批無住屋者的社會問題。

目前在波士頓及舊金山正進行一項實驗，謀利的建築商必須提出其建築計畫對一般房屋市場的影響，然後根據這個評估來決定加蓋某百分比的一般房屋，或付一筆遷家費給迫遷居民。總之，有識之士已認識到經濟發展如果不受社區居民的監督，則其自由發展所帶來的利益，就只能嘉惠少數的富人，而不能爲大眾普遍分享。

“晶片大戰”的 6種神話

■汪天莉

三月底，雷根政府爲了對抗日本半導體矽片傾銷美國，訂立制裁條例時，顯示了政治又一次戰勝了經濟。日本在商場上的勝利是此制裁最重要的原因，但這次制裁真正的獲利者可能是雷根政府及少數電腦公司，美國高科技的經濟不見得會因此好轉。

美國在半導體的設計， 軟體上仍領先

有關這次制裁的前因後果，有六個神話值得分析：

第一個神話：日本主導了半導體及電腦工業。

其事實是：日本公司在大量製造技術上是主導的。而美國公司則領先於設計、軟體及服務部門。根據 *Datamation* 雜誌指出，在全世界排名前10位的電腦公司中，日本僅佔二位。並且，1985年全國總收入，日本的全國總值小於190億，而美國的IBM一家公司就有490億。

第二個神話：今天的高科技競賽主要是二個國家間的競賽——日本對抗美國。

其事實是：在美國大多數領先的晶片及電腦公司或多或少都和日本公司有緊密的合作關係，他們彼此交換科技、合作計畫及銷售日製產品。事實上，是這些跨國公司彼此互相對抗。

第三個神話：日本的高科技專家要對今天在美國被裁員的成千上萬的工人負責。

其事實是：高科技工業在美國正

面臨著周期性的不景氣，製造商一直在想辦法以最少的工人數製造出最有威力的晶片及電腦，這使得市場必須迅速成長來維持就業數目，但這目標並沒有達到。而事實上，日本公司也面臨同樣的經濟萎縮。去年日本半導體工業虧損了15億，且據報導在過去向稱不裁員的日本，也已裁去了百分之十五的永久僱員。

第四個神話：日本半導體製造商有傾銷的行爲。

其事實是：根據美國商業部發出的片面報導指出，日本公司以低於成本出售若干類記憶晶片。其實是日本公司比美國公司有遠見，他們賺取利潤完全是看長期的交易，而不是只看眼前的利潤是否足夠其固定資本的支出。

美國應該重訂 高科技發展政策

第五個神話：日本半導體製造商違反了去年的交易協定。

其事實是：日本遵守了此協定最重要的條款，他們已提高了在美國的售價。這其實是使日本在日元升值後更大賺其錢。

第六個神話：日本政府補助高科技工業，但美國政府則不。

其事實是：由於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在軍事及太空研究計畫及採購合約中，已使美國在半導體及電腦工業中領先日本。只有最近，日本政府才補助半導體工業，但過去五角大廈一直是商業電腦工業的大力支持者。





這些神話之來源為何？

在過去10年裡，美國半導體電腦業者對日本一直是怨聲載道。但這些「美國」公司的利益並不代表全體美國人或是美國經濟。在日本努力發展廉價晶片製造技術時，美國的半導體製造商却長期自滿於海外天堂裡眾多的廉價工人，而不發展技術。

在美國，大型的電腦及通訊製造業者都以自行生產（in-house production）方式來供應增加中

的半導體之需求，只有小規模的電腦公司在晶片設計科技的邊緣上掙扎，現今高科技的發展已不再在晶片上，而是在發明新電腦及使用電腦的軟體上，美國現在應該掙脫虛假的日本神話，不要只注重少數晶片製造商的需求，而應設法製訂一個以美國工人，消費者及廣大電腦公司的利益為主的高科技發展政策。

（取材自The Daily Californian，4月20日，1987）

智利的「自力救濟」運動

基金會典藏 ■ 陳智中

台灣最近一兩年內突然出現大量的「自力救濟」事件，從接管倒閉工廠到抗拒環境污染無所不包。在台灣這種法治及溝通管道極不健全的社會裡，自力救濟之大量出現是勢所必然的。

自力救濟是 民衆爭取資源的手段

其實在第三世界，由於資源稀少，國家機構被少數人把持，自力救濟從來就是民衆爭取資源的手段。其中以被人稱為「進度動員」的智利，其自力救濟規模最為可觀。從60年代起，土地入侵運動（squatters' movement，民衆侵佔公有或私有空地

搭建住屋的運動）就成為政治勢力爭奪的主要地盤。幾乎所有的入侵事件都有政黨勢力介入。在傾民衆的阿葉德上台前夕（1970），全智利就有220件入侵事件（相較於1968年8件，1969年23件）；他就任總統的第一年（1971），有560件入侵運動。在土地及營造業被右派控制，加上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制裁的當時，這些自力救濟行為解決了很多民衆的生存問題。

在長期的鬥爭下，智利地方社區（campamentos）有強烈的政治意識。他們遊行示威，佔領地方政府及醫院，來要求更好的服務。1972年右派勢力全面反撲阿葉德左翼政權



，發動卡車司機大罷工時，社區組織有效的組成了鄉村到城市的全國供應網，自行分配食物和消費品，使右派無法完全得逞。

1973年阿葉德被殺後，社區組織遭到軍政府嚴厲的鎮壓及屠殺，沈寂了一陣子，最近才又活躍起來。今年四月教宗訪問智利，左翼社區組織試圖藉機擴大動員。四百多戶無家可歸的人在聖地牙哥入侵了一塊空地，把它稱為「教宗保羅二世的營地」，當警察企圖驅除他們時殺死了一個居民。教宗在聖地牙哥舉行全國性彌撒時，人權示威者一面高唱「教宗我們不是反對您」一面衝進會場，軍警當場投擲催淚彈，彌撒中止，使獨裁者皮諾奇下不了台。

民衆組織社區動員

在這些表面事件之後，真正重要的是社區組織經常性的動員。他們有嚴密的組織，稱自己的社區為「小智利」，並視軍警部隊為「外國敵軍」；他們有情報站，收集情報來檢舉軍警派出的內奸；當軍政府任派市長時

，他們選舉自己的領袖與之抗衡；社區內的婦女負責分配為控制民生必需品的來源和價格，並收容老人和無家可歸的流民。他們甚至有自己的「軍隊」；面對第三世界武器最精良的軍事政權之一，他們只有用內胎作成的大彈弓。他們在軍隊入侵社區搜捕反對者時，會動員起來，像發動內戰一般，儲備糧食，挖掘壕溝。在溝裡焚燒廢輪胎，並設置有鐵釘的障礙；鄰近大學的學生會趕來組成醫療隊，支援社區抗戰。這些手無寸鐵（只有石塊及彈弓）的「軍隊」，以濕布蒙面，用油塗在皮膚上來防止瓦斯，和有權任意開火的裝甲車對抗，通常他們無法獲勝，他們會化整為零，消失於鄰近的街道及社區裡；用小孩、口哨及電話來傳遞訊息，準備再次發動這種不可能的戰爭。

智利的「自力救濟」運動，從一般的政治程序進入絕望的掙扎，顯示出了由少數人操縱的國家機器不可能滿足民衆的需要，此時唯有自力救濟才能表現人民的力量。（取材自 Guardian, April 1987）

● 智利的民衆與皮諾奇的軍警衝突

◎經 濟◎

剖析台灣的 民營壟斷資本 (上)

——一個初步的考察

■李榮武



●王永慶的台塑企業是排名第一的民營壟斷資本

台灣工人階級的定位，大眾消費社會的形成，以及壟斷資本①的鞏固，是八十年代相當重要的社會經濟現象。事實上，這三者乃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同時湧現，並互相作用下之產物。無數的中小企業被整合在少數壟斷企業（官營及民營）所型構的生產系統內，創造出大量的工業後備軍——勞動階級，而成為大眾消費社會的骨幹。至於消費的型態及產品，亦是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制約。依此，本文即將對台灣民營壟斷資本的形成，剩餘利潤創造的環境，以及其社會型構，作一初步的考察。

台灣壟斷資本的規模

雖然大部分的原料上游及基礎工業都被控制在國民黨的國家官僚資本手中，台灣民營壟斷資本的積聚和集中化依然甚為迅速。1980年，十大民營壟斷財團的總營收額就占國民生產毛額（GNP）

的16%，單台塑就占4%，國泰1.3%②。1981年，前一百名大企業的營收總額，就占當年GNP的50%，前五百名占73.3%③。1985年，雖然公營大企業的營業額巨幅下降，前1000名企業的總營收額還是占GNP的68%④。如果以個別產業而言，有些壟斷趨勢更為強烈，如汽車、水泥、塑膠、人纖業等等。到了1986年，台灣96個民間企業集團的總資產額為7899億（國營企業為3兆763億台幣）。

一、美援與政府扶植

四十年來台灣企業資本的擴充，可以說是以集權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為基礎而展開的。國家統御，主宰著重要的資本累積功能，從生產到分配。不像

註①：本文的壟斷資本，包括獨占與寡占，或聯合獨占，亦即資本的大量積聚（concentration）和集中化（centralization）。台灣的外資企業不為本文討論之重點，而有關國家官僚壟斷資本的研究，請見鍾望如“官僚壟斷資本—國民黨統治台灣的經濟基礎”台灣思潮（洛杉磯）第七、八期，1983年5月，1984年4月

註②：天下雜誌，1981年11月1日。十大集團指台塑、國泰、裕隆、台南紡織、大同、遠東、辜氏、新光、太平洋、趙氏集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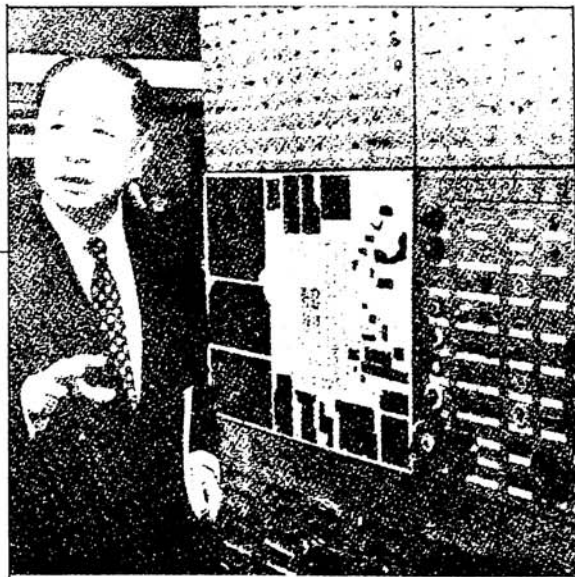
註③：天下雜誌，1982年9月1日，包括公、民營企業。

註④：天下雜誌，1986年8月1日，包括公、民營企業。

- 林挺生的大同公司，是與日本NEC電氣合作的所謂「國貨」

歐美企業，自十九世紀中葉從競爭式資本主義，經由縱向整合（自原料、生產到行銷的企業併合、結合）、橫向連合（併吞平行或競爭企業），再經歷兩次大戰的急速資本擴張，而達今天的壟斷規模。國家的干預當然也有，但相對起來，是少而且民主些。國民黨的干預，當然和在大陸的挫敗，以及來台最初幾年（1946～49年）的經濟混亂有關，然而，美元的存在，提供了其直接干預的本錢。自1951至1963年間，美援平均額，就占總投資毛額的34%，有了足夠的外匯來購買必要的機器和設備以安排各種經建措施。十三年的十億五千萬美元援助中，80%用在公共（政府）層面上，主要是修築公路、水庫、通訊、發電等日據時代留下，資本主義改造的基層設施，如台鐵、台電、港務局、松山機場和南北一號公路。另外20%則放在私人企業上，如肥料、船運、水泥、鋁、紙及紙漿、塑膠、玻璃、糖、化學品、煤和焦炭、合成纖維和藥品工業，以及貿易和服務業。因之，即使在這段政治不穩定時期，私人企業投資額也達1353百萬美元，高於公共投資額的1253百萬美元^⑤。

資本問題解決之同時，政府又再以關稅保護、進口配額、津貼及自製率的規定，減少進口，實施進口取代政策。早在1951年，便管制紗布及紡織品進口，由生管會從美援得到棉花，分配給廠商「代紡代織」，織好后，政府付工錢，收回棉布，又替大企業解決生產資料及交換流通（市場）問題。紡織業的產值，1951至1963年間，因而增加5.7倍。



壟斷資本發生危機，政府必須出面重整

紡織業這種超經濟方式的原始資本積累過程，蓄存了大量的剩餘利潤，得以往其他行業發展。壟斷企業集團如台南幫、裕隆台元集團、六和紡織、遠東集團都是由紡織起家，發展到食品、水泥、汽車、石化等產業。負責這些投資計畫的經濟安定委員會也「總是事先出錢出力，確保計畫、資金、設備和市場潛力都沒問題，再轉手給民間企業」。^⑥

電子工業的發展，也是經合會在60年代，請美國專家設計十年發展計畫，引進外資，如通用、德州儀器、RCA及菲利浦。在關稅壁壘下，幾家大電子廠，也得以內銷謀暴利，甚至外銷。大同、聲寶、東元、松下都是。

即使目前熱門的尖端資訊業，政府也是鼓勵成立大企業，如經濟部韋永寧所說：「政府激發民間活力推動大企業的手法，透過選擇性的融資、稅捐獎勵，技術管理的輔導，或由政府參與投資，誘導

註⑤：N. H. Jacoby “U. S. Aid to Taiwan” Praeger 1967, P. 175 & 190。

註⑥：天下雜誌，1984年11月1日，P. 16。

民間投資領先產業。」^⑦工技院就是這樣成立的。在各種尖端科技的研究發展，如積體電路、機械人、微型電腦系統，預定 1984 至 1990 年間，就要花費台幣 24 億^⑧。

壟斷資本發生危機，政府也必須出面重整。如 1977 年的華隆、國華聯合耐隆、鑫新及寶成五家人織業的合併，以及國信、國泰及僑信的倒帳。

政府力量對產業的干預，何以會特別鍾愛或助長大資本的形成呢？本來，在資本主義所謂的自由經濟體制內，不管政府有沒有直接的干預和集中，資本的積聚和集中，是必然的趨勢。在利潤的誘導下，應用權勢、關係，甚至透過金融財團的運作、殘殺、併吞對手，都是企業「成功」之道。但是在集權式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內，政府超經濟力量的介入，控制著資源的分配，更能鞏固特權、大資本，以強化其利益統治。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愈是受到官制扶植的產業，其資本壟斷趨勢愈是強烈。

汽車、紡織、水泥、塑膠、食品以及現在的電腦業都是。像機械工業（指傳統機械）較少受政府干預，壟斷性就較不兩極化。今天中小企業之所以能貢獻出口值的 70% 數額，且依此為生，原因之一是，外銷環境中政府干預培植的壟斷資本甚少之故。

二、對先進國金融及工業資本的依賴

從上述美元的滲入，國家官僚資本與民營壟斷大企業與國外（主要是美國、日本）金融及工業資本的連結是很自然的^⑨。國外銀行提供資本貸款，工業集團藉著直接投資，製造許可證及生產合作或產品代理，把台灣整合入全球的資本主義市場國際勞力分工體系內。這個關係，我們只要看下面代表性的 25 家集團企業的結構略表即可明瞭：



台灣二十大壟斷集團略表

集團名稱	營業內容	份子企業	1985年排名	與國外合作或合資廠商或貸款銀行
台 塑	塑膠、 人織、 紡織、 成衣、 合板、	南亞塑膠	1	日本旭化成株式會社
		台灣塑膠	3	西德 OPP I 公司
		台灣化纖	4	Chase Manhattan Bank
		朝陽木業	63	Bank of America
		台旭纖維	146	

註^⑦：海外中國時報，1984 年 10 月 20 日，章永寧語。

註^⑧：海外世界日報，1984 年 10 月 2 日。

註^⑨：民營大企業與日本技術合作或合股者比美國多，與國家官僚資本大部份和美國連結大異其趣。這似乎部份是特定的殖民歷史因素形成的。

	機械、醫院	新茂木業 育志工業 台麗成衣 長庚醫院	182 584	
大同	電工器材、通訊、電腦、油漆、機械	台灣通訊 福華電子 大同電子 大同壓鑄 中央電腦 大同中文電腦 尙志精機 台灣亞格科技 尙志造漆 大同貴金屬 大康公司 大同水晶 大威機電	131 2 256	日本NEC電氣 日本ALPS 日本東芝 日商三井金屬 日商昭和貿易 日本精機 美商亞格科技 美商PPG工業公司 日商中外貴金屬 美商Conair公司 日商東京電波 美商西屋電氣, OTIS 美商ITT
遠東	紡織、人纖、成衣、染整、水泥、百貨	遠東紡織 亞洲水泥 遠東百貨 東方人纖 亞東百貨	5 17 14*	CLUETTEPEABODA & C BVD Co., Inc. Manhattan Shirts Joseph Bancroft & Sons Co. Jontzen (以上均美商) 瑞士 Inventa 公司
裕隆	汽車紡織金屬製品	裕隆汽車 台元紡織 中華汽車 台文針織 中華台亞	6 23 288	日本日產自動車株式會社 日本三菱自動車 日本發條株式會社 西德史可樂特機公司 日本關東精器 美國台亞 (DANA CORP) 美國Blue-Bell

台灣水泥 (辜氏集團)	水泥、通運、倉儲、機械、金融、橡膠	台泥 台灣士敏土工程 台灣通運倉儲 光和耐火 中國信託 中國租賃 中國人壽 中國合成橡膠 輝慶工業 高冠企業 福聚	11 195 159* 65* 50* 164 38	主要繼承日據時代設備 該公司在印尼、菲律賓、巴拿馬有技術合作。 光和耐火與日本品川白煉瓦公司合作。
台南紡織	人纖、建築、租賃、電機、國貿、半導體、食品零售、水泥	統一企業 環球水泥 台南紡織 南聯貿易 坤慶紡織 太子建設 可口企業 國際紡織 世代化學 三新紡織 統一實業 新興紡織 統一租賃 統一工業 南允紡織 太子纖維 統一製衣 台灣針織 統一糖菓	7 27 311 159 191 89* 587	日本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 日本大和襪衣 日本丸紅、敷島紡績、東洋麗絨 G S 日本電池 日本日清製油 明治乳業 山崎株式會社 美國貝道明公司 美國 General Food 公司 美國 Pepsics 公司
聲寶	電工器材、進出口	聲寶 茂慶 智寶 新力	13 48	日商佳寶 (sharp) 美國 R C A 美國杜比專利研究所 日本新力公司
東元電機	金屬製品、電工器材	東培工業 東元電機 台安電機	14 387	日本三菱電機 日本 N E C 日本安川電機 日商 N T N 東洋軸承 日商岩井

趙氏企業	塑膠、玩具、小馬達	華夏海灣塑膠 亞洲聚合 華淵電機 台達化學 美寧工業 華玉工業 友寧工業	26 80 86 70 262 367	美國海灣石油公司 美國MOBIL 石油公司 美國MATTEL 日商兒玉化學工業 日本東麗工程 日本兼松江商株式會社 日本馬淵馬達 日本窒素公司
奇美	塑膠、進出口、冷凍食品	奇美實業 奇美樹脂 佳美貿易 奇美冷凍 保利化學	15 728 79* 446	日本三菱商事、三菱油化 香港優克公司 大日本油墨株式會社 日本山陽化工 日本中央理化株式會社 美國Plaskolite Inc.
新光	人纖、紡織、產物保險、人壽保險百貨	新光實業 新光紡織 王田紡織 新光產險 新光壽險 大台北瓦斯 新光合纖 新光百貨	399 45 19* 71 21 65*	日本東麗株式會社 日本三菱レーヨン株式會社 資麗娜株式會社 日本綜合警備保障株式會社 日本三越百貨
太平洋電線電纜	電線、電纜、營建	太平洋電線電纜 華新麗華電線電纜 太平洋建設 亞力電機	28 33 366	日本住友、美國非利浦、通奇公司 美國銅精煉、西爾電氣、南電 美國優越電纜公司 Siemens Allis Aichi
三陽許金德	交通工具、水產、電工、倉儲、橡膠	三陽工業 豐群水產 士林電機 新竹貨運 南港輪胎 台灣電容器 福成電子 台灣工礦公司	9 83 73 660	日本本田技研工業會社 政府接受日本在台工礦企業組成 日本三菱電機 美國通用電氣、RT公司 日本橫濱護膜會社 日本電容器、守谷商會、三誠商會 丸興工業株式會社 日本日清紡織、USUI會社

寶通	植物油 飼料、 造紙	大成長城 寶祥實業 寶隆紙業 寶島針織	382	日商兼松江商株式會社
東帝士	棉紡、 染整、 人織	東和紡織 東豐印染 東雲紡織 東盟纖維 東雲 東資服裝 振福服裝 東峰重機	32	日本神田工業會社 高田工業會社
六和紡織	紡織、 汽車	六和紡織 九和汽車	44*	美國華納公司及克寧公司 Clark Equipment Co. 澳商 Cheviot Australia Pty
永豐	造紙、 罐頭、 食品、 機械	永豐餘造紙 永豐原造紙 永豐紙業 台東興業 永豐工業 新台灣農機 台灣理研工業 聚業電腦	20 111 765	日本三井物產會社 日本理研ピストンリンク工業 日本久保田 日本住友電氣 日本川崎重工業 西德 日本 Iwaki Co. 日本 Chugai 藥品 日本 C A C 電腦公司 日本合日酒精會社 Copetch 日本合日酒精會社
中國力霸	水泥、 金屬、 麵粉、 植物油	中國力霸 嘉新麵粉	18 24	瑞士 B B R 公司 日本輕金屬會社 法國克洛索羅爾集團子公司國際 品格利公司
洪建全	電工器 材投資	台灣松下 建弘電子 建弘國際信託 洪建全文教基金會 國際電化商品	8 21*	日本 panasonic 持有 60% 股份

資料來源：1. 百大企業 1983 年中華徵信所。

2. 林智新“十大企業集團分析”天下雜誌 1981 年 11 月 1 日。

3. 排名係指民營企業排名，中華民國經濟年鑑，有*者乃是天下雜誌 1986 年 9 月 1 日 300 大服務業公司排名。
未列名次者乃因資料不足之故。

註：本略表只在顯示集團成員及與國際資本的關係，無法保證資料的完整，亦不表示台灣只有此 20 集團。

洪建全乃筆者根據經濟雜誌 1986 年 11 月 1 日 慶慶江“洪建全的身後事”編成。

● 電子工業：台灣勞力密集工業的代表



雖然美、日兩國在台的直接投資額不大（1952～1984年，美國投資22.5億美元，台僑外資43.2%，分布於電子、化學、金融及保險業。日本14.7億，占28.2%，主要在電子、金屬處理及化學業上），且由於保險政策，都投資於第二、第三級部類（輕工業及服務業），但跨國資本（即使不在台灣）却直接或間接控制整個生產活動，從原料、零件的供應，到生產設備和機器的提供（第一級部類、鋼鐵、電力、石化、運輸設備、水泥、機械）、市場的行銷、價格的制定，都受到跨國公司的主宰。1979年美國國務卿范錫提交國會的一份報告書指出，台灣的進出口約有70%是由外國貿易商或製造商經營^⑩。根據台大經研所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台灣大廠商和先進工業國的技術合作，大部分得不償失。美日歐中以日本最差，美國次之，歐洲較好。1980年，在技術合作名義下外銷到日本的輸出值才2億美元，但是日本提供原料、零件和設備之自日輸入值竟高達36億美元。反而，出口廠商有94%是非技術合作者。至於有些所謂台灣第一的產品：女鞋、小馬達、縫紉機，其行銷則幾乎為日本人掌握。

由於外銷需求的千變萬化，廠商的設備更新（包括研究發展）必須相當頻繁，這是沒有自主生命的台灣壟斷企業所不敢嘗試的（雖然大電子、紡織公司也部分外銷，但那是「以內銷（利潤）培養外銷」而成的。只有由固定資本少的中小企業來擔當。低的有機資本構成下^⑪，也只能生產非耐久性

的消費產品，大部分則由外資外銷廠來作（其資本設備、研究發展多在母國完成）。

台灣的經濟發展，強烈依賴美、日

或許有人認為，雖然台灣的國家官僚及壟斷資本都對國際金融及工業資本有強烈的依賴性，但是這幾年來台灣經濟不也是迅速成長，產品的技術層次愈來愈高嗎？例如資訊產品出口值在86年產值高達21億多美元，為世界第七大資訊產品國。這個問題，筆者有幾點分析：

一、台灣經濟的成長，主要是在國際勞力分工體系內，跟隨著以美國為主的西方資本主義戰後的繁榮。然而，自80年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面臨結構性的停滯，也沖擊台灣。1985年，前十大企業有五家營業衰敗，前五百名大企業營收減少1.69%。200大服務業公司也有70家成長為負數^⑫。

1986年也不甚樂觀，美國前500名各大企業中有三分之一銷售值比85年低，營收成長率為負5%，淨利也下降6.7%^⑬。這種持續的不景氣以前就

註⑩：經濟日報，1979年7月25日。

註⑪：有機資本構成是指一企業固定資本（生產資料的價值）與變動資本（勞動力的價值）之比，有機構成愈高，表示愈省勞力，生產力愈高。

註⑫：天下雜誌，1986年8、9月號。天下雜誌的統計是包括公營企業。

註⑬：Fortune，1987年4月27日。

● 出口貿易是台灣經濟的命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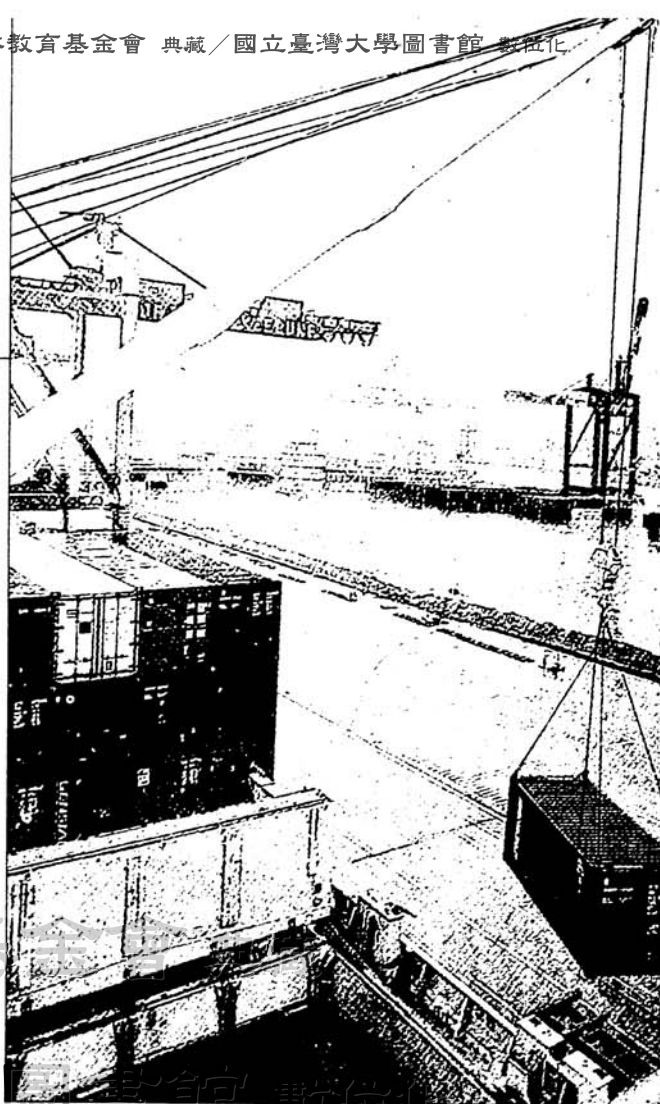
發生。根據 1986 年中華民國經濟年鑑指出，1983 年為谷底的不景氣，時間相當長，主要係民間投資意願低落導致國內需求不振所致，顯現出結構性問題，而非像一九七五年石油危機的外來沖擊所致。

近十年來，台灣的進口貨品中，資本設備才占總進口值的 24% 左右，而農工原料高達 68%，資本設備的成長率（固定資本形成成長率亦然）一直低於 GNP 的成長率，出口工業技術密集程度者只占總值 25% 左右，可見台灣的工業主要是賴原料及零件的加工裝配製造，固定在國際勞力分工的某一層次上。雖然資訊工業產品名列世界第七，但總產值才占世界市場的 1.45%（可見尖端科技在資本主義市場分配的不平均），而且大部份集中在監視器、終端機、家用電腦、數據機等量產、成熟技術產品上。其出口的擴充主要得力於西方工業國七十年代末期以來金融資本膨脹，對數據處理機器需求增大所致。一九八五年美國資訊市場不景氣，我們的外銷金額即自 141% 的成長率跌至 21%^⑭。

台灣的生產結構是 一種「環節脫落」的結構

我們的技術，是外銷產品的技術，是外向的，不是國內需求的技術。為世界市場的生產，被整合入的重心是資本主義核心國，而不是自己國，當核心國消費者對產品失掉興趣時，我們即陷入凝滯，由於生產是外向，各個生產單位散置不太互相高度整合。在這種種「環節脫落」的結構裡，即使某

種經濟有機體的進步，也不存在有聚合性的機制，以繁衍到整個體制。科技計劃是外向的，不是在解決國內的問題，資訊電子業並無法對其他產業造成「次級效應」（Secondary effect），却是我們的策略性工業，原因是有外銷市場。雖然我們也有重化工業，且與輕工業比值为 54:46，但其技術也是外引的。相對的，台灣本土資源的利用，防治與評鑑毒害，甚至中醫中藥，農業技術，政府的經費却撥得非常少。



註⑭：中華民國經濟年鑑（以下簡稱經濟年鑑），1986 年 P. 511。經濟日報社印。

本
資
是
層
直
這
體
繁
結
業
9
有
以
就
一
表

- 徐有庠的遠東集團與外國資本進一步合作，圖左是徐有庠的兒子徐旭東。



上面討論的是台灣壟斷的資本，生產力來源，另外更重要的是觀察其產生剩餘的吸收^⑮，或其產品及服務的出路，使資本的累積得以像滾雪球一般，愈滾愈大。這方面得力於貨品及勞務的輸出，政府消費和民間消費的高速膨脹。

一、寄生在出口導向經濟上

台灣出口導向工業的急速發展過程，早已是許多政治經濟學者研究的對象。到了一九八五年，工業產品已占出口的98.5%，占GNP的50%左右。總出口值占GNP的52%左右。

一九七九與一九八〇年，台灣民間十大企業集團的外銷總額（直接外銷與合作外銷，後者指原料產品賣給下游加工後由下游廠商加工出口）就占台灣當年外銷總值的11.6%與11.2%，單台塑集團就占5~6%，遠東集團1.3%^⑯，外資廠商占外銷比重甚大，十大外銷商中外商有五家。一九八二年，一百大外銷商中，外商有41家，占總值之47.6%^⑰，即以一九八五年出口值超過八億美元的十大產品而言（占出口總值69.3%），有電子產品、紡織品、鞋（尤其塑膠鞋）、紗布、金屬製品（五金）、玩具、塑膠製品、運輸工具（汽車零件、自行車）、製材合板及家俱木製品，以及機械（主要是塑膠機械及織布機），其原料或零件，或產品本身，或行銷，却為壟斷企業所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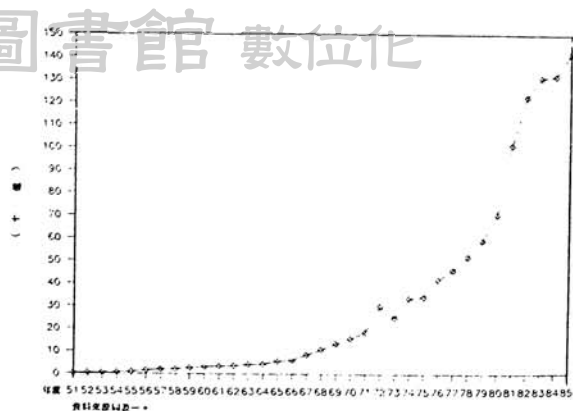
政府以壟斷資本所精心策劃的出口導向政策，已經把整個台灣的生產、服務業及上層建築（教育、法律、文化）整合於國際貿易活動中。貨品及勞務

的輸出數額，如表一所示，在這三十四年來，幾乎呈指數增加，八五年為五一年的104倍。其成長情況大概可以七十年代中期為分界，該期以後的增加量最為驚人。七五年至八五年（十年）間增加將近一〇、五〇〇億，而五一至七五年（二十五年）間才增加二、二〇〇億。事實上，五一到六六年出口85%是以糖、農產品為主，其後幾年大部份是簡單加工出口時期，而近十年來的量變產生質變，其產品的變化是製造複雜度及塑膠成份的增多。甚至在一九八三年，盤占第一位的紡織出口已被電子趕過。

二、政府消費

表二顯示同期政府國防及一般行政之外，在司

表二 扣除一般行政費與國際費用後之政府消費額



註^⑮：Paul Baran & P.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Monthly Review 1966, Chapter 4-7。

註^⑯：天下雜誌，1981年11月1日。

註^⑰：天下雜誌，1983年11月1日。



●政府興建交通運輸設備，
成為資本主義最基本的催化劑

主義的愈加深化，社會（即老百姓納稅錢）的負擔成本也更龐大。雖然七三至八四年間，政府總支出才增加 4.5 倍，但其中社會與救濟增加為 12 倍，交通運輸 11.1 倍，公共衛生 10.8 倍，教育及研究 9.0 倍，這在在表示，資本主義社會必然存在的貧窮與不幸，已不能再被忽視，政府必須出面協助與安撫，交通運輸則是資本主義最基本的催化劑，是優先與重要的推動目標；而工業化所造成的環境污染與毒害，亦使得公共衛生的維持費愈來愈多，現在是付成本的時候，如整治大台北都會區的河川，就要用 800 億台幣，甚至有人估計台灣的污染防治，可達 4,000 億台幣市場¹⁹；教育與研究則是政府發展尖端科技，扶植大企業帶動「工業升級」所需，其投資也是十億百億，像擬議中的久大資訊系統，就要 1,000 億，這個層面，在今後三年內，更要從目前中央總預算的 13%，提升到 15%，由於資源分配的不公平，這個費用只要強化既有企業資本規模的不平均。另一個效果是，替資本家分擔員工訓練的成本，使得勞動者的擴大再生產易於維持在一低的工資水平，提高資本家的剩餘利潤。

所有的公共開支，都不是算在商品生產的價值規律內的。自八十年起，保守的政府收支已呈現赤字，從該年的負 53 億急增至 83 年的負 594 億²⁰，三年內增加為十多倍，必須注意的是，同期民營企業資本形成却呈凝滯狀態。八十年為 1,067 億，八一年為 1,811 億，八二年 1,678 億，八三年 1,782 億。而在工業，國營工業占工業生產總值的比例，

法警察、教育及研究、公共衛生、社會及救濟、經濟建設及交通運輸及其他方面開支。其成長速度情況與表一類似。七十年代中期政府進行十大建設，最近亦有十四項建設¹⁸。前者的完成，可以說是台灣壟斷資本主義的鞏固，基層設施的建立（尤其運輸），使得台灣出口導向的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飛躍進行。政府支出（公共投資）的增加，也是工業和金融資本集中化最有力的表示。公共工程或業務的承包和轉包具有選擇性，只有具特殊政治或經濟關係者才可能取得。而轉包的連鎖及連結關係，以及龐大的承包利潤，都是壟斷資本用來整合或多角化其經營的主要財源。

推動及配合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深化，政府官僚體制的膨脹更為迅速。七三至八四年，政府雇員薪資增加 6.1 倍，同期國民生產毛額才增加 5.6 倍，反映出出口市場競爭的日益複雜、激烈，以及一種新的社會消費模式的發展，都必須有集體的、公共的服務來配合。在支出內容上，呈現出，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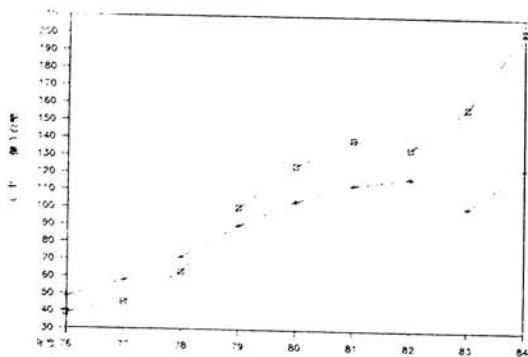
註¹⁸：藉着國內公共投資，十大建設稍為抵擋了第一次石油危機的不景氣。今日十四項建設亦有同樣功能，但却有人說成是消化五六百億的外匯存底。

註¹⁹：紐約世界日報 1987 年 3 月 24 日，4,000 億應為保守估計。

註²⁰：中華民國統計月報，1984 年 2 月，P. 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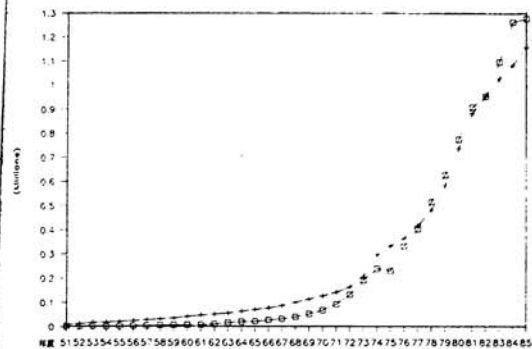
表三 非電子業僑外資內外銷統計

□ 表內銷
+ 表外銷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經濟年鑑，1984、1986 年版，經濟日報印

表一 □ 表貨品及勞務的輸出額
+ 表民間消費額萬億



資料來源：1. 1959 年以前 S. HO,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60-1970" Yale Univ Press 1978 表 A3。

2. 1959-1976,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R.O.C 1984 行政院主計處。

3. 1976 年以後，中華民國經濟年鑑 1986 年，經濟日報編印。

。在家庭開支的內容上，食品費的支出，自 64 年消費總額的 51.78% 降到七五年的 44.1%，八四年更降為 32.2%。同時居住費則自六四年的 20.62% 增至七一年的 22.9%，七九年的 25.32%，交通費則自六四年的 2% 增至七五年的 3.43%，以及八五年的 5.95%，同期育樂費則以 4.73%、8.44%、14.38% 依次上升。可以說，台灣已經進入一個「大眾（大量）消費社會」。

民間消費力量的龐大，早已是國際壟斷資本垂涎的市場（尤其是目前生產競爭力低落，其國內市場備受蠶食而急找出路的美國企業），自七九年開始，便以各種手段（甚至是政治的，如台灣關係法）來台投資生產（主要內銷，此已與六〇年代來生產外銷不同）或行銷。如表三所示，非電子類的僑外資內銷額在七九年已超過外銷額。配合着八十年代國際新保守主義者對國家機器的抨擊（如美國的 deregulation 英國的 privatisation）²³，台灣的自由化，國際化呼聲就是在這種國內外格局下喊出的²⁴。即使電子工業，最近美商亦正揚帆出

發，因為如半導體記憶體的亞洲市場，台灣就占 40%，電腦亦大有可為，最近也有人進口超級電腦。外商銀行在八五年就有 32 家，資產額 114 億台幣（本國銀行資產 21,275 億）。菸酒壁壘已破，最近亦將開放證券、股票、保險、百貨、食品、農產品，八七年初甚至降低 1700 種民生用品關稅，這些產品大約占去年總進口值的 37%。事實上，消費品輸入占總進口值的比愈來愈大，自七十三年 5.6% 升到八五年的 8.5%，外資企業自外銷轉為內銷，反映出八十年代經濟危機下台灣壟斷資本的結構再重整，再次與國際資本更進一層結合，不再是從前的技術合作，而是以更多的合股、行銷合作來瓜分豐盛的台灣市場。

綜上所述，台灣的民營壟斷資本，在美元與政府的扶植下，與國際金融及工業資本緊密結合，透過出口導向工業，政府及民間消費的哺育而得以茁壯成長。因而社會、政府及國際特定的環境塑造了台灣的壟斷資本。相對的，壟斷資本的形成和發展也回過頭來型構了台灣社會秩序。

註²³：Reg Whitaker, "Neo-conservatism and the State" Socialist Register P. 1。

註²⁴：自由化和國際化對不同的團體有各種不同的意義和利益。對國際資本、國內壟斷資本、中小企業和普通老百姓，自由化和國際化都代表着不同的期待和衝突。

註²⁵：經濟年鑑，1986 年，P. 641。

進 天盼，夜夜盼，我們含著眼淚盼望；盼望有一天能回到故鄉，回到那生長的地方，能再擁抱我們的妻兒、爹娘！！』（以上錄自四月十六日民衆日報刊登署名高雄市退伍軍人，退休公教的投書）

由於海峽兩岸嚴厲的禁制，四十年來，多少人把刻骨銘心的想家思親念頭，壓抑在內心最深處。如果中國大陸之門仍舊閉鎖，錯在中共。但隨著時勢的演變，潮流的進展，世界上所有分裂的國家都在「對話」，至少讓破碎的家庭，離散的骨肉能夠會面、團聚。中共也抵擋不住這人性的趨向而開放大陸，這原是我百萬由大陸來台的各省同胞返鄉探親，重敘天倫的大好機會。但是，一向辱罵中共為「泯滅人性的匪黨」宣揚自己是「永遠與民衆站在一起」、「實行三民主義——倫理、民主、科學『仁政』」的國民黨領導階層，他們無視於報章雜誌的呼籲，無視於海內學者的大聲疾呼，也無視於包括國民黨籍在內的國會民意代表義正詞嚴的質詢，更無視於廣大群眾心中人道的吶喊，仍舊禁令高懸、刑具高掛。

面對洶湧澎湃的民意，國民黨領導階層，永遠只有那兩句話：

「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防止被中共利用、滲透！」

國民黨真的不與中共接觸嗎？那麼華航的飛機是怎樣要回來的？台灣男女籃球隊在亞洲杯會跟什麼球隊比賽？戴笠的棺材從什麼地方運回台灣來的？

●南北韓國土分裂下，離散數十年的母子終得重聚，不禁喜極而泣，抱頭痛哭。



沈默了四十年的大眾 該團結起來站出來講話

開放大陸探親真的會被中共利用、滲透嗎？國民黨四十年來對我們的「思想教育」，真的那樣不管用？台灣真的比大陸差，還是國民黨政權比中共政權腐敗？而使回大陸探親的人數週之內改變立場認同中共？

國民黨寧願為一架飛機、一個球隊、一個特務頭子的屍體與中共來往、會談、妥協，卻不顧數百萬人心底想家探親的願望。俞國華在立法院答覆質詢時說：「現階段不開放大陸省親政策，國人必能諒解、支持」。

各位鄉親：你我已為國民黨耗盡了寶貴的青春，現在已到人生的最後一段路程，現在尚有一點體力，不趕快圓一圓這人倫大夢，什麼「階段」才可以呀！他們又將騙我們到幾時？我們還有多少日子可以等待？

眼看國民黨的高官、學人、有錢的富豪、有辦法、有關係的人如歌星、藝人，他們隨心所欲進出大陸探親旅遊（據中共發表的統計每年有六千多人次），並將他們的照片、文章在台灣的報紙發表，我們大多數退伍軍人、榮民、公教人員，仍遭受百般刁難、恐嚇。這樣的政黨我們能支持嗎？

他們的父親未死之前每年「祝壽」，死了之後每年「謁陵」，還要搞什麼「教忠」、「教孝」要學生寫心得、出壁報，難道我們沒有父母？而我們的父母是生是死，卻不得而知。我們只要求，「生」讓我們回去奉上一杯茶，「死」則讓我們回去獻上一柱香，這難道不是人情義理的最起碼要求嗎？鄉親們：

我們本是沈默的大眾，我們已沈默了四十年，現在，該是我們大家團結起來，站出來講話的時候了，很多人在為我們講話，我們自己也應該站出來、講出來，為了我們在大陸的親人，為了我們心底的委屈，讓我們共同努力，一齊奮鬥。

◎社會檔案◎

這是誰的錯？

——十天來的回顧與沈思

■石文傑

4月上旬，中研院院士丁邦新在「聯合報」發表「一個中國人的想法」，「聯合報」並印成百萬份小冊子，分送各機關學校。藝評家何懷碩在「中國時報」撰「另一個中國人的想法」批駁。5月，台中私立立人高中教師石文傑因影印何文給學生閱讀，該校校長竟表示將予解聘。事件發生後，輿論大譁，紛紛聲援石文傑。本文是石文傑的心路歷程。——編者

從五月十一日，與校長因為「一個中國人的想法」引起爭執至今，十一天過去了，從乍聞將被解聘的震驚、橫受屈辱壓制的心酸，到立下據理力爭的決心，以致接踵而來的聲援和鼓勵，其間的心路歷程，真是百感交集、五味俱陳。

回想這十年來，講台下那一張張不同的表情，有求知若渴的熱情、有血氣方剛的執拗，有木訥拙樸的羞澀，都同樣是年輕明朗的臉龐。每到節日，信箱裡一張張溫馨可愛的小卡片，馬路邊校函裡那一聲聲宏亮的「老師好！」——教書的興趣，豈僅在那區區一萬八千元？在求知的道路上，無論是贊同者的掌聲或不贊同者的反駁，都使我得到教學相長的助益，也都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不能、不願、更不忍離開我所喜愛的工作崗位。

教師尊嚴蕩然無存

在各角落傳來的支持和掌聲中，我也看到了這整個事件所帶給何校長的傷害，如果校長不是坐在校長室裡的座位上，或許他應不致對「丁、何」二文的處理上如此的偏執吧？是什麼使他不得不如此做呢？行文至此，突然想起許久前的一些往事：有一次上到「王莽篡漢」，在上完課本上的題材後，我介紹了一篇胡適論王莽的文章，希望學生們能從各方面的題材中去認識這個歷史人物，下課後，立刻受到勸止，理由是「避免造成認知上的困擾」，



●何懷碩 ●丁邦新

又有一次上到歷史第四冊第三章第三節——美國南北戰爭與領土擴展，提到美國的「強搶豪奪」（第四冊第四十六頁倒數第二行語），也立刻收到要求避免造成偏差的指示，想到一個教師在講壇上尊嚴的蕩然無存，想到一個知識份子曲從於各方的壓力，對知識如此的漠視，我不知該為誰感到悲哀？這點點滴滴，想必校長也知道吧？我可以想像到當這些無謂的「報告」，以迅捷的速度傳向校長的耳朵時，所帶給他的困擾和厭煩，然而——我多麼遺憾的是，在傳授知識的園地裡，校長處理事務的態度却是以妥協省事為前提，而不是以是非公理為依據。話說回來，這不正是今日教育界普遍存在的現象嗎？想到這裡，我又何忍獨責於校長？

路是一定要走下去的，真理是一定要執著的，想起這整個事件中受到傷害的人，我深深地感到哀傷，更深地體會到布魯特斯在面對「羅馬」和「凱撒」的抉擇時，內心的無奈和痛苦。

◎社會檔案◎

控訴余光中腐敗的特權行爲

■李勤岸

——告別中山大學同仁與同學

敬愛的朋友：

在過去共處的一段時光，我們曾愉快地過往，可是，自七月一日起，我將辭職！不爲別的，只是爲了向文學院長余光中先生表示我的抗議。

在一個學年的下半學期，沒有招收新生，沒有增開新班，沒有老師離職，照常理應不可能新聘教師，然而中山大學的外文系這個學期新聘了一個專任講師，那就是文學院長兼研究所所長余光中先生的女兒——余幼珊。

爲了聘任余幼珊，外文系中途減去另外三位老師各一班課（兩班大一英文，一班英詩），這真是教育界罕見的特權！

這種事情竟然發生在一個以反特權反腐敗的革命家 中山先生爲名的大學；竟然發生在一個創校未滿六載，各界殷殷厚望的國立大學裏；竟然發生在本來制度比較合理、公平的外文系；竟然發生在一個一向標榜愛國的所謂愛國詩人的身上，這實在是天大的嘲諷，天大的污辱啊！

我非常留念這兒親切的同事和可愛的學生，却又深深不齒余先生的作風！爲了抗議這種腐敗的特權行爲，本人自七月一日起自動辭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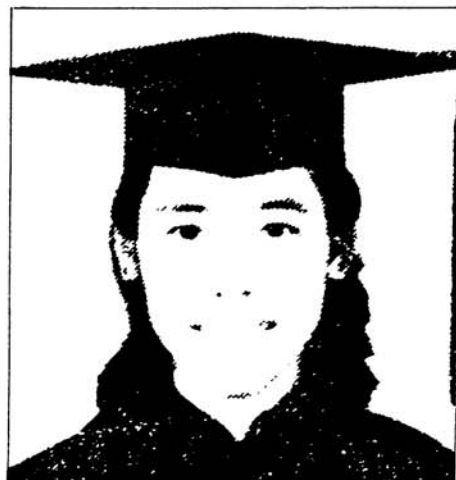
抗議人 外文系講師

李勤岸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四月三十日



• 余光中
「內舉不避親」？



• 余幼珊



◎大陸透視◎

對中國大陸 「農村改革」的探討

■張愛新

一、導言

在1978年年底中共的三中全會中，鄧小平派取得勝利，從1979年開始鄧派在中國大陸農村展開了一系列的「改革」，這些「改革」是具有革命

性的，因為它徹底改變了大陸農村的生產關係。「農村改革」實施的最初幾年因為農產品大幅加價，使得農村因為農民收入和消費的增加而出現了表面繁榮興旺的現象，加上商品流通渠道的打開，使得農村一小批人藉著商業和運輸的發展而富了起來，



●中國大陸農業
集體制耕作與
農田基本建設

出現了一小批「萬元戶」。中共官方對佔數極微的「萬元戶」大加宣傳，西方報章雜誌也跟著鼓吹，「萬元戶」便成了鄧派改革成功的標誌。鄧派並宣傳，因為把「大鍋飯」打破了，所以「懶漢」也得勤快起來，因此農業生產上升，前途無限光明。

這篇文章將指出鄧派的「農村改革」在暫時用增加內外債和擴大糧食進口的手段製造出來消費膨脹現象的背後隱藏著極嚴重的問題：八年以來農田基本建設不但沒有增加而且每年遞減，使得以前幾億農民辛辛苦苦用勞力對土地的投資難以為繼，中國大陸的農村再度遭到水災旱災的嚴重威脅。而且消費的膨脹使積累無法進行。政府用增加赤字對農產品提價的補貼已無法承擔，因此更求助於外債。

1987年預計所要借的外債是1986年的一倍，其中有38%要用來還過去外債的本息^①。中國大陸已經踏進了一般第三世界國家被外債纏身無以自拔的陷阱。

這幾年來的農業生產除了棉、油有比較顯著的增加外，糧食生產在1980年減產，1981年僅增長1.4%，在1982和1983年間，因糧食提價所起的刺激作用，兩年糧食生產均增加9%。到了1984年增長率下降，1985年糧食減產7%以上。所以幾年平均起來，每年增長率也僅超過2%一點。1985年中共中央因為無法負擔因提價所造成的補貼而取消了農產品的統購和對價格的支持，大批的棉農無法將棉花出售，此後棉、油生產也將受很大的影響。

此篇中將「農村改革」作分析作評價。經過八年的實踐，鄧派的「農村改革」在對破壞農村集體經濟來說是成功了，但在對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發展中國農業來說是失敗了。並且因為這八年的發

註釋：

① 1986年中共向外舉債78.7億元（人民幣，下同），1987年向外舉債將達146億元。其中有56億元將用來還外債的本息。見註②。

展破壞了農產生產的基礎，向前展望，中國大陸未來農產的前途是極不樂觀的。

中共中央在1984年冬和1985年春在28省、自治區、直轄市作了一次大規模的調查，這個調查包括了272個村，37422個農戶^②。這個調查指出了目前農村嚴重的問題。此篇文章將會引用這調查的結果並作分析。在調查報告中指出被調查的農戶中有47%都是入不敷出。這樣大數量農戶入不敷出的情形和比中特獎還難的「萬元戶」發家的情形相比之下，就可以得出「農村改革」成敗的結論和判定鄧派農村政策的階級性。

本文先對1979年以前中國大陸農村的發展作簡單的介紹，再分析1979年以來農村生產關係的改變和對生產力所造成的挫傷。

二、1979年以前中國大陸的農村發展

中國大陸的可耕地佔全世界的7%，但人口卻佔全世界的25%，每人平均可耕地在1952年時0.2公頃（即三畝，折合半英畝），到1979年時僅為0.1公頃，少于印度，亦少于日本。因此要發展農業必須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可耕地。農田基本建設就是用人力與自然鬥爭來達到這個目的。

1952年土地改革完成之後，全中國大陸每人平均僅三畝地，在南方人口稠密的各省的一些地方連一畝地都不到。不但耕地少，而且土壤貧瘠。多年來地主對土地不投資，加上戰爭的破壞，四川水利多年失修，水災旱災是常事，嚴重時要死幾百萬人。除了土地少和貧外，生產工具也極缺乏。根據一個1952年在23省對15432戶的農家所作的調查，那時平均每戶農家只有耕畜0.04頭，耕田的犁



0.54部，水車0.1部^③。

因此，在土地改革之後，中國大陸農民生活雖然稍有改善，但是因為生產力太低，大多數的農戶都沒有能力添置新的生產工具。有些農戶就連維持簡單再生產也有困難。如果再碰到自然災害，或是

^②關於此調查報告見「農村改革的現狀與趨勢—全國農村社會經濟典型調查報告（節錄）」登載於農民日報。

^③此資料是根據土地改革結束時對二十三省、15432戶農家的調查，來自蘇星所著「土地改革以後，我國農村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載於「經濟研究」，1965年7、8、9三期。生產工具資料來自第7期第13頁上的一個表。

- 集體合作生產制有著可以使生產工具和土地被較高效能的使用的優點。



這兩年都減產。所以農民生產在這兩年都處於停滯狀態^⑤。主要原因是這種農民個體經濟已經不能適應生產力的發展，1953年和1954年大量農田遭受嚴重的水災旱災，但在小農個體經濟下，農民沒有能力個別地防禦水災、旱災，生產力低，因此除了消費以外很少有剩餘可以用作積累，添置新的生產工具。農民個體經濟的潛力在很短的時期內就發揮光了。

這說明了小農經濟對發展生產力的限制，也說明了在中國大陸如此稀少的土地條件下，農業發展的唯一出路就是使每畝耕地都變成高產穩產田。所謂高產田就是使土壤的肥力增加，以便提高畝產量，穩產就是要修建水利工程，用完整的灌溉和排水系統來防旱防澇，增加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改變靠天吃飯的困境。這就是農田基本建設的重要內容。事實上，高產田也必須要靠灌溉排水系統，因為除非土壤可以維持一定的濕度，化肥也沒有辦法發揮它的效力。但是農田基本建設的內容還不止於修建灌溉系統，也包括了平整土地，即平山、填河、作梯田，將小塊土地連接成大塊；也包括造林、修路、修橋、建造發電廠和電灌站等等。因此，在完成高產穩產田的過程中要同時為機械化作準備。農田基本建設可以說是發展一切農業的基礎。

在生產工具不足的條件下，要完成農田基本建設的工作是極為困難的。因為沒有機器（初期有機器，但也不多），幾乎所有的這些建設都要靠人力，靠農民的雙手、雙臂、雙肩和雙腿來完成。但是無論多麼困難，農民是多麼辛苦，從長遠來說，這條路是發展中國農業的可行之路。必須用大量的勞動力直接向土地投資，也就是勞動積累。從長遠來看，農民只有在這樣極端辛苦的努力後才能開始享受自己勞動的果實，才能靠機械化來減輕自己勞動的時間和減輕自己的勞動強度。三十年前如此，今

個人、家人碰到什麼不幸，就得舉債。債堆積起來，到後來只有賣地。土地再一次集中，許多人再一度淪為雇農。這些現象在1950年和1951年就已經開始了，而且有逐漸增加的趨勢^④。說明了小農經濟的不穩定性。

從1949年到1952年間糧食產量增加44.8%，棉花產量增加193.4%。但是到了1953和1954年糧食增產率僅為1.8%和1.6%，棉花在

④同上，見第8期，第5-7頁。

⑤同上，見第7期，第24頁。

天仍是如此。

中國大陸的治河工作在 1950 年代就開始。但農田基本建設的全面擴張是 1958 年人民公社成立之後的事。到了 1970 年代初，因為農業生產有了初步基礎，以及工業對農業的大量支援，加上社隊工業的發展和農業學大寨運動的掀起，農田基本建設就加速的發展起來。這樣的發展直到 1979 年三中全會後農村改革開始時停止。

下面一個表列出了 1979 年以前農田基本建設和機械化的成績，從這表中可以看出農民過去將多少億萬小時的勞動投向土地，說明中國農民勤勞的傳統在新的生產關係下充分發揮出來。鄧派把農民說成懶漢是對勤勞的農民莫大的侮辱。

的努力雖然為農業發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礎，但是這基礎還相當的薄弱。自從 1979 年以來不但基本建設停止了，而且連維修管理都不能維持，僅八年的時間就把老本吃光了。這一點在下一節中將詳細的談。

另外一點必須提到的就是中國大陸各地區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相差很大。人民公社的三級所有制對農田基本建設和機械化的發展雖然優越於小農私有制，但是集體所有制也有它的局限，局限之一就是它不能很好地解決各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本來農業發展較高的地區，也就更有餘力搞農田基本建設，更有能力發展工業、工業越發展，積累越快，就更有能力投資於農田基本建設，因此農業生產

	單位	1952	1957	1965	1979
灌溉面積	萬公頃	1995.9	2733.9	3305.5	4500.3
其中機電灌溉	%	1.6	4.4	24.5	56.3
農村小型水電站	個	98	544	7436a	83224
農村用電量	億度	0.5	1.4	37.1	282.7
化肥施用量	萬噸	7.8	37.3	194.2	1086.5
機耕面積	萬公頃	13.6	263.6	1557.9	4221.9
農業機械總動力	萬馬力	25	165	1494	18191
大中型拖拉機	混合台	1307	14674	72599	666825
大中型機引農具	萬台	—	—	0.4	167.1
聯合收割機	台	284	1789	6704	23026
灌·溉·機·械	萬馬力	12.8	56.4	907.4	7122.1

a：1962 年資料

資料來源：1984 年中國統計年鑒，第 175 頁；許毅等著，“社會主義價格問題”。

有了這樣的初步基礎，糧食畝產量從 1952 年的 202.5 斤增加到 1979 年的 445.1 斤，1979 年是 1952 年的 2.2 倍。

雖然農田基本建設在過去有如此的成績，但是因為長年來對土地和自然生態的破壞，這樣的努力也只能把全國耕地的 40% 變為高產穩產田。這些年也就發展得更快。相反地，本來農業就因為自然條

件惡劣，土壤貧瘠無法發展地區，也就愈難從貧困中掙扎出來。雖然不少地方，靠了自己的力量和毅力對自然鬥爭，得到奇蹟一般的成果，像大寨就是這樣成功的例子。但也有不少地方無法發展。這種不平衡的發展隨著社隊工業的興起更為突出了。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這不平衡的發展使得許多矛盾得不到很好的解決。這一點以後將用專文討論。

- 如果，肥料必需用現金支付，那麼買不起肥料的農民也就出現了。



進一步將農業生產商品化，以便配合工業生產的商品化，將中國大陸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向資本主義發展過渡。這裡的分析是根據過去八年實踐的結果來說明中國大陸農村改革的失敗。根據這個失敗的經驗可以進一步預測到在中國大陸的農村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沒有前途的。

1. 所有制改變所引起的問題

首先談土地所有制的改變。1981年在所謂承包制實行時，每個生產隊將土地分給農戶來承包，這樣就發生了人口多而勞動力少的農戶生活極為困難的問題。這問題在人口多地少和特別窮困的地方更為嚴重。但如果按每戶人口多少來分地，又發生了勞動力少的農戶有田沒人種的問題。除了按什麼分配土地的問題外，因為土地有好有壞，所以在分地時每戶都分到一點不同等級的土地，這樣就使得土地支零破碎，造成土地和人力的浪費。

根據前面提到的1984～85在28省所作的農村調查，每戶承包土地平均為8.35畝，分割成9.7塊，每塊僅有0.86畝。因此，土地分散，每塊耕地過少是普遍的現象。1983年上海復旦大學的一些人曾到江西省吉水縣去調查。在他們調查的10戶中，農民共承包土地190畝，分成285小塊，平均每小塊僅0.67畝，最大的一塊約4畝，最小一塊僅0.1畝。其中有一戶的31畝農地被分成70小塊，最遠的相距達兩里，走去約需15～20分鐘，一天來回要浪費一個多小時。根據當地有經驗的老農夫講，因土地承包過於分散所造成的損失達農民總收入的5%到10%。^⑥

分土地的另一問題是，每戶人口和勞動力都不時有變動。人口的變動引起土地重新調整的問題。1984年公佈承包期可延到15年以後，因各種人口變動要求土地調整的問題就難解決。發生大批為搶

三、1979年以來生產關係的改變 對生產力的挫傷

中共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大陸的農業政策徹底地改變了農業的生產關係。生產資料所有制從集體所有變為私有。土地在法律上雖然仍歸生產隊所有，但這種形式上的集體所有已失去任何意義。特別是從1984年初以來，土地承包可延續到15年，而且子孫還有繼承權，承包土地者有權將土地轉包（即轉租的意思），承包者對土地的使用有各種的支配權，唯一沒有的就是土地的買賣權。所以從實質上來說是一種加以限制的私有制。另外，其他生產工具，如農具、耕畜等也變為私有，再按一定方式將產品分配，改變為一家一戶個別進行生產，產品歸自家所有的分配型式。生產也由過去用計畫來調節生產，以滿足人民生活需要為目的，逐漸改變為依靠價值規律作為調節來決定生產什麼和生產多少。生產逐步商品化的結果，生產目的已改為獲取最大剩餘價值，而非滿足人民生活的需要。

這裡將要分析的是這樣生產關係的根本改變對農業生產上所帶來的影響。前面曾就提過鄧派的農業政策並不是要止於將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解體後停留在目前這種小農經濟狀態中，鄧派的目的是要

⑥見人民日報1983年11月3日。



土地而引起的糾紛，嚴重到武打傷人。說明了這種不准買賣的土地私有制難以維持。事實上所謂“非法”的土地買賣交易，時時都在進行。在一些城市的近郊，地價漲到相等於耕地每年收成的九十倍，甚至一百倍。農民將土地賣了可以吃上一輩子還有餘，何樂而不為？自1979年以來，每年因各種用途佔去大量耕地，根據1984～85的調查報告，從1978到1984年之間耕地每年遞減1.1%，報告中更說：“四面八方向土地進軍，而擠佔的多是好田，這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突出問題，有些地方已經發展到相當嚴重的地步。”^⑦

在生產工具的重新分配上最嚴重的損失是對大型農具，像大型農機配的耕耘機、播種機、收割機的破壞。不但因為土地變得支離破碎，無法使用農機，而且因為個別農戶無法負擔農機的保養和修理，使得“鐵牛變成了廢鐵”。以前統一使用的倉庫、牛欄，有的木料被拆走，有的霉爛倒塌了。就像耕牛，幾家分到一頭，只顧拼命使用，卻又盡量少餵，耕牛死了很多。像這些以前用集體勞動辛辛苦苦創造的財富，就這樣毀掉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被毀掉的財富並不被計算在任何統計數字之中。

2. 生產關係的改變與 農田基本建設的破壞

這篇文章一再的強調農田基本建設是發展中國農業的基礎，上一節談到因為所有制的改變造成土地、耕畜、農機、牛棚等財富的損失。土地被分成小塊以後，以前用大量勞動力建立起來的灌溉和排水系統遭受到破壞。往往一家農戶分到的土地上有灌溉渠道，爲了多一點耕地，農民就將渠道用土將它填平了。沒有被填平的灌溉系統也被棄置不用。

原因之一是各家播種的時間不一樣，而且種的莊稼種類也不同，因此需要澆水的時間也不一樣。而一個灌溉系統澆起水來是一大片，如果這片土地上的各戶不能同意澆水的時間就只有不澆水。另一個原因是農業生產商品化的結果，農民要用任何生產資料都要支付現金，沒有現金就不要想用水。^⑧

在人民公社制度下搞農田基本建設不但有長期計畫還有短期計畫，現在對農田基本建設的措施既無長期計畫亦無短期計畫，甚至連維修管理都無計畫，人民公社解體之後，大陸農村基本上處於無政府狀態，新的行政單位像鄉、村名義上是取代了以前的公社和大隊，但這些行政單位是名存實亡，不能擔當起生產中的職能，在農業生產上和農田基本建設上都起不了作用。各個農戶只能顧到自己眼前的生產還有那種困難，像農田基本建設這樣的工作完全處於癱瘓的狀態。

這種“吃老本”的情況，到了1984就已經威脅到農業生產。前面提到的84～85年28省的調查中這樣說：“……但在農業基礎設施上沒有相應加強，某些方面還有所削減，基本上是靠“吃老本”過日子，這種狀態已不能滿足生產進一步發展的需要，如此下去，我國農業生產的持續發展將缺乏後勁。”^⑨由此可見，這種“吃老本”的情況是在全大陸普遍存在著。

^⑦見註②。另一資料指出1984年一年耕地減少近2000萬畝，見「農業經濟問題」1985年9月第9頁。

^⑧見William Hinton 所著“China's New Farm by Contract System,” Monthly Review, November, 1983。韓丁在中國大陸調查家庭承包制時觀察到新的辦法下誰要用水就要預先支付現金。

^⑨見註②。



到了1986年的夏天情況就更加嚴重了，連中共官方都不得不出來大聲疾呼了。田紀雲的農村水利報告中說今天農業上的成績，“也是與長期以來國家投資、群眾投勞艱苦奮鬥興修水利工程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分不開的。”^⑩這位田先生不得不講幾句實話了。“群眾投勞艱苦奮鬥興修水利工程”跟中共官方這幾年所宣傳的中國大陸農民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出工不出勞”，又說“大鍋飯、養懶漢”是如何的自相矛盾？其實只要詳讀報紙，仔細比較，作一點調查研究，就會發現鄧派的宣傳不能自圓其說。

這位田紀雲又接著報告今日的情況，他說：“這幾年來，水利工程投入少，維修管理差，以致有的地方工程效益不僅沒有增加，而且逐年遞減。光靠吃老本，拼設備，將難以為繼。”^⑪田先生這段話講得夠中肯。觸及到問題的核心了。

1986年的夏天水利問題是夠嚴重了，中共的水電部長錢正英也出來講話了，對她講話的報告這樣說：……水利建設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水利工程老化失修，二是北方水資源日益緊張。她認為，“現在有的地方是吃工程的老本，吃地下水的老本，長此下去，將無以為繼。現在如不正視這兩個問題並採取堅決措施，一些地方可能重新遭到水旱災害，生態平衡遭到破壞，以致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錢女士的報告遲了好幾年，不是“一些地

方可能重新遭到水旱災”，而是“一些地方已經重新遭到水旱災”。^⑫應該把對未來的預測改為對事實的報告就比較誠懇些。1982年的夏天，在四川的達縣地區就因為大量砍林及水利工程失修造成了八十年以來未曾有過的大水災，損失極為嚴重。85年東北的水災情況也非常嚴重。今年春天中國大陸有好多省份遭到旱災。無論如何，從上兩個官方的講話中和84～85農村的調查報告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問題的緊急性，真已是刻不容緩了。

幾十年辛苦的奮鬥，幾億農民的勞動投向土地，就在幾年之內破壞到幾乎一無所存。這筆賬是算GNP可以算得清的嗎？

為什麼以前可以大量修建農田基本建設，而這八年來連維修都作不到？這一定要從生產關係的改變來探討，除了生產關係的改變，還要談談隨著不同的生產關係而產生的不同的意識形態所發生的影響。

先談在集體所有制下勞動者之間的關係。在集體所有制下，生產是靠集體協作勞動，因此可以有適當的分工。就拿施肥來說，有人可以作肥料運輸的工作，有人可以將肥料施於土地。又如有人來管耕畜的繁殖和餵養，也有人負責農機的保養和維修。到了社隊工業發展了以後，亦有工農的分工。分工的結果可以節省很多工時。另外一點就是在集體協作勞動下是有組織和有計畫的勞動，在農閒的季節，一個生產隊可留四分之一的勞動力在田裡做春耕必要的準備，另外四分之三就可以從事農田基本建設。而且幾個生產隊，甚至幾個生產大隊或幾個人民公社可將勞動力聚集起來搞大規模的水利建設。在現在各家各戶獨自勞動的情形下，即使是農閒季節農民也不肯離開自己的田去從事什麼基建的工

^⑩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年6月12日登載。

^⑪同上。

^⑫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年6月12日登載。



作。各家各戶的半個、一個閒著沒事的勞動力沒有辦法聚集起來進行生產。

隨著生產關係的改變，意識形態也在改變。以前強調的是發展農業必須從長期著眼，必須艱苦地向自然奮鬥，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改變農業生產的自然和物質條件，奠定農業生產的基礎。現在要求產量在多少年內翻一番（其實翻不上去），一切要急效，只種地不養地，甚至作掠奪性的經營。在1984年以前，土地承包每期一年，農民連肥料都不肯用，更不要談到土地投資了。1984年後承包期改為15年，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此後，情況雖然稍好一些，但是沒有解決根本問題。因為土地不准買賣，目前承包的農戶所作的任何有長久性的投資都得不到補償，因此沒有人願意投資。即使土地可以買賣了，目前一半的農民連維持簡單再生產都有困難，也沒有能力可以向土地投資。

以前強調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之間有不可分的關係。強調個人力量雖小，集體的力氣卻可以勝天。如果集體的灌溉和排水系統搞不好，水災旱災每個人都要遭殃。現在強調各家靠自己（實際上是靠關係和靠運氣）可以發家致富。以前強調互助，現在強調競爭。在新的生產關係下，意識形態必須跟著轉變，加上中共官方大力鼓吹他們那一套「萬元戶」的哲學，農民看得清清楚楚，沒有那一家「萬元戶」是靠種田發起來的，更沒有那家「萬元戶」是靠搞農田基本建設致富的。在新的生產關係之下，每個農民只好緊緊守著自己分到的一小塊土地，緊緊地守著這小塊土地上長出來的莊稼。在秋天的時候，現在又恢復到集體化之前的舊辦法，每家都得派人守著自己的莊稼，以防別人來偷。這跟人性

生來是否就是自私無關，而是為了生存就要必備這樣的警覺性。

中國大陸農村到了七〇年代中期，許多農村都已經出現勞動力供應緊張的現象，在農忙季節，工廠往往要停工。這幾年來因為農田基本建設全都停止了，農村中出現了所謂“剩餘勞動力”的假象。近幾年來中共官方的報導不斷地強調農村有30%到40%的“剩餘勞動力”，並把這“剩餘勞動力”歸功於農村改革^⑬。說是因為積極性高了，幹活快了，所以產生了“剩餘勞動力”。需要作的農田基本建設太多了，作也作不完，那裡來的“剩餘勞動力”？

過去不少的西方經濟學家對中國大陸的農田基本建設都作過調查和報告。1978年世界銀行出版一本名為「中國經濟成長與就業」的書^⑭。根據作

^⑬見Beijing Review, 1984年4月30日第18期，此篇題為“Explaining China's Rural Economic Policy”是記者對杜潤生的訪問，第16-21頁，資料來自第18頁。

^⑭見Thomas G. Rawski,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i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ank, 1979。



- 中國農民用大量勞動力直接向土地投資，進行勞動積累

之外對超過定額部份在提價之上再加50%。目的是用物質刺激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從1979年到1984年之間又有幾次收購價格的調整，1984年農產品平均收購價格高過1978年的50%左右^⑮。

農產品收購價格提高以後的最初幾年因為怕物價上漲引起城市居民的不滿，所以暫時將農產品的零售價格維持不變，其中差額由政府補給，在此同時並大量進口糧食^⑯。因此在表面上呈現了一幅繁榮的現象，農民的收入增加，工人工資增加，獎金增加，物價暫時維持不變。但這種表面的繁榮是用赤字透支，增加內債和外債的手段製造出來的。因此，沒有辦法長久維持下去，最後財政上的困難只有取自通貨膨脹一途來解決。

從1977年以後，中共政府對收購農產品的補貼一年比一年多。1978年為78億人民幣，1979年增至146億元，1980年更增至280億元，1981年高達320億元^⑰。在一篇報導中說，1981年全中國大陸平均每個城鎮居民享受的消費品補貼為164元，相當於當年城鎮居民平均收入的33%^⑱。這是極大幅度的補貼！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這補貼的話，城鎮居民的生活水平就要下降三分之一。這篇報導並說：“（補貼）暫時保證了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負擔越來越重，一年比一年大。從而財政無力保證重點建設。……長此下去，勢必影響建設規模，阻滯經濟發展”^⑲。

中國大陸的過去經濟發展，在工業發展沒有基礎之前是靠壓低農業價格來達成積累，待工業稍有

者若斯基的估計從七十年代起中國大陸農村勞動力的百分之三十都是用於農田基本建設（這個估計與其他許多估計相符合。）而且每個農村勞動力從五十年代的初期每年工作119天增加到1975年每年工作250天。基建工作停止了，怪不得多出了這麼多“剩餘勞動力”來。

3. 農產品提價與消費積累的關係

中共三中全會的重要決策之一就是提高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收購價格。1979年糧食價格平均提高20%，所有農產品總合平均提價22.1%。除此

^⑮ 1981年的農產品收購總價格比1978年的提高了38%。糧食收購價格在1981、1982、1983、1984年分別提高了5.9%、2.2%、4.4%和4%。見「農業經濟問題」1985年第10期中“我國農產品價格體制改革與價格政策調整”，安希牧著，第23-28頁，資料來源第24頁。

^⑯ 1979-1984年平均每年糧食淨進口量為1166萬公噸是1965年到1978年平均每年糧食淨進口295萬公噸的四倍。

^⑰ 見「紅旗」1982年第1期劉宗甫著“怎樣看當前市場價格問題”。

^⑱ 見人民日報，1983年6月27日，「關於財政補貼問題的探討」。

^⑲ 同上。



基礎以後，又由逐漸降低工業產品價格和提高農業產品價格來提高農業的積累，並且由工業大量生產農業生產資料（像農機、化肥、農藥等）來支持農業。所以農業在相當短的一段時間內就可以大量的機械化和大量增加使用現代化的生產資料。過去的發展證明工業積累和農業積累，以及工農業的擴大再生產可以在這樣的互助關係中達成。這也就是在農業集體化以後到 1979 年這一段時期「工農聯盟」的物質基礎。

從 1979 年農產品提價以來一系列的政策徹底地破壞了這種工農之間的互助增加積累的關係，也就使得積累無法進行。根據另一個報導，1980 年，中共政府收購農產品經過加工之後所得到的稅利大約為 200 多億元，而當年政府用於價格補貼的開支也相當於 200 多億元^②。換句話說，這 200 多億元本來是可用作工農業投資以便擴大再生產之用的，但現在就把它吃、喝、買大件、辦紅白喜事消費掉了。

單從增加消費使人民生活水平來說，是好事。因為當擴大再生產的目的就是為了提供更豐富的生活資料使得人民生活可以過得更好。但是中國大陸過去幾年的作法是用暫時滿足人民對提高生活水平的願望來收買人心。好像要人相信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不靠生產，只靠加價、靠補給、靠多發獎金就能作到。消費的增加擠掉了積累，積累的減少，使得擴大再生產不能進行，造成嚴重的吃老本的困局。在短時間內呈現了農村和城鎮居民購買力增加的現象，但維持不多久，因為生產跟不上去，就出現了物價大幅上漲的現象。

除了消費品大幅漲價外，農業生產資料近幾年

來平均（共 15 種）提價 48%^②。從短期看來 1979 年以來的農產品提價好像有利於農民，但是農村和都市消費的增加，使得整個經濟無法承擔，因此消費品必須加價，以便壓低消費。消費品加價又引起了工資的上漲，因此工業生產成本提高，結果農業使用的生產資料也必須要加價。生產資料的加價特別苦了生產力低的地區和比較貧困的農民。因為農產品加價只對有餘糧可賣的（特別是有很多餘糧可賣的，即可享受再加 50% 超額加價的）農民有利，對沒有餘糧可賣的農民卻一點好處也沒有。但是他們都必須付同樣的高價來購買生產資料。這是他們無法負擔的。上面提到的 84 ~ 85 的 28 省農村調查很清楚地顯示出這個問題的突出。在 37422 農戶中有 47% 的農戶入不敷出^②。這說明了在被調查的農戶中有近一半的農民連維持簡單再生產都不可能。而這被調查的農戶與全國農業水平來比還是偏高的，由此可見問題是極為嚴重的。

用赤字支出來刺激消費嚴重地影響到積累，而且近兩年來中國大陸財政的赤字支出越來越依靠借外債來彌補。中國大陸的財政自 1979 年起，除了

^②許毅等著「社會主義價格問題」第 24 頁。

^②見盧文所著“我國沿海較發達地區農村經濟發展中的幾個問題”，「農業經濟問題」1985 年第 1 期，第 16 頁。

^②在三萬七千餘戶中有 47% 的農戶每年平均收入在 300 元以下，這些農戶的支出大於收入平均每戶為 28 元。

1985年一年以外，每年都出現赤字。1986年赤字為70億元（人民幣，下同），今天預算中赤字為70.8億元，但向外舉債從1979到1984年每年舉債額在43億以下，增長到1986年的78.7億元，更增至1987年146億元的新記錄。1987年一年必須償還的外債本息即將達56億元，也就是說今年所借外債的38%將用來還過去所借外債的本息^{②③}，而今年外債的增加將使未來的負擔更為加重。中國大陸已經踏入了現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外債纏身不能自拔的陷阱，也說明了今日消費的擴張將造成未來消費的大幅度的削減。墨西哥因受外債所逼，1981年到1983年兩年之間生活水平就下降了30%，除了經濟上影響之外，照目前的發展看來，國際貨幣基金上門干涉內政將不會是太久以後的事。

4. 對農業生產商品化的分析和對未來的展望

前面已經提到鄧小平的農業政策並不以小農經濟為最終目的。土地極端分散，小農生產和經營方式使農業生產反現代化而行，這是鄧派已經可以理解的問題。對鄧派來說，到今天為止他們的政策對破壞農村的集體經濟，對破壞農民的團結，對破壞「工農聯盟」來說是成功的。但是對將土地和生產資料再重新以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組合起來是失敗的。特別從1983年以來中共對專業戶培植的失敗經驗中，可以預測在今天中國大陸的農村想用資本主義方式來發展農業是註定要失敗的。下面就對這一點來分析。

根據1984～85的農村調查，在被調查的農戶中，糧食生產的商品率從過去的20%左右提高到1984年的33%。其他經濟作物的商品率提高的更多，棉花與糖類的商品率在90%以上。報告中說：

“1984年這些農戶（共三萬七千多戶）的家庭總收入每人平均為504元，其中出售產品和加工、勞動等營業收入為297元，占59%。農民出售產品數量和非勞業經營收入的增加，反映了農村經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②④}

這個人均總收入的資料說明兩個事實。一個是近幾年來中共官方對農民收入增加的誇大宣傳。在這個總收入中必須扣除一切生產成本才能與過去的純收入相比。另一個事實是現在中國大陸的農民必須待出售他們的產品換取現金才能購買生產資料，才能繼續下一年的生產。農村經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包括了各項生產資料，像化肥、種子、塑膠薄膜、農藥，甚至於澆水都要用現金支付。而被調查農戶中近半數都入不敷出的意思就是他們的收入不夠在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兩方面的支出。也就是說他們如果顧得上今年的生活，就顧不上明年的生產。這就是為什麼前幾年還聽到買化肥難的問題，近兩三年來已經聽不到了。不是化肥夠用了，而是小農買不起化肥了。（15種農業生產資料自1979年來平均提價48%）

中共進一步將農業推向商品化的政策到了1983年更明朗化起來，這裡所指的就是對專業戶的培植和輔助政策。專業戶有不同行業，這裡要談的是種植業的專業戶，著重於糧、棉專業戶。

中共中央1983年1號文件中這樣說：“近年來隨著多種經營的開展和聯產承包制的建立，出現了一大批專業戶……它們一開始就以商品生產者的面貌出現，講求經濟效益，充份利用零散的資金和勞動力，發揮了農村各種能手的作用，……”^{②⑤}。

種植業專業戶的發展一定要有幾個條件，其中較重要的就是必須有較大的土地，就要將目前分散的土地再一次集中。從1983年起中共當局就鼓吹

^{②③}北美日報，1987年4月13日節譯「遠東經濟評論周刊」。

^{②④}見註②。

^{②⑤}中共中央1983年1號文件摘要，取自1983年4月11日人民日報—「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



“土地的種田能手集中。”“能手”的定義是有種田經驗的，有管理能力的，掌握先進科學知識的，有資金可以雇得別人幫忙的。最先一批發展起來的專業戶是中共政府在各方面給予優待扶持起來的。在土地上他們承包了一部份留作調整用的尚未被承包的土地。中共政府不但要地方各級農業銀行用大批優利貸款來支持專業戶，而且用大量的廉價化肥、柴油等生產資料給專業戶協助。並且用以前集體制發展出來的農技站、農機站給他們作技術指導和維修的服務。除此之外，在農產品收購的時候也給予他們優先照顧，不必像一般小農普遍碰到賣糧難的問題。

鄧派何以將發展專業戶看成其政策中重要的一環呢？專業戶對鄧派要將農業推向資本主義化的重要性有二。其一就是如果有很大一批專業戶可以發展起來，這些專業戶用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為生產商品追求最大利潤、講求所謂“經濟效益”，那麼只要靠這些專業戶的生產，城市居民糧食的需求，工業對原料的需求就可以滿足，其它小農就讓他們自生自滅了。第二個重要性就是這些被扶植起來的專業戶，在各方面有上面提到的優越條件，他們的糧生產相對小農來說可以增加得很快，畝產會提高，單位生產成本會降低，勞動生產率會提高。換句話說，也就是畝百斤糧食（小麥、稻或其他雜糧）生產所需的必要勞動時間會降低。只有這樣才能使價值規律發揮作用，逼使小農為了生存必須同專業戶競爭，競爭不過只有破產，把土地讓出來。

●農村改革是中國社會最重要也龐大的建設工作，問題是如何改革？

從1983年中共大力扶植和培養專業戶的政策開始以來到現在為止，鄧派所希望的結果並沒有實現。主要的阻力是一般農戶不肯將土地讓出來。中國大陸今天每個農戶平均分不到十畝地，而一個專業戶如果要達到生產資料有效的利用，則需要100畝地，也就是說在十戶中要有九戶放棄耕地向一戶的手中將土地集中。也就是說要有90%的種植業農戶必須轉業。對中國大陸這樣工業發展水平如此低的國家，在短期內（十年或二十年）是完全沒有可能作到的。

1984～85年的農村調查報告中指出被調查的農戶中僅有0.4%是承包，由此可見鄧派培植農業戶政策的失敗。專業戶的推展在農村受到極大阻力，專業戶與一般農戶間有極深的矛盾。鄧派農村政策的階級性愈來愈明顯。

從另一篇有關沿海較發達地區近幾年的發展中，也可以看出中共對專業戶培植政策的失敗²⁶。這些沿海地區商品經濟較發展，工商業所占的比重較大，生產技術水平較高，人民生活較好。在這樣的地區，因為轉業機會多，農民放棄土地，土地的“種田能手”集中應該是比其他地方容易。但過去幾年這些地區的土地不是更集中，而是更分散了。由此可推見，在不發達地區，轉業機會少的地區，土地集中該是多麼困難了。

轉業機會雖不弱，但在未來的五至十年內小農繼續破產却是不可避免的。1985年中共中央公佈取消農產品統購以後，將農業生產更向商品化推前一步，小農的處境只有更加困難，但對中國大陸農民來說，土地是他們的生命，即使破產也不會肯將土地讓出來。土地不能再一次集中，農業生產力就不能發展。加上這幾年農田基本建設的破壞，水利灌溉的失修，將使水災旱災再一次嚴重地威脅農業生產，因此中共「農村改革」面臨改弦更轍應是未來幾年之內的事。

²⁶見註②。

◎香江話題◎

中共英國為香港 明年開選宣判死刑

■章 名

從中共的政治性格大概可以推測，香港未來仍會比今天的殖民政制民主，但須在中共「領導」下「循序漸進」

鄧小平在香港人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忐忑不安，明年應否開放議會普選的爭議漸入高潮的關鍵時刻，透過香港基本法全體起草委員所作的鎮驚、定調談話，是反自由化以來對最高政策，包括對台灣問題最詳細的闡述。

殖民主義者的「孤臣孽子」 頻頻興風作浪

對於香港人來說，鄧小平談話中最重要三點是：一、超越中（共）英聯合聲明中香港社會經濟制度五十年不變的保證，將不變期延長五十年，即至二〇九七年。二、懷疑普選必能產生既愛香港又愛中國的治港人選。即使要普選，也應如新任的港督所說：「循序漸進」。三、鄧小平據稱並不贊成「三權分立」，有人視為針對香港而言。官方紀錄中沒「三權分立」一詞；但有「香港的制度：如果完全照搬英國、美國的議會制度，以

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之語。

第一點的延長五十年不變自然被視為平息香港人新疑慮的保證，也自然贏得香港人普遍的欣喜。唯一聽到的保留是，只看眼前三、五年的香港人，更希望先落實頭五十年不變，其後到時再說；而從法制角度出發，鄧小平既能延長不變的期限，希望不表示此期限本身就可以改變的，臨時縮短在內。

緊接著鄧小平發表對香港未來的「重要」意見，此百年來首見的政治春天，掉進了又一個低壓槽裏。這次風波的始作俑者是香港最高決策機構「行政局」的首席議員鍾士元。不過，相當能反映香港近年勢力變化的是，這位對英國女王九十度鞠躬的華人爵士，在中（共）英談判前夕奉香港議會精英首次上北京向鄧小平面陳意願時，曾被鄧氏直斥其為殖民主義者的「孤臣孽子」。今天，爵士先生對六百萬市民發表的言論，却與中國近日一再表示的意見並無異致。

「八八年直選派」和 「建制派」爭持不下

鍾士元在鄧小平對香港基本法全體起草委員宣佈延長香港不變期限五十年後一週的四月廿三日，公開發表下列在海外和台灣聽來有點難以思議的「個人意見」；香港並非主權國，因而中（共）、英政府的想法較香港的民意更重要。香港是還政於中（共），而非還政於（香港市）民。故香港的政制發展必須受中（共）英聯合聲明的規範。香港多數人的意見不一定可行及被有關方面接受。例如，香港民意贊成恢復死刑，但受制於英國法律而無法成事。

在香港的殖民政制中，行政局有若由政府內閣邀請名流富豪合組的內閣擴大會議，權限遠高於作為議會的立法局，內部運作亦從不對外公開。行政局正是這次政改民意的事後評審機構，身為該局民方首領的鍾士元亦非輕率之輩。爵士與鄧小平的唱和，也就很少人相信其一如鄧小平，純屬「個人意見」。

殖民政府目前正按其下放權力的政制改革計劃，為應否於明年開放「中央」級議會立法局部分議席供市民票選，收集民意，預定年底作決。而關心人士為此形成力主明年上馬的「八八年直選派」和擔心開放「過急」有損繁榮安定的「建制（ESTABLISHMENT）派」，爭持不下。正待民間發表意見的關鍵時刻，先是新任港督衛奕信就職禮上為政改定下「循序漸進」的基調，一週後強人鄧小平為這位英國駐港代表打氣，並懷疑普選在香港是否適用。又一週後的今天，香港「非官員」中的第一號政壇人物進一步闡述類似看法，豈是巧合！較合乎常理的解釋是：英國人當初的確想遵循其一貫的殖民地撤退政策，

還政於民。不料這次碰上了強大得多、且市場令其垂涎的主權國。後者將此視為侵犯主權的行為，予以堅拒。可是，倫敦對香港人的政治期票已經開出，且已引發了一些青年才俊的參政熱望，無法臨時扯下紳士的面具以背信，遂只好在徵求民意的前台，致力給「民主派」潑冷水，藉此告誡六百萬人「識做」（識相）；自動收斂，希望因此收集到的民意，與北京堅持而倫敦欲拒無從的少變為上原則，大同小異。基此，則倫敦既順從了大主子，又維持了對香港人的承諾，本身得以光榮撤退，皆大歡喜。

英國的殖民統治， 造成香港人苟安

無可否認，英國聯合當地士紳，避免高壓的文官殖民統治，的確比其他殖民及帝國主義者為高明。更適值中國長期劫難，此間眼看海峽兩岸差強人意的六百萬人，以享有人身保障，經濟生活自由的殖民地為樂土。故對於絕大多數香港人來說，最白的就是因變動而失去現有的上述權利。北京的「五十年不變」承諾，正是針對香港人這種心理。而出於同樣的心理，不僅是中上層既得利益者，連部分下層的普羅大眾對於開放政治是否會損及繁榮安定，也有類似的疑問。年來民主呼聲叫得最響的是青年專業人士為骨幹的政黨前身「論政團體」，以中下層為青年服務對象的非左翼工會、社會工作者團體、部份青年學者、大專學生、個別議員。積極參與爭論，經常見報的，也就是那麼幾十個民主派和建制派辯士。市民或會以政爭為話題，卻無意如台灣一般，投身參予。「沈默大多數」的意願，事實上仍是一個謎。然而，香港人一則恐懼未來而倍加珍惜現狀，更加上社會極度功利，一切以賺錢享樂為依歸，



- 中(共)英談判, 決定了1997年度香港的命運, 也結束了香港從鴉片戰爭以來的殖民地經驗

小市民不一定願意追隨民主派。相信正是深諳香港社會的這個本質, 鍾士元開口後, 第二號親英政壇權貴, 立法局首席議員鄧蓮如即呼籲沈默的大多數踴躍就政改發言, 以免喊得最多最響的成了當然的民意。

中共在政治上 對香港將一緊一鬆, 民主遊戲 只可在這個佈局中玩

毋庸諱言, 歷經衛奕信、鄧小平、鍾士元、鄧蓮如的連串告誡, 無論官方如何否認, 一般相信, 八八年直選的「民意」當局其實已有定論。公開的收集評審工作不過是台灣所謂的「政治秀」。(按: 香港按粵音, 將「SHOW」譯為「騷」, 似更傳神。)

民主派雖欲力挽狂瀾, 已回天乏術, 從其言論中可以看出如今只能, 夜行人吹口哨, 自我壯胆。為此所提供的解說包括: 鄧小平只是個人的意見; 鄧先生語氣含糊, 並未完全否定普選; 普選不一定是指香港所談的直選; 鄧小平不贊成三權分立, 並非針對香港而言; 略過鄧小平對英美政制和普選的批評, 斷章取義地強調其「切合實際, 根據自己的特點來決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一語, 以此為民主派打氣。此外就另有呼籲市民和當局勿因此而受影響, 如常就開放政治發表和收集意見, 並以「愛國愛港」的治港人選首要標準稱, 指定選某種人的普選沒有真正的意義, 而香港人多支持香港歸還中國、「四個現代化

」和落實中(共)英協議, 已可算愛國愛港。

不過, 這並非說, 民主派自此「玩完」(完蛋)。北京不欲明年直選, 原因是不欲在基本法九〇年定稿前, 被英國人搶先改變政制, 以既定事實「侵犯主權」。基本法大定後, 迷戀主權的北京放下心頭大石, 態度也許反較「寬鬆」。北京已多次表示, 不排除九一年後直選的可能性。可是, 民主派擔心, 愈接近九七年, 北京對香港的影響力將愈大, 到時更難爭取, 故開放政治「千萬年太久, 只爭朝夕」。雙方的這種意識差距, 造成了年來的明爭暗鬥。

從中共的政治性格大概可以推測, 香港未來仍會較今天的殖民政制為民主, 但政治的開放過程須在中共「領導」下「循序漸進」, 即只能是自上而下的恩賜而非香港人自發爭來的權利。從有開明之稱的副總理萬里也不能接受天賦人權的觀念, 即可了解, 中共自視為一切權力來源的封建積習, 在可見的將來無可能糾正。六百萬入欲向十億人之上的這個政黨爭權, 無疑天真得可以。中共此中擔心的只是, 香港萬一搞僵, 一則動搖國際信心, 更無以吸引台灣循「一國兩制」來歸。為此, 中共在政治上對港將一鬆一緊, 然可不鬆則不鬆, 民主遊戲只能在這個佈局內玩。這也就是威權式政黨的慣例。只不過在香港的例子中, 地方上與中央的對比過於懸殊, 且人口過密, 毫無生活資源, 因而自治高到何種程度, 基本上取決於中央的恩賜。



• 在「越戰獵鹿人」片中的「俄羅斯輪盤」，可以意味美國人的越戰夢魘症，更反映美國人的恐共心理。

為什麼反好萊塢

■王墨林

電影自從被美國愛迪生發明出來以後，到如今已變成一項重要的意識型態表現工具，這大概是當初發明人始料未及的吧？其實，電影的本質跟所有的藝術類型一樣，充滿了功能上的多樣性；在藝術家手中是藝術，在資本家手中則可以變成商品，若在革命家的手中卻變成了武器。

好萊塢是宣揚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意識形態與世界觀的工廠

電影史上潮流的產生，從蘇聯的蒙太奇美學創造，德國表現主義到義大利新寫實主義，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社



• 「第一滴血」的藍波，是美國人在現實世界無法找到的英雄。為失敗的美軍對越共報復，重獲在第三世界失落的美國神話。

會狀況，經濟體制，國家之間的相互關係。在資本體制下通過商品目的而生產出來的藝術，結果還是體制存在決定了意識型態，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以拍個人電影起家的導演，一旦加入好萊塢行列之後，也必得對觀眾諂媚起來的原因。

衆人皆知好萊塢是製造夢幻的工廠。所謂「夢幻」，就是宣揚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意識型態與世界觀，其目的是為了保證資本家的投資、市場控制、以致獲取利潤。這一套經營之道，在以美國爲主的國際資本體系之內的好萊塢電影市場中，表現得尤爲透澈。假若電影工業反映了經濟與社會之間的生產關係，那麼「好萊塢電影」這個名詞已不再只是代表「娛樂」的意義了。「越南大戰」、「越戰獵鹿人」、「殺戮戰場」、「前進高棉」等一系列右翼反共主義電影的製作，充份說明了好萊塢電影可以被利用來製造現代神話；從不反省美國爲什麼「將本國士兵送到幾千里外，去代替亞洲士兵所應執行的任務」（美國總統詹森語），只是一味地在指責戰爭的不義，倒使人誤以爲美國人是受害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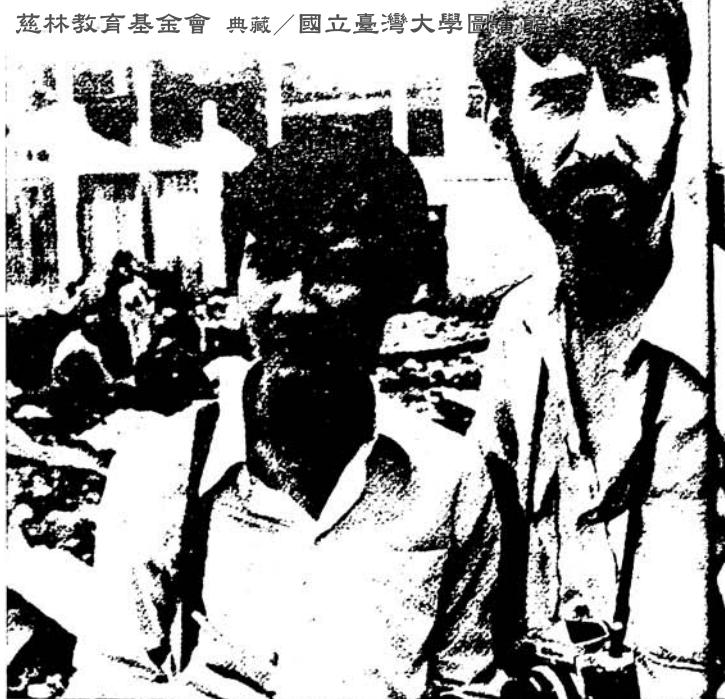
在一個人權還繼續被剝削的社會，大談「爲藝術而藝術」是把藝術問題形而上化了

在一些文化已被殖民主義化了的第三世界國家裡，知識份子喜歡談「藝術中立論」、「爲藝術而藝術」這些似是而非的論調；具體地說，這些論調就是蔑視有關表現民族的問題，若是在一個人權還繼續被剝削狀態的社會大談特談「爲藝術而藝術」，終究是把「藝術存在」的問題形而上化了。這種無意識的產物，其實佈滿了知識份子自我設限的束縛和妥協，即使說是個人主義風格的追求，也是從布爾喬亞沒有生命力的意識型態中產生出來的。

還有一些藝術家喜歡自稱「社會派」，但是，從他們擅用「體制」與「創作」二分法的手段，可以發現到他們的作品含有許多意識型態上的矛盾，仍然不放棄布爾喬亞的世界觀，結果就不得不表現出資本主義的思想，譬如：不排除跟商業主義妥協的做法。製片人認爲好不容易籌足了資金，大伙兒又花去大量的力氣，就是爲了讓一個人在銀幕上說一些不滿現實或對生命苦惱的話嗎？所以我們必須相信「體制」與「創作」是有對應關係的，只有重新辯證這個互賴關係的矛盾，作品才能將原來的曖昧性蛻化而成真實的反映。

反映真實的作品蘊藏著創作者豐富的自覺能力，這是因爲生活經驗超越於理論而產生的必然性。建立於個人生活經驗之上的觀點，正是個人對社會了解的媒介，通過人是社會關係總和的辯證法，進而轉化成爲集體經驗。我們從鶯歌的陶藝，或三義的木雕，都可以看到那些藝品的風格已不單單是匠人的個人風格，同時也刻劃著群體精神的痕跡。進步的電影也應該是這樣，在作品主題的深處，我們看到一個能夠代表群體的人的氣息在吹動，而不是

• 「前進高棉」濫用太多的感性觀點詮釋美軍是戰爭的受害者，卻忘了詮釋美軍為何千里迢迢跑到人家的土地上去殺越南的人民。



一種自愛自憐的個人主義情緒在催情，這種催情劑反而使個人特定的創作力窒息或混亂化。

對電影工作者而言，所謂「觀眾」只不過是票房的代名詞罷了。

前面提到電影在資本家手中可以變成商品，若在革命家手中卻變成了武器，不管是商品或武器，都應該有直接面對的對象。商業電影是為誰而拍？藝術電影又是為誰而拍？誠然答案一定是所有電影都為觀眾而拍，但是電影工作者眼中的「觀眾」只是一個抽象的名詞，甚而只是票房的代名詞，對電影工作者而言，假若根本不關心大眾的苦樂在哪裡，所謂「觀眾」永遠只是一個抽象的名詞而已。大眾提供素材給電影工作者，使電影工作者的創作不至流入「象牙塔」，電影工作者從大眾那兒得到對本土文化的洞察力，進而創造出「觀眾」真正想看的電影。

大國的殖民主義文化為了能夠深入人心，它不但用意識型態的支配法來破壞代表群體精神的本土文化，更抑止了它進一步的成長，結果本土文化不是衰退就是停滯。好萊塢電影掠奪的不只是我們的電影

市場，還有破壞我們人民的文化個性。當好萊塢電影把電影的價值觀定位在社會與經濟的生產關係上，電影變成了消費品，為了培養觀眾的消費主義態度，電影可以刺激官能，可以娛樂官能，更可以戰勝官能，尤其利用了商業主義的配給網，無遠弗屆地把這種官能主義的好萊塢電影意識輸送到第三世界國家的大小城市。

大國懂得利用意識形態代替軍事支配第三世界而且來得有效。

我們大概已經知道有一隻白毛手在推動我們的人民去看電影。大國喜歡強迫第三世界學習他們所謂的文明生活的模式，甚而以這樣的心態從事於對第三世界文化的支配，「美利堅帝國」（王友仁譯，萬年出版社）一書提到「……在美國掀起的流行或狂熱，藉著電影，於數星期內即傳遍全世界。因此，美國的價值觀念迅速的在擴散，這些當中當然有良莠不齊。在不斷的標榜美國的生活方式中，美國影片有意無意的批評態度上，都不會忘記誇張的炫耀其生活水準之高，以及一般人民如何沾受其惠……」大國從對第三世界控制的歷史經驗中學習到用意識型態代替軍事的

- 「殺戮戰場」企圖闡明共產政權與人民被殺之間的連鎖關係，而沒有點明動亂的第三世界政權是由兩大霸權的矛盾所造成。

支配，因為軍事支配並不比對大眾的意識滲透更為有效地獲得勝利。

意識型態的支配，通常是從中心呈放射性到週緣部份，城市裡的布爾喬亞階級就是屬於被支配的週緣部份。他們過著非常強烈的個人主義的生活，並且要求社會的運作能夠配合自己的利益，另外一面，城市布爾喬亞為了填補管理社會中被單一化、均質化之後的疏離感，急於在社會上找到一個被認同的定位，於是，接受被支配的意願在無形之中就產生出來，因而他們對於國際資本主義文化，也就是流行文化的抵抗力顯得較為薄弱，甚至是免疫的，這樣的布爾喬亞性格才是促進資本主義

電影工業活潑化的重要功臣。

進步電影中的美不是目的，而是媒介，才使意識形態呈現更有力。

我們的社會上另一個階級的大眾，卻因經濟的理由，沒有能夠享受到消費主義生活的可能性，加上他們自覺的階級意識，因而凡是與自身階級生活樣式對立的文化，都可能引起強烈的抵抗。有的電影在中產階級之間導致的功能，與在另一個階級之間導致的功能完全不同，譬如：在知識份子居多的台北所上演的「台灣新電影」票房，與在勞工階級居多的高雄所上演的「台灣新電影」票房大為不同，兩者之間的差距來自於文化感受的水平不同，這也是美學上的分歧點。

不同意義的美學負起不同機能的責任，譬如：社會主義對勞動人民的歌頌，或第三世界對反帝國主義的禮讚，都可以說是為了表現革命行動而創造出的美的概念，然而進步電影中的美不是目的，而是媒介，只有通過對「反帝國主義的禮讚」這種美的渲染，才可以使內容的意識型態呈現得更為有力，並且進一步提出與布爾喬亞電影美學對立的主張，我們在中國卅、四十年代電影及近年第三世界的許多電影確實看到了這樣可觀的成績。

戰後快速發展的半邊陲資本主義的台灣，產生了環境破壞，價值喪失，農村破產的「現代化」，進步的知識份子認識到，本質上受制於大國的第三世界的政經體制，正是使台灣一步一步喪失自己文化個性的癥結。為了發展出有自覺能力的本土電影，實有必要反對滲透著大國殖民主義文化的好萊塢電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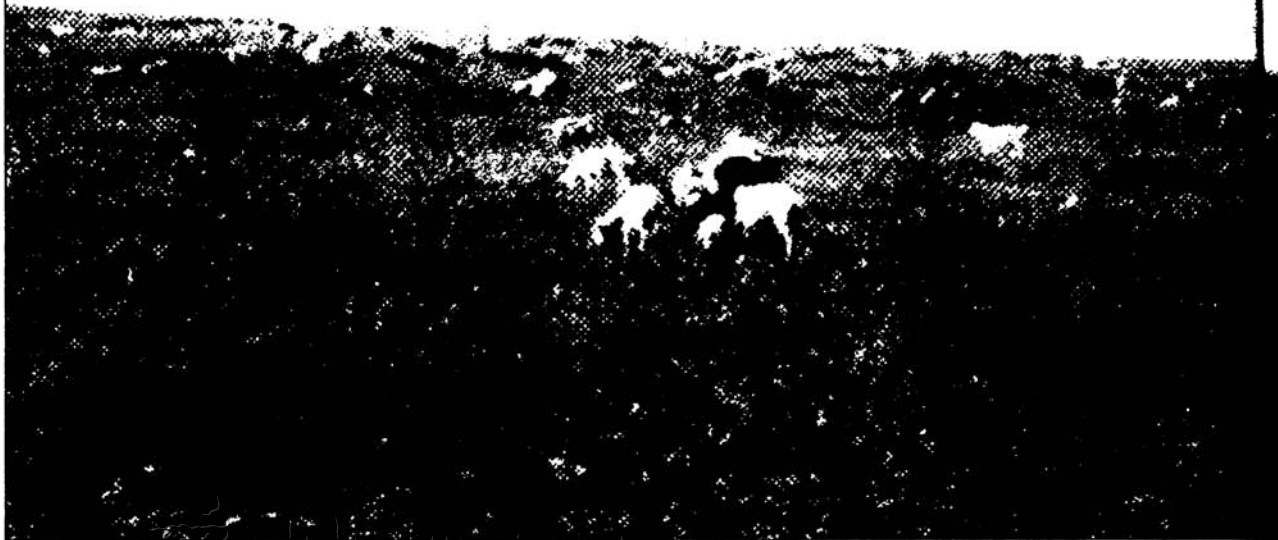
- 獲坎城影展最佳影片的「教會」，表面上看是表揚西方贖罪的宗教情操，事實上，這部電影又剝削了一次中南美洲的少數民族。



◎文 藝◎

台灣人看草原 (上)

■陳若曦



青色的城市

生長於海島的我，自小嚮往塞外風光。中學時代，地理老師敘述到「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情景，曾使我感動得心潮澎湃，浮想聯翩。椰子樹下，我常做白日夢，一個人臥遊大漠南北；跟隨彎弓射大鵬的馬上英雄，馳騁於浩瀚如海的草原上，無邊無際，與天地合而為一。連徐霞客也不會出塞，我便想當一名行腳僧，但願自己有雲遊到漠北的一日。

八五年八月終於得償夙願，和一批台籍作家拜訪了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

若不了解這塊土地的地理和歷史，單從外觀，人們怕難以理解蒙古族同胞喊它為「青城」的意義。比起南方，這裏樹木稀疏，也不見一塊像樣的草皮。然而呼吸了幾口乾燥的空氣

後，不難發現，這裏生長的每一棵樹是多麼珍貴。城市建築單調平板，類似內地新興的中小城市，缺乏民族特色。比較引人注目的是市中心的博物館，帝俄式的大圓頂上有駿馬飛躍的雕刻，令人想到北朝鮮的千里馬。許多醫院學校都是火柴盒上加蓋瞭望塔式的建築，蘇聯影響很深。新近完成的觀光旅館則是西式高樓大廈，院內加蓋個蒙古包，總算聊備一格。

參觀了呼市的舊城，低微簡陋，殘破不堪，可以想像「無風三尺土，下雨滿街泥」的景像。對比之下，新城公路筆直，公園寬闊，影劇院、圖書館、體育場……應有盡有，今日的城市面貌，實在得來不易。

青城是土默川上最大的城市。土默川是包括陰山以南、黃河之北，東起大青山，黑河流經其間的三角洲沖積平原，古稱敕勒川。北齊詩人斛律金對這片沃野的形容「敕勒川，陰山

● 健美的蒙古姑娘在作民族舞蹈的巡迴公演。

• 蒙古人在「套馬」。



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乃成爲千古絕唱。

肥沃的土默川堪稱歷盡滄桑，自古便是兵家必爭之地。經過歷代的開墾征戰，王公掠奪，水旱盜匪……到了本世紀中期，它已跡近廢墟。三十多年休養生息，特別是黃河治水，植林防沙，才有今日田連阡陌，城換新裝的局面。

這裏也是多民族建立政權的地區。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東胡和漢族都曾留下足跡。戰國時代的長城，在陰山之顛。明朝把此地稱「歸化」，本身便有漢族沙文主義意味。清朝在它旁邊建築新城，取名「綏遠」，仍是安撫之意。更有甚者，滿清實行民族隔離政策，內外蒙古分而治之，種下本世紀版圖重劃的肇因。國民政府時代，新舊城合併稱爲「歸綏」，直到一九五四年，應蒙族人民意願才改回原來的呼和浩特名稱，

並積極擴建。可見，城市的新名和新貌，也是新民族政策的結晶。

召廟和昭君廟

蒙古人信仰喇嘛教爲多，他們的歷史和文化也充分反映在留存的召廟中，它們是古蹟，更是中國古典建築的精華之一。

我們參觀了土默川上最負盛名的大召廟，明代叫弘慈寺，是萬曆年間造的木構建築——城名「歸化」，便是這時取的。如今只留存了山門、佛殿、經堂等幾處遺跡。經堂殿內用巧妙的（偷樑）減柱法，給人室雖小却空間加大的感覺，想見當初的營建是頗具匠心的。四百年前用銀鑄成的釋迦牟尼像，至今仍完好無恙地保存在殿內。爲此，弘慈寺又叫銀佛寺，又稱爲大召廟，連帶地把城市也稱召城了。

舊城內有座白石和青磚砌成的金剛座舍利寶塔，高台上建了五個小塔，又稱五塔。它是雍正年間建的，寺廟早已傾圮拆除，五塔能保存下來，真是奇蹟。

從建築和雕刻看，五塔都是美侖美奐。金剛座下部鑲嵌著磚雕的五種動物圖象和金剛杵圖案。座身分七層，頭層以梵、藏、蒙、漢文刻金剛經全文。其它六層鑲嵌著磚雕佛龕、龕內雕個佛像，共有一千一百一十九個，稱千佛。寶座南面開卷門，嵌了許多佛經故事的圖案浮雕，匾額用蒙藏漢三種語文刻出。金剛座上方是大塔，四角上建小塔，用以代表金剛界的五部。

•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最有意思的是塔後的照壁，上面嵌了三面線雕石刻，其中兩幅宣傳教義，東面為天文圖。東面圖是根據雍正三年（公元一七二五年）欽天監製的天文圖刻成，也用三種文字說明。上面刻了各個星座，用星的大小來標示等級，另用蒙文標出十二宮天干，廿四節氣，三百六十萬方位度和廿八宿的名稱。據說，這是目前僅有的一幅蒙文石刻天文圖，彌足珍貴。

導遊說，這種佛塔建築受印度影響，在中國只有五座。其他四座是北京碧雲寺、西黃寺和真覺寺，以及昆明的妙堪寺。

呼市附近召廟很多，目前香火不斷。我們所到的廟宇，信徒奉獻的哈達琳琅滿目，獻金盆裏也堆滿了錢鈔。喇嘛很少，都是文革倖存的老僧人，情況基本上和內地佛寺類似。

看到此地廟宇保存之多，瑰麗之至，我深為蒙族同胞慶幸，但也不無感慨。以當地的自然資源和經濟條件，它們的營建實在奢侈。以往宗教的鼎盛，以及政治的操縱籠絡，也可見一斑。

一個民族的延續和發展，常和宗教有密列關係。猶太人和猶太教是顯著的例子。但宗教信仰若走火入魔，不免畫地為牢，甚或有自毀長城之險。

喇嘛教的興旺，相信與統治階層的愚民政策有關。人力物力都投入宗教活動，自然便於他們操縱奴役。以往，蒙族家家有男子當喇嘛。根據四十年代的一項統計，一個旗的青年男子，七成當和尚。如此衆多的青年男

子不事生產和生育，整日念著不知所云的藏文經書，難怪人口銳減，文化發展遲滯。當然，文革期間，強制宣傳無神論，又是破壞信仰自由的違憲做法，所謂「過猶不及」。現在提倡信仰自由，宗教活動也有所改善，顯然比較合情合理。

離開呼市的前日，我們拜謁了久仰的昭君墓。

這是一座高達三十三米的大土丘，頂上佇立一個青瓦紅柱小涼亭，四周種植樹木。氣候關係，這些樹木矮小稀疏，但比其他地方枯黃得晚，因此人們又把黃土堆喻為「青塚」。

墓前整建得非常雅緻，有介紹王昭君事迹的展覽館和賓館，楊柳千行，花木扶疏。正當啤酒花開，一片燦爛金黃。遊客如雲，包括中外人士，果然是民族和諧的象徵。

我向來佩服王昭君的成就。李白、杜甫的詩咏，戲曲如「漢宮秋」、「昭君出塞」和歌曲「王昭君」等，把她別離漢土時描述得悲悲戚戚，悽慘無比，從來引不起我的共鳴。我以為，它們太違背史實，也不合乎女性心理，而是男性沙文主義和民族狹窄心理的反映。

●昭君墓是民族和諧的象徵。

●蒙古姑娘身著民族服裝的騎馬英姿。



●大草原上肥壯的綿羊。



根據「漢書」記載，匈奴王是自願招親，漢皇乃「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闕氏」。「待詔」說明她尚未和皇帝成親，能避免白頭宮女的厄運，沒有女人會悲傷的。她是單于的第六任闕氏（妻室），為他生了一個兒子。娶她之後，單于未再冊立闕氏，看來婚姻是成功的。婚姻幸福能使一個女人容光煥發，永保青春，而且人見人愛。單于死後，繼任的單于又和她結婚，生育二女，全載入史冊。昭君的魅力，且不提民族和諧的貢獻，本身才更該是文藝題材。

曹禺的「王昭君」雖然是為廿世紀的民族政策吶喊，到底比較符合史實。

參觀青塚時，據說呼市正在興建「昭君酒家」，我們這些台灣人聽到「酒家」，都為昭君喊冤。在台灣，「酒家」是花天酒地的道地花月場所，與內地把餐館兼旅店喊酒家，自不可同日語。

二上草原

我們都是初到內蒙，迫切要瞻仰草原。到達呼市的次日，一早便乘了一輛小巴士向北出發。

首先越過大青山，這是大黑河的發源地，可惜已有名無實，滿山光禿禿，半天見不著一棵樹。導遊說，背蔭處有些樺樹，但我一路極目搜索，始終沒見著。

當地老喇嘛說，六十年前，山上還有不少樹木。一個甲子而已，青山已現禿頂，人為的破壞不但迅速，而且難以彌補。

夏天是此地的雨季，此時的黑河，水位並不高。據說，到冬日，便整個乾涸。它是土默川的生命線，也是黃河的支流。大青山已成這樣，將來黑河難免變成小溝。

車過武川，一路所見房舍，許多是低矮的泥屋，毗鄰豬羊圈，泥牆土門，叫人想起出土的先秦陶塑，另有一份原始古拙之美。

到錫拉穆仁蘇木之前，巴士馳騁在一片曠野裏，無道路可尋，全憑司機隨意闖蕩。曠野無邊無際，沒有人煙不說，連一棵樹、一塊石頭、一頭牛羊也望不見。

「什麼時候才到草原呢？」

有人已不勝翹首企盼之苦。

「這就是草原。」

導遊的說明引發一陣錯愕和驚訝

這就是草原！大家都把臉貼緊玻璃窗，睜大了眼瞧著。白雲起處，天地相接，果然是「天為穹廬，籠蓋四野」。然而，不必風吹，草已低到只有寸土把長光景，近觀只見草埂，遠看才現淡綠一片。也許是草原退化，而古代的牛羊長得矮小，再加上詩人的誇張手法，竟讓我這個島民單相思了幾十年。

「看到牛羊啦！」

汽車走約半小時，右邊地平線上終於出現了牛羊群。司機連忙轉向趕過去。靠近時，眾人紛紛下車，拉開快門，趕緊搶鏡頭。那一份欣喜，倒像迷途的羔羊找到了牧人。在美國，不知看過多少長相一樣的牛羊，但千里迢迢到草原尋覓，感受却迥然不同

以後又碰到馬群和羊群，我們都駐足觀看。沒見到牧人，只有牧犬擔任警衛。這些牛馬不畏生人，挨近了也不躲避，只以馴良友善的目光迎送往來的客人。

我們這些海外遊子都做過在草原上打滾的夢，幻想以草為枕席，仰望白雲蒼狗，作浮想聯翩。夢想雖然不能完全實現，但親自在草原上走走，很快就萌生了謙虛和敬仰的感情。草厚寬廣無邊，赤誠坦露，像大地母親的乳房。儘管因為哺育子女而被吸得乾癟，却仍無私無憾地繼續奉獻。這份寬容和慈愛，本身便是至美至善。

因為心懷虔敬，我踏在草原的腳步，一下子變得輕柔而腴腆。我唯恐自己的闖入，會驚擾了她的生息，甚或褻瀆了大地的神聖。走在草原，特別能體會到，什麼叫渺小或永恒。

石頭和茶

如果事先徵求旅客的意見，說要坐車兩小時去看一堆石頭，相信沒有人會答應。然而在草原上奔馳這麼久後，到了敖包（蒙語石堆）跟前，大家莫不刮目相看。趕緊跳下車來，傍著石堆留影紀念。

草原上，石頭的稀小僅次於水，能堆成十來丈高的台子，確為壯舉。它像三個圓磨疊在一塊，底大頂小。頂上插根木桿，牽線到底座，可以貼布條和紙旗。台前砌有石灶，可以燒柴或牛糞，舉行火祭。蒙族認為火最潔淨，可以驅邪。

敖包原先是路標，以後演變成行



政區的劃分，也是牧民祭祀的場所，除了火祭，也用鮮奶和奶酒做酒祭，或宰殺牛羊為血祭。

水草豐美的六七八月，是祭敖包的時節。我們看到繩上掛滿了五顏六色的紙條和布條，迎風招展，為藍天和綠地塗抹色彩，也給未來編織了夢幻。

傍著這烽火台似的土堆，四望茫茫草原，天地悠悠，真有一份「遺世而獨立」的寂寥肅穆感。這時耳邊忽然響起「相會敖包」的曲調。想到依靠的是情侶約會的柱石，這冷硬的塊頭頃刻化為繞指柔，似乎溫情脈脈。它是菩薩心腸的月下老人，不知默默地撮合了多少美滿姻緣。

敖包更是草原歷史的見證者，閱盡人事滄桑和政權興衰，如果石頭能說話，它必能為這個民族譜出一首首

●文藝宣傳隊的
青空演奏會。
這是草原上的
牧民莫大的娛
樂。

●大草原上的賽
馬大會。



的史詩來。

這堆石頭令我徘徊留意，不是旅程倥傯，真捨不得離它而去。

當天，我們在專為旅客設置的蒙古包內過夜。草原的氣候，早晚溫差變化大。我們這些南蠻子缺乏準備，禁不住朔風一吹，半數人感冒了。詩人的妻子病情嚴重，還為此提前結束

了旅程。

蒙族導遊請我們去他家做客。原以為是蒙古包，去了才發現，竟是傲然獨立於草原上的一棟磚瓦平房。一溜三間房，只開中間一扇門，其它兩房的窗戶很小，兼顧到採光和保暖，院里搭了一座蒙古包，據說是老年人和族友來訪住的，他們習慣了席地而臥，並不羨慕漢式的熱炕。

老奶奶把我們一行讓上了炕，端來糖菓和滾熱的奶茶。鮮奶和磚茶熬成的飲料，可以攪糖或鹽，非常解渴。人到了草原，會覺得口舌乾燥，喝桔汁或可口可樂均不解渴，反而膩喉。奶茶清淡，可以連飲數碗，解渴外又療飢消乏，最是實惠。

這家人雖然放棄了逐水草而居的生活，蓋房子時並不考慮衛生設施。主人指著四周的廣大天地，請客人隨處方便。這種時候，我們才體會到，馬上民族何以設計了行走時拖拉絆腳的長袍。原來蹲下時，可以遮得四平八穩，果然方便。

既到草原，總要領略騎馬和駱駝的滋味。習慣了行車和坐船的南方人，這方面只有擺姿勢照相的能耐。騎坐尚且戰戰兢兢，遑論馳騁！

倒是吃了一頓據說是道地的涮羊肉。肉片切得厚厚的，筋絡不剔。我牙不好，根本嚼不爛，全囫圇吞下。涮羊肉的氣氛別具風味，房內席開四桌，蒙漢群聚，煙霧蒸騰，大口吞肉，大碗喝酒，頗有水滸氣派。

這批台灣作家都很高興見識了漠北風光，聲稱於願已足。只有我不死心，發願繼續尋找水草豐美的地方。

◎文 藝◎

鄉土文學論戰

10週年的回顧

—訪陳映真 ■本刊整理

今年是鄉土文學論戰十周年。本刊特別訪問了當年論戰的主將陳映真先生，就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十年來台灣文學的發展及台灣文學與作家的定位問題，發表看法。因陳先生出國，訪問稿未及經陳先生過目，若有錯誤，由本刊負責。——編者



問：鄉土文學論戰發生至今已十年，論戰發生以前，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七〇年左右的台灣文學，其一般狀況為何？

進步文學年代的來臨

答：鄉土文學論戰其實是一九七二年現代詩論戰的延長。回顧歷史，一九五〇年是台灣文學發展的轉捩點。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〇年之間的台灣文學，有著超乎我們想像之外的豐富性。葉石濤在「台灣文學史綱」中，便多少呈現了當時文壇的狀況，讓我們得以瞭解當時台灣現實主義文學的批判性與諷刺性。另外，應該格外加以注意的，便是當時左翼政治運動對文學、藝術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譬如，曾經在台北中山堂演出而轟動一時的舞台劇——牆，便是優秀的文學青年簡國賢的嘔心力作；還有，在五〇年代初期蒙難的台灣青年郭琇琮，他以現代劇場方式演出改良後的「白蛇傳」，批判封建社會的鄙陋，非止獲致大家的讚賞，同時在展現社會進步意義方面，也具備著歷史性的豐富意涵。這個階段的文學，一般而言是針對台灣社會的不公、不義，展開強烈的批判。

後來，許多作家却因涉及政治問題而遭整肅。監禁的監禁；槍斃的槍斃，一個進步的年代，漸漸隨著高壓、整肅的雷風厲行而告湮滅。

在經過殘酷的政治肅清所留下來的血腥的土壤上，美國新聞處播下的種子開出了現代主義文學這樣蒼白的花朵。

降至一九五〇年代，就在韓戰爆發，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後，許多左翼的，或是比較干涉生活的，進步的文藝工作者都遭受到嚴酷的迫害。這個「政治肅清運動」的慘烈實在遠遠超過了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變。換句話說，台灣被編入兩極對立的戰後國際冷戰體系，在這個整編的過程中，經歷了一場相當血腥的、慘烈的逮捕和監禁。在經過殘酷的政治肅清所留下來的血腥的土壤上，美國新聞處播下的種子開出了現代主義文學這樣蒼白的花朵。現代主義的來源還包括詩人紀弦，把法國所謂象徵主義的現代主義介紹到台灣來。我們也知道，現代主義最初發生的時候，有它一定的進步性。

● 陳映真近影。



它可以說是一九三〇年代對於第一次歐戰後的世界資本主義的幻滅，因而，展開了對十九世紀樂觀主義與中產階級平庸社會或破產社會的一種反叛。可是到戰後的一九五〇年現代主義却變成完全沒有思想、沒有歷史、沒有生活，只醉心於挖掘內心葛藤的文學。這樣的文學經過打折後，被輸入台灣。我說「經過打折後」，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說，在戰後的一九五〇年代，整個第三世界也受到現代主義的影響。然而，因為第三世界在戰前都是西方殖民地，能讀原典的知識份子遠比我們多而且優秀，他們的殖民地歷史短則百年，長則兩百年，甚至四百年。所以法語、英語、西班牙語對他們來說，已經是非常嫻熟的語言。當戰後的現代主義興起，第三世界的知識份子可以直接閱讀原典，比如說T.S. 艾略特的「荒原」或者像喬埃斯的東西，他們都讀得很熟。而台灣不是，台灣的殖民歷史短，還有我們是日本的殖民地，五十年的統治過程中，我們的抗日派搞的是現實主義的文學；我們的妥協派只有少數人才經日本搞現代主義。因此，我們對西方語言完全沒辦法掌握。當時所謂現代派的營養資料，

差不多都是口傳耳聞，很少很少人可以讀現代主義的理論著作或者是文學著作的原典。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發展出來的現代主義文學，是有一定的政治經濟學的意義；就是說，在巨大的恐怖以後，台灣過去的干涉生活、現實主義的文學受到很大的打擊。

歷史的斷層，傳統的失落

這種不干涉生活的、逃避的、沒有歷史的現代主義，於是成為政治恐怖背景下非常好的逃避出口。因此，台灣從五〇年代到七〇年代，受到以美國為中心的所謂「現代主義」的支配，長達二十年。這種情況在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怎麼樣呢？我想現在我們都很清楚，就是在六〇年代中期以後，第三世界文學開始展開重大的反省運動，今天比較重要的第三世界作家在六〇年代就已經寫下非常重要的作品。他們能進能出，一方面對西方現代主義非常熟悉，另一方面能隨著祖國的命運，為了國家獨立、民族解放而鬥爭。他們能認清具體的現實生活，發展出具有自己風格的，色彩鮮明的反帝、反封建的第三世界文學。在學術思想上也是一樣，「依賴理論」也是六〇年代中期以後的產物。總而言之，在其他第三世界國家裏，因為整個二次大戰時的激進傳統沒有斷絕，所以他們的反省力還存在；因而，很快的，他們便以這股反省的力量，建設起民族主義的，反帝的、反封建的文學。

反觀台灣却完全不一樣，台灣的時代錯誤長達四〇年；從五〇年代到七〇年代，台灣文學一直受到強權的支配。三、四十年代那種批判的、干涉生活的，革命的中國新文學，因為政治上的原因也被切斷，造成歷史的斷層。這個臍帶的切斷，使得台灣現代主義找不到傳統，却透過當時台灣美國化的學院進口很多唯心主義的文學，來彌補台灣現代文學上失落的傳統。

在長長的五〇年代到七〇年代之間，我們的音樂、文學，包括小說、詩歌、戲劇，便全面地受到西方所謂「現代派」的影響。造成這影響的原因之一是由於我們對西方的原典並不是很清楚，只能生吞活剝。例如：我本身當時也涉獵存在主義或其他各種主義，但瞭解都不深刻。七〇年代的人大抵如此。

問：論戰發生的近因、遠因是什麼？

答：保釣運動發揮重大影響。七〇年代為什麼會產生新詩論戰呢？很清楚的是受到保釣運動影響。保釣運動也頗受六〇年代後期到七〇年代西方知識份子的校園反叛運動的影響。當時大學教育體制的改革、言論自由的擴張、反對越戰，還有民權運動和反文化（Counter-Culture）等風潮，都對整個戰後資本主義體系整編後的意識型態展開批判。像法國、日本、美國三個不同地區的知識份子，對一九五〇年以後深信不移的西方價值、秩序，同樣採取強烈的懷疑態度。其中我想必然受到中國大陸文革的刺激，特別是學校教育體制革命的問題。當時的學生佔領校區，成立由教授和學生組成的委員會，然後檢討大學的課程，他們反對校園被保守的意識型態所支配。這個運動使得在美國讀書的香港或台灣去的中國知識份子目瞪口呆，那時的留學生多半對政治沒有興趣，他們把中國看成是一個非常遙遠、神秘而且充滿專制、暴政的國家；但是，七〇年代他們所嚮往的西方知識界所發生的變化給他們帶來很大的衝擊。從而在觀念與態度上，有了很大的轉變。就在這個時候，美國擅自把屬於中國領土釣魚台列島，連琉球一併私相授受給日本。新帝國主義議題激發了戰後台灣知識份子真實的民族主義的情感，此一民族主義的憤怒原是單純的反對列強對中國領土的干涉。至少在剛開始的時候，不涉及兩個政權的問題，後來隨著國際政治的變化，美國尼克森政府跟中共戰後

二十年來第一次接觸，給在美的中國知識份子帶來相當大的震撼，進而提出「愛國，愛那個國？」的議題。這當中有一些是擁護國民政府的，有一些是擁護北京政府的，龜裂的情況就產生了。

保釣之後不久，便發生了現代詩論戰。當時海外知識份子，對於中國現代詩的惡性西化現象頗多質疑。關傑明提出台灣現代詩中國化的問題。他呼籲台灣詩人不要再寫那種從外國文學作品中借支過來的感情，要有現實，要有人民的疾苦，要照顧到社會的問題。既然要表現這樣的內容，形式也要改變，包括不要再用西方現代主義式的晦澀語言，他並且更進一步提出「民族風格」的文學觀點。此一說法無形中緊密地連結著七〇年代釣魚台愛國運動的反帝性格。所以一九七二年的新詩論戰的根本性質是反帝、反西方的。這個針對面非常重要，幾年以後的鄉土文學論戰其實只不過是新詩論戰的延長。當時，我和王拓等人，寫了幾篇文章對台灣戰後三十年來的文學作了一個總結。我們只取「中生代」及「新生代」文學做為批評的對象。像「中國寫作協會」的作品沒有包括在我們的文章裏，「中國寫作協會」是光復後從大陸過來的，他們有組織、有聯誼、囊取台灣各種獎金，他們也有代表台灣參加各種國際文學活動的機會。我們自己發展出來的「筆匯」、「文季」、「現代文學」等雜誌，基本上是自成體系的。因此，當我們對這個體系做出總的檢討和反省時，引起「中國寫作協會」和國民黨保守作家的不安，於是紛紛反擊，這個反擊具有明顯的政治上的意義。彭歌的「沒有人性，哪有文學」，提出所謂的「人性文學」，曾引起雙方激烈的辯論。這個論戰帶著很大的政治清算色彩，使得討論沒有辦法深入。還好，事情並沒有以政治態度與政治訴求來解決，總算平靜渡過。

編主驄天尉

鄉土文學討論集



為誰而寫成爲重要議題

問：今年正值鄉土文學論戰的第十周年，回顧七〇年代以後，台灣文壇激劇、重大的變遷。您認為論戰對台灣文學的發展，有怎樣的衝擊與影響？八〇年代台灣文學的走向，又在何種程度上受到論戰的影響？

答：當時新詩論戰與鄉土文學論戰的具體結果很清楚；一、對西化文學第一次全面性的批判。也是對戰後二十年來完全處於支配地位的，以美國爲首的、輸入的、惡質的西化文學的總檢討。二、作家開始反省文學是爲了誰？爲了什麼？以及文學的表現形式。前面兩個問題是爲誰寫？爲什麼寫？寫什麼？後面的問題是怎麼寫？就新詩而言，許多詩人創作出跟過去現代詩形式完全不一樣的詩歌，這是令人喜悅的收穫。第三，正如日本人松永正義所說的，鄉土文學再一次說明了在台灣的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份。他驚異地看出，戰後二十多年以後，在台灣的文學理論上出現了「中國往那裏去」的議題，譬如國家民族的解放、國家獨立的問題

。雖然有很多政治禁忌，但大家仍然圍繞著這個問題。因此，松永正義認爲台灣文學無可懷疑的是中國文學的一部份。雖然，一九四九年以後，台灣和大陸有著政治上的分裂，但是從一九七八年的討論文章看來，台灣文學仍然保持對中國的關切，所以他說是中國的文學。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做個檢討。第一，鄉土文學還不是一個全面性的台灣文化思想運動。換句話說，它一直還停留在文學界；這是第一個缺陷。它沒有全面波及到其他的社會科學，或其他的科學研究，或是政治運動，它不是一個全面性的東西。這裏我還要加以註解；雖然它是個文學上的討論，但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它對社會科學的影響，就是蕭新煌或其它教授所講的：爲什麼我們的社會學都不談台灣的現況呢？鄉土文學在社會科學研究上的意義，至少引發像蕭新煌教授這一批人，開始對台灣社會問題展開了研究。雖然還沒出現一個學派，一個 movement，但已跟鄉土文學一樣出來批判整個戰後的，美國系統的保守的社會學。

鄉土文學論戰並沒有形成一種新的啓蒙思想運動。

第二；就成績而言，不只社會學方面還沒有提出系統地以台灣爲中心，以台灣爲關切主題的社會學討論。在電影、音樂、繪畫等等藝術項目上，也沒有受到深刻的影響。如果鄉土文學是以反帝的、批判西方的、中國傾向的觀點來下定義的話，老實說，我們沒有這樣的鄉土文學。但是從一個更寬的觀點來說，它已開始出現這些範疇的東西，祇是不夠深刻。總的來說，鄉土文學論戰並沒有形成一種新的啓蒙運動、新的思想運動，現在回想起來，它應該更進一步對整個戰後冷戰體制進行質疑與批判。五〇年代以後台灣基本上變成了這個世界東西兩

大陣營二極對立下的被支配物。政治上的反共、防共、恐共，思想上的親美、親日，不管是國民黨也好，在野黨也好，鼓吹的全是美國式的資本主義、議會政治、自由民主。這些，基本上也成爲民進黨意識型態的主要內容。

另外一個反省之處，就是在創作實踐上，鄉土文學論戰沒有把思想檢討落實到創作上來。論戰後，容許我這樣說，還沒有比較重要的作品產生。

追索歷史根源，意義非凡

問：部分從事台灣文學理論或歷史研究的學者認為，發生於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應被視作「第二次鄉土文學論戰」。這樣的觀點，側重指出所謂「第二次」乃是承繼了發生於二〇年代的「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亦即「台灣話文論戰」；那麼，由文學發展史的角度來觀察，這兩次論戰的關連性呈現於兩者之間的那些特質上？廣泛地看，七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之後的台灣文學，又承襲了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哪些特質？

答：當初，在討論鄉土文學的時候，有人談到一九三〇年代台灣也有過一個鄉土文學論戰。我在這裏補充一點說明，七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的提出與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人間」副刊的主篇高信疆先生基本上是個愛國主義者、民族主義者，也是位優秀的編輯，譬如關傑明兩篇引起現代詩論戰的文章，以及龍族詩刊現代詩論戰特刊，都是在高信疆策動下產生的。如果沒有透過大眾媒體，這個論戰也許不會擴大。還有一點，我們不要忘記另一個傳統，在南部像鍾理和這一批作家，他們素樸的現實主義文學。我用「素樸」的意思就是說，比起日據時代的現實主義文學，它缺少了一個意識型態。他們只是一個誠懇的、忠實的、熱愛文學的文學工作者。他們生活

在鄉村，就寫農村生活的點點滴滴，基本上可能沒有能力觸及比較清楚的意識型態上的問題。另外，當然政治上的恐怖對他們也有影響，他們不敢去碰這個問題。長期以來所謂素樸的現實主義台灣文學，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非正式部門」，在資本主義的主要生產方式之下，個別存在著手工藝，或者比較地區性、非市場性的生產方式，被稱「非正式部門」。就文學方面而言，在五〇年代冷戰結構下，親美的，依賴西方的這個主要部門底下也有一個「非正式部門」，那就是南方作家所代表的所謂的素樸的現實主義，它跟三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有一定的共同點，也有一定的相異點。他們的共同點是反帝，這個思想是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五四之前的台灣知識份子，包括文學界、文化界對中國的方向同樣表示關切，現在祖國爲了自立圖強而發生五四運動，及五四運動帶起的白話文學運動，於是當時很多在中國讀書的知識份子，也跟著提出台灣文學的「白話文化」，以反對當時士紳派的，跟帝國主義文學妥協的舊文學。白話文提出後，馬上遇到另一個問題，因爲台灣在政治生活上和中國斷絕已久，所以產生了語言問題。白話文學同樣影響福建或其他不同的方言地區，雖然這些地區各自的方言不同，但作家們用統一的白話文創作，是在一個整體的政治結構下面創作，雖然有講閩南語的，也有講湖南話的，像魯迅就講紹興話，可是他們寫出來的東西還是以普通話爲主；因爲當時大眾傳播都是用白話文。

啓蒙成爲文學的大前提

然而，在台灣作家不像大陸的作家那麼自由。在台灣有閩南語、客家語，不然就是舊的漢文，再不然就是日本話。因此要「我手寫我口」，就產生問題了，因爲在當時台灣人的日常生活裏或是閱讀的書籍很少是白話文，所以當



● 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右第一人）與友人合影。右起第三人為日據時期活躍的社會主義者王敏川。

作家創作時，就產生了影響。另一方面是日語的干擾，就是在殖民地日語教育下培養起來的讀者，對普通話深感陌生，所以「台灣話文」只是為了運動的需要，請大家注意這點，不是後來所說的，要跟中國斷絕。所謂為了運動的需要，就是說在帝國主義侵凌底下，如果要中國老百姓讀那些古樸的文言文，那麼知識份子的啓蒙運動、政治運動，就沒辦法普及。所以大陸當時不只有白話文運動，還有更激進的漢字羅馬拼音化運動，主要是想讓廣泛的文盲，廣泛的幾千年來沒辦法掌握文字的中華民衆，能很快掌握文字，以增進知識，提高民智。台灣的第一次「台灣話文論戰」，就是從這裏來的，它是應合著實際需要而產生的反帝、反封建的運動，前者是針對日本帝國主義，後者則是針對早已投降的士紳、士大夫階級的知識份子。第三方面，它是要使台灣廣泛的農民、工人能趕快讀文學作品、讀宣傳品、讀理論文章。完全是為了策略的需要，因為像北京話中的「胡同」、「兒」字音等，跟台灣人的現實生活接不上，所以那些激進的文學家提出台灣話文學化的主張。在反帝這點上，跟七〇年代

鄉土文學裏所反對的西方文學霸權有很大的關係。當時我們提出教育民衆，提出文學為社會服務的主張，與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主張文學應該為大多數人能讀得懂的精神是一樣的。不一樣的是，無論在理論或實踐上，至少是在反帝的尖銳意識上，我們「第二次鄉土文學」論戰反而比較弱。因為日據時代是在舊帝國主義下，壓迫非常明顯，每天的生活裏面都存在著敵人。第二次鄉土文學只有少數的幾個文學工作者看到這一點，不只在理論上充分提出來，在作品上也能充分提出來，像「莎啞哪啦，再見」，「我愛瑪莉」，「小林在台北」，及我個人對越戰討論的一些作品，可是却不像第一次論戰時那樣普遍。然而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都有一個中國在裏面，都以中國為方向、為思考內容。不過具體地說來，兩者之間沒有直接的淵源，老實說，還有很多人不知道有第一次的鄉土文學運動。若是不曉得這一回事，怎麼可以說是受到它的影響呢？台灣左翼文學一直到七五年以後才出土一部份，有很多日據時代的左翼文學作品尚未完全開放；這跟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新文學受到禁止的命運相同，所

以沒辦法做很好的研究。但是你也可以說，因為台灣文學歷史出現了這個斷層，所以使我們的現代主義延長那麼久。

問：八〇年代以後，由於台灣政治環境的快速變遷，文壇上陸續出現像「政治文學」、「人權文學」等較具批判現實政治色彩的文學主張。這些主張與作品和第三世界國家激進的現實主義文學有何異同？

答：光復後，台灣發展出一條素樸的現實主義文學。這和日據時代反抗的現實主義文學，最根本的差異是在於日據時代有明顯的反帝、反封建的意識型態，特別是賴和、楊逵和呂赫若等人。至於光復以後，經過五〇年代的肅清，具有意識型態認識的人，不是被殺、流亡，就是驚恐停筆。因此，剩下來繼續創作的作家，他們就比較少有意識型態在。當然，意識型態並不等於文學。一個思想比較明確、清楚、激進的寫作者不一定就能寫出好的作品。

時代錯誤的台灣 / 台灣人問題

戰後，以鍾理和和第一代「台灣文藝」為代表的作家，也就是我們所謂的素樸的寫實主義作家。他們作品的第一個特點也就是沒有政治的或固定的社會意識形態；其次，他們真誠的、熱情的、甚至是傑出的去描寫生活，描寫五〇年代前後的台灣農村生活。然而，從五〇到七〇年代，在台灣全面西化的現代主義時期，他們一直都是比較弱小的底流，卻也強韌地一直堅持他們的風格。但是這個底流在八〇年代，特別是1979年以後開始衝出地表；以前是地下水，現在冒出來一條溪流。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了，衝擊了台灣知識份子，各方面都起了相當大的影響，大家深深感覺到台籍的知識份子，特別是政治人才，受到了相當大的打擊。外省人和本省人之間的感情在美麗島事件中又起了激變，一些人感到：本省籍人

士原來是受到壓迫的，台灣人知識份子受打擊的。這種感情深遠而且激烈，在政治界和文藝界活動的台灣省籍年青知識份子，有相當大的一部份人受到這個事件的衝擊和影響。有些台灣作家是以外省人壓迫本省人解釋這個政治事件，而不是用更高層次的政治經濟學知識去了解；所以心中就產生了悲憤。於是提出「台灣文學」的概念，探討「台灣人」是什麼？「台灣文學」是什麼？「台灣」是什麼，這種身份認同的問題在台灣內部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但把台灣／台灣人當做問題來討論，其實在1950年代就已發其端緒了。

中共與美國的「上海公報」發表後，二極對立的世界戰略調整了，「台灣獨立」被帝國主義利用的價值大為降低，「台獨」這隻棋子也就報廢了。

1950年代大概是台灣的地主階級與過去親日資本家在整個國民黨的政治結構上爭取到發言權，再加上國際勢力要使台灣徹底親美反共，才產生所謂的「台灣分離主義」。這個「台灣分離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綱領就是台灣／台灣人的問題。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來，需要有一些理由，於是有人從國際法這個層面提出，也有人從民族的觀點提出，更有的從台灣的歷史來探討，這些都是為了要取得台灣人為什麼要獨立於中國之外的論證。可是，我們的理解是當時在全世界範圍內分成彼此矛盾的兩種政治經濟結構，形成對立的兩個陣營，而「台獨」企圖利用兩大陣營之間的結構矛盾來奪取國民黨的政權，從而為這個反共陣營服務。這些論證主要是由此產生的。可是一方面由於國民黨取代了「台獨」的功能，另一方面由於這種理論比較沒有現實基礎——因為台灣內



● 中共與美國關係改變後，世界戰略地圖重劃。

部矛盾，根本上是社會矛盾，而不是什麼民族矛盾——因此，它就沒有辦法取得廣泛的認同。在1979年後，再大肆宣揚這種台灣／台灣人的理論，可以說是一種時代錯誤，因為它已經錯過了台灣獨立的最好時機，它的最好時機是在60年代。當時，美國勢力如日中天，中共因文革無暇顧及國際情勢，國際間產生了數個政治運動想讓台灣獨立起來，卻沒有成功。等到「上海公報」發表，二極對立的世界戰略也調整了；「台灣獨立」被帝國主義利用的價值大為降低，「台獨」這隻棋子也就報廢了，所以我說是個時代錯誤。

名詞無關緊要， 重要的是作品品質

從另一角度來看，從五〇到七〇年代，海外的台灣籍人士所積極進行的台灣獨立運動，並沒有全面影響台灣當時的知識界。我在綠島時一直都有台灣獨立運動的案件被偵破，但主要還是侷限於政治運動。然而，美麗島事件以後就不同了。社會不但對黨外運動採取強烈的同情和支持（如美麗島受難家屬的高票當選）；同樣的，文學界也正引起一種覺醒，他們認為過去的文學界太消極、太孤立了。「台灣文藝」的改組，由陳永興醫師接辦了這一份刊物，正是個明顯的改變。從此，這份刊物在題材上比較積極，比較主動過問時局，也比較有明顯的思想色彩。許多作家的台灣自覺性都明顯地提高，「人權文學」、「政治文學」之類的名詞也出現了。

關於個別作家台灣意識的提高，我基本上

承認，他們對台灣的關切與愛，差不多是蓄著滿腔的熱血，對台灣人民、台灣命運的深刻關懷。然而，對台灣問題的看法，我個人則有些不同的意見。譬如，最近提出一種相對於中國文學的台灣文學論，這個概念不同於日據時代那種相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台灣文學。他們提出台灣人的概念時，是針對於中國人這一概念的。這個理論是將國民政府四十年來在台灣的支配看成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進行殖民統治，所以認為台灣文學是和中國文學相對立的。然而，在鄉土文學運動時，台灣文學是以在台灣的中國文學這樣的概念提出的。1977、78年時的文學界，在公諸於世的文字上，並沒有提倡目前這種強烈台灣意識的台灣文學。

至於一些文學運動或文學派別的提出，我個人認為名實應該相符。「人權文學」、「政治文學」這些口號，在目前來說，要評論可能還太早了。這兩個名詞的成立，可能還要等到文學上、專業上非常優秀的作品出現才算成立。何況，所謂政治小說對政治應該有結構性的了解。而不是只談一些敏感話題，或是批評國民黨的施政就可以了。台灣政治是不是只有國民黨問題？是不是還該追問：台灣整個社會上的矛盾是甚麼性質？它和整個世界結構的關係是怎樣？沒有這樣的深度，恐怕還不能稱作政治小說。

一些優秀的第三世界小說，如：菲律賓作家荷西（F. Sionil Jose）的「我的兄弟，我的劊子手」；非洲喀麥隆作家歐優諾（Ferdinand Oyono）的「老人與勳章」；韓國作家李清俊的「無法寫出的自傳」，及金池範的「烏鴉之死」；以及薩爾瓦多作家Ar-

gueta 的「一天的生活」等。這些小說都深刻而生動的描寫了第三世界的人民追求社會正義、民族獨立的艱辛歷程。這些小說不論就歷史格局或對人、對政治、對世界局勢的理解都相當深刻，因而動人心魄，感人至深。這些作品，你冠以什麼名稱都無關緊要，是所謂政治小說也罷，人權小說也罷，最重要的是它有生命力和震撼力。

一個作家最可引以為榮的，應該不是得國際大獎，而是他的作品使悲傷的人再起，使不能愛的人試著再愛，使受侮辱的人試著尋找他的尊嚴。

問：去年，德國政府舉辦國際文學會議，部份受邀的台灣作家歸國後，對國際社會重視大陸作家，漠視台灣作家，頗為憤憤不滿；近來此間文學界也在談台灣文學及作家的定位問題，對此你有何看法？

答：幾年前，詹宏志寫過一篇文章說，台灣的寫作者若不深入的認識社會、增進本身思想的內涵，而只對台灣的社會生活作些浮面的描寫，作品內容必然貧乏，恐將僅具地方的特色，在中國文學史上只能成為聊備一格的邊疆文學。對這個寶貴的意見，某些人未經細讀、深思就大鬧情緒，搞得滿天風雨。台灣的文學界有個特殊的現象，就是有些人只要聽到有人說台灣的文學比第三世界文學差，或是比大陸的某些作家的作品差，或者說他不重要、不深刻，就會引起強烈的情緒反應，認為受到歧視、蔑視與侮辱。

**寫出民族的心聲，
使受侮辱的人尋得尊嚴**

台灣今天因為建交國不多，作家在國際場合可能會因國際地位的低微而受到有意無意的歧視。但我要著重指出的是：包括我個人作品在內的台灣文學，總讓人覺得還不夠豐富、不夠優秀。還沒有足以驕人的作品與作家，可向世界顯示掩蓋不了的光輝。所以，我覺得，台灣文學界需要的不是很不健康的自信，而是感到有所不足的自覺；覺得自己不夠經常見賢思齊以鞭策自己不斷努力。

再者，我個人認為國際上的評價一點都不重要。我很訝異台灣，甚至大陸，都在談論為什麼某些重要的國際獎不頒給中國人？台灣的文學界有這樣的想法，多少還可從台灣社會比較功利得到解釋。社會主義國家的作家，對於為什麼寫作？為誰寫作？理論上，應該比任何地區的作家先進才對。如果連大陸的作家都問諾貝爾文學獎的審查委員為何不頒獎給中國作家？或什麼時候才給？我覺得是非常可笑而沒有禮貌的事。個人認為一個作家最引以為榮的，應該不是在國際上得獎，或是在說別的语言的民族得獎，而是自己國家的人民認為他寫出了他們的心聲，他的作品使悲傷的人再起，使不能愛的人重新試著再愛，使受侮辱的人試著尋找他的尊嚴。如果他的本國人民都認為他的聲音代表全民族的聲音，他說出了全民族的苦痛、期待、勝利與喜樂，我想這對作家而言，便是光輝的冠冕。爭論自己在國際上的地位如何，我個人覺得大可不必。當然，我沒有在德國受到差別待遇致生不公平之感。這個所謂的不公平之感之所以產生，我想可能有兩種原因，一是別人對我們不太禮遇，其二可能因為自己覺得很重要，在台灣薄有聲名，到了德國卻未受重視，聚光燈都打在大陸作家或別國作家頭上，因而感到受了冷落。如果是這樣，說不定該檢討的是作家自己，不是嗎？